

UNIVERSITY OF WUPPERTAL
BERGISCHE UNIVERSITÄT WUPPERTAL

EUROPÄISCHE WIRTSCHAFT UND
INTERNATIONALE MAKROÖKONOMIK



Paul J. J. Welfens

The Background of Trumpism and its Main Economic Effects

EIIW Diskussionsbeitrag 288

EIIW Discussion Paper 288



Europäische Wirtschaft und Internationale Wirtschaftsbeziehungen
European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SSN 1430-5445

EIIW Discussion Papers are registered with RePEc-Econ Papers and in ECONIS

Paul J. J. Welfens

The Background of Trumpism and its Main Economic Effects

December 30th 2020



Herausgeber/Editor: Prof. Dr. Paul J.J. Welfens, Jean Monnet Chair in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EUROPÄISCHES INSTITUT FÜR INTERNATIONALE WIRTSCHAFTSBEZIEHUNGEN (EIIW)/ EUROPE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Bergische Universität Wuppertal, Campus Freudenberg, Rainer-Gruenter-Straße 21,
D-42119 Wuppertal, Germany

Tel.: (0)202 – 439 13 71

Fax: (0)202 – 439 13 77

E-mail: welfens@eiiw.uni-wuppertal.de

www.eiiw.eu

全球特朗普

结构性的美国民粹主义及 与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冲突

全球特朗普 中文版序言

保罗·J·威尔芬斯

本书创新性地分析了美国的结构主义、特朗普总统的经济政策方针以及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即与法国和德国（或西欧）相比，美国的有效生活时间收入。此外，该研究还从跨大西洋比较的角度，分别对美国的医疗保险和更广泛的医疗体系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同时也视新加坡的医疗保险体系为基本参考。虽然特朗普在 2020 年总统大选中遭遇了相当悬殊的失败，但美国的结构主义问题仍将是未来很多年的挑战。我非常感谢能够在 2019 年与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公司 (Palgrave Macmillan) 合作出版《全球特朗普》--并得到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 (大卫-奥德雷奇 (David Audretsch)、巴里-艾辛格林 (Barry Eichengreen)、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Sachs) 和理查德-蒂利 (Richard Tilly) 的评价；我于 2020 年 2 月在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介绍了这本书 (我在加州的演讲录音可在 YouTube 上找到, 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2TzUcljceg>)。该书的德文版随后于 2020 年 10 月由施普林格出版。2020 年用中文出版本书的关键章节, 得益于欧洲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所 (EIIW) /伍珀塔尔大学熊恬女士的巨大努力和技术支持。

本书中提出了许多 2016 年后关于美国的新见解。当然, 部分分析也解释了之前的几十年是如何一步步走到 2016 年这个历史转折点, 以西欧的“脱欧” (BREXIT) 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第五位民粹主义总统为标志。在 2016 年 11 月的大选中, 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胜利, 使他成为美国第 45 任总统。他的民粹主义方针的核心是主要针对中国的扩张性贸易政策, 然而, 他的财政政策是部分矛盾的: 经济上升期的高赤字-国民收入比, 以及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收入不平等, 所以美国关键的结构性问题之一进一步恶化。

这项研究的主要发现是什么? 美国的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不平等的快速扩大有关, 这一过程带来了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比从 1981 年的 21% 下降到 2015 年的 13% (在西欧, 各自收入占比的下降只是从 22% 到 20%)。在调查结果中, 大多数美国人觉得这些不平等确实不公平, 但同时也有相对多数的人期望美国大公司而不是政府来最终纠正这种不平等。然而, 这只是股权经济下的一种虚幻认知, 因此, 广泛的选民挫折感仍将是美国政治议程上的重要内容, 而国际和技术驱动的不平等现象在未来将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 美国在政府支持再培训方面的支出占国民收入的 0.04%, 与此同时, 瑞士的支出占比为 0.2%, 德国为 0.25%, 丹麦为 0.6%。同时, 经济顾问委员会在 2016 年的一份令人持怀疑态度的研究报告中宣称美国相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人均消费上的领先优势, 如果不只考虑某一年, 而是分别考虑一生的有效收入和一生的有效消费, 那么这个结论其实是不存在的。考虑与德国和法国进行比较, 这项研究表明, 这两个国家的终身收入是相同的, 事实上与美国相同。此外, 西欧的婴儿死亡率比美国低, 预期寿命比美国高。美国的健康保险制度比欧盟国家或新加坡的健康保险制度都要弱, 而实际上, 美国在健康方面的支出--相对于国民收入来说--比德国和法国多 1/3, 而在以上提到的一系列关键的健康指标却表现得异常糟糕, 这一事实令人费解。此外,

特朗普的新冠疫情政策相当疲软，当然不符合人们对西方超级大国的预期。2020 年由于新冠导致的世界经济衰退是第一次没有明显的美国领导的国际危机；在这里，美国新一届拜登政府将带来重大变化，美国对欧盟的重新支持也应该是可以期待的。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将更加专业和支持多边主义。

与此同时，在英国也发生了一个等同于美国特朗普事件的民粹主义事件，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政府似乎正在不遗余力地试图推翻在每张 20 英镑纸币上出现的亚当-斯密的名言，即更多的贸易带来更大的经济繁荣。卡梅伦、梅和约翰逊的政府都奇怪地自相矛盾（更多内容请参见我 2017 年出版的《意外的 BREXIT》（伦敦：Palgrave Macmillan）一书）。

关于 21 世纪初美国、欧盟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我们不应期望这种合作总是一帆风顺的，但加强合作以获得共同的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潜力十分巨大。这种合作关系不仅能够取得更丰硕成果，并且能使有关各方在包括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以及科学合作等诸多方面受益。然而，在气候变化政策方面也需要建立广泛的合作，欧盟在 2005 年启动的涵盖了工业和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排放交易系统（ETS）已经发挥了一定的领导作用。加利福尼亚州模仿了这一做法，并在 2015 年进行了升级，将其 ETS 的覆盖范围扩大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80% 以上。日本的两个都道府县，韩国，和中国一样，在 2020 年采用了针对能源行业的 ETS。推动 G20 国的 ETS 网络化，之后将各国 ETS 整合到全球二氧化碳证书交易体系中，将是世界经济在 2050 年左右实现气候中立的有效途径。

在欧洲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所，我们对国际经济关系、（非）一体化、创新、信息和通信技术、结构性变化、增长和可持续性进行了长达 25 年的研究，在此期间，欧洲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所也成为世界经济中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顶级研究人员、决策者和公众之间的一个接口。我们重视联合研究和比较研究，重视关于适当政策改革的公开辩论，以及重视青年人才的交流。参与了 EIIW/伍珀塔尔大学交换的研究人员，都受到了热情接待，包括与熊彼特商业和经济学院的进一步研究合作，同时我们对外派遣的研究人员也在合作中受益匪浅。

拜登新政府只有几年的时间来采用美国的创新政策改革议程，欧盟在鼓励美国的同时，一方面应该采用自己的改革项目，另一方面应该注重向全球输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当然，西方国家也应该向亚洲国家以及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学习。当然，中国是亚洲和世界经济的重要政策参与者之一。我很感谢我的一些著作和其他出版物被翻译成许多外文，包括中文和日文；我还与中国的同事，特别是北京中国科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的经济学家进行了许多专业交流。

通过我的《全球特朗普》一书中的这些核心章节，我可以为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国际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讨论提供另一种助力。我希望我的分析能够促进国际间卓有成效的讨论和许多国家有益的政策改革。

2020 年，伍珀塔尔和华盛顿特区

Paul Welfens 是伍珀塔尔大学欧洲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所所长(EIiW, www.eiiw.eu); 他是让-莫奈欧洲经济一体化教授, 并担任伍珀塔尔大学宏观经济学教授; 他曾担任2007/08年度巴黎政治大学 Alfred Grosser 客座教授; 他是波恩 IZA 研究员; 华盛顿特区 AICG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驻地高级研究员。*Welfens* 曾在联合国、美国参议院、德国议会、欧洲中央银行、欧洲议会、国际行动委员会和 IMF 作证。*Welfens* 在欧盟的经济学家中排名前 5% (来源: RePEc 2020) 。

第一章

特朗普主义的背景以及经济解释

第一节

引言

“是多边主义让弱者变得强大，让强者变得文明”

——罗伯托·阿泽维多，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2016年11月23日

在盛行征收极低关税和金本位制的1860年至1914年，具有历史意义的全球化趋势出现。当时很多国家政府主张，如果没有传统的高关税收入，国家将会崩溃，从而广泛引入所得税则无从谈起。事实证明，关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关紧要；所得税体系行之有效，成为政府收入的可靠来源。新兴的国际组织也带来了一定效果，然而旨在限制常规军备竞赛，于1899年在俄罗斯大力支持下成立的国际审判法院，在避免帝国主义竞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面表现得不够强硬。直到二战后，美国才帮助建立了几个主要由美国主导的新兴国际组织，促成了成员国之间的国际合作与政策监控，从而使世界更加稳定和繁荣。在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两个获得美国支持的主要代表组织，另外在美国的支持下，欧洲区域一体化自1952年以来，也为区域范围内的多边合作提供了一种模式。因为特朗普总统在不断淡化国际组织角色，并不再为欧盟（EU）一体化提供传统支持，他的上台也随之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国际政策范式；相反，在总统竞选期间，他提出英国脱欧是一个正面的发展结果，未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案例。非传统的民粹主义政策一直在按唐纳德·特朗普的方式控制着美国。然而，人们是否可以认为一种结构性的美国民粹主义确实存在，且背后都有哪些具体原因？

在美国，中位数家庭的收入状况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即中位数家庭收入将收入金字塔分成各占50%的较富裕家庭和较贫困家庭——这对典型家庭来说是一个实用的评价体系）。现代全球化和数字化已为美国那1%的顶端高收入人群带来了巨大收入；在这方面，如果美国那1%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也能像法国的1%高端收入群体一样稳健发展的话，2016年总统选举的赢家便不一定是特朗普了。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美国的年收入中位数约为5.7万美元（这是21世纪头十年的几年中的一个代表值），这意味着假定医疗保健净支出占收入的17%，那么中等家庭的有效月收入就更少了（“有效”指扣除医疗保健支出）。这个数额低于一个传统德国或法国家庭的有效收入值；相比美国中等收入人士，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医疗保健支出仅占收入的11%，假期还是美国人的两倍，平均寿命也比美国人多出大约三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婴儿死亡率高于西欧，这个现象自1985年以来就很显著——30年来大西洋彼岸的婴儿死亡率差距意味着，如果美国与西欧的婴儿死亡率相当，美国人口总数将比现有水平少5000万人（基于经合组织(OECD)对婴儿死亡率和人均寿命的对比，详见附录G）。让我特别感兴趣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是托马斯·杰斐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夏洛茨维尔参加熊彼特学会会议期间（在弗吉尼亚大学），我曾参观了杰斐逊故居。多年后，我收到了杰斐逊对1788年游览莱茵河的德文版本描述。那个时候，杰斐逊是美国驻法

大使，他还在阿姆斯特丹会见了约翰·亚当斯（曾担任第二位美国总统）。当时亚当斯正在海牙进行着告别之旅，途经荷兰时还与当地银行家商议了有关美国国债的事宜——让杰斐逊信心倍增，后来他成为了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他撰写了很多关于葡萄种植（他渴望向欧洲葡萄种植者和酿酒师学习，然后将葡萄带到美国）、房屋建造、贫困问题等方面的观察评论文章，一切观察都是在途径荷兰和沿着莱茵河一线（以及到法兰克福美因河、曼海姆、斯特拉斯堡，然后返回巴黎）的旅程中完成的。离开荷兰前往德国北部时——当时属于普鲁士（德国于 1871 年才建立）——杰斐逊（1788）指出（原文）：“舒适富裕到极度贫困的过渡现象在跨越荷兰与普鲁士领土时十分显著。两地有着同样的土壤与气候，只是分属于不同的政府。因为贫穷，普鲁士臣民的脸上充满着被奴役的恐惧。然而在地貌上的改善，尤其为这个地方带来了点希望。这里的道路通常穿越山丘，但有时会穿过莱茵河周围平原的边缘。广袤和美好总是存在的。看上去明显破旧不堪的土地需要肥料。这里的山长满了金雀花和苔藓，几乎一直是处于沙质、贫瘠、未经开垦，且没有文化底蕴的状态。在这里随处可见没有活力的森林，有时可以见到沙滩。平原上主要种着玉米，一些草和柳树。这里没有城堡和房子能至少证明中产阶级的存在。同样的贫困笼罩着整个国家。同样在看上去摇摇欲坠的村庄里，妇女人口比例明显过高。农耕者似乎靠农场而生。农舍由泥土制成，比砖好一些，全都覆盖着茅草。克拉夫斯仅仅只是一个村庄。几乎没有迹象表明那里出现过商店或是售卖过杂志。随处可见的玻璃窗户里会挂有一些小物件。”

但他也指出，在后来成为德意志一份子的科隆市，当时大部分有名望的人士十分狭隘，还充满民粹情绪：“科隆是一个主权城市，封闭自治。这里大约有 6 万居民；这里似乎商贸频繁，也充斥着穷人。商业主要被新教徒掌控，他们在城市里大概有 60 幢房子。他们的运营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或是被天主教主导的政府以各种形式压迫，这使他们变得十分狭隘。前不久，上议院以 22 比 18 的投票结果允许他们建立一座教堂：但据说这项特权将被撤销。而且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有大概 250 座天主教教堂”（杰斐逊 1788）。众所周知，许多欧洲国家存在的贫困和宗教不容忍是欧洲人移民美国的主要原因。

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是一位民粹主义总统，他来自东海岸的精英中脱颖而出，并在第二次竞选中获胜。迄今为止，在 45 位总统中，人们可以大概识别出哪五位可以说是民粹主义者的总统。但是，特朗普总统的领导可能会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这位总统会有多开明？其不稳定性和效率损失会给高层人员的职位变动带来多大影响？频繁的人员变动似乎预示着总统一开始就无法做出正确的人员选择，或是低估了高层人员频繁变动对美国政府公信力的破坏力。

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其总收入占世界总收入 1/5，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主导国，美国的重大政策变化显然会对全球产生影响。自 1776 年起，美国就一直在积极地输出其意识形态，进一步证实了以上结论；因此，如果民粹主义和特别专治的总统风格成为美国的“新模式”，这将对全球经济和政治产生影响，其中包括许多重要方面，经济分析自然只能覆盖某些关键部分。许多主题和问题都需要来自政治学领域的补充分析；政治学层面提供了许多有关特朗普主义的重要见解（例如 Rojecki 2016; Lieberman et al. 2017; Sides et al. 2018; Morris 2019; 关

于移民和身份的问题，可参考 Akerlof and Kranton 2010)。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的执政方式当然也很新颖，因为他对美国政府机构在私营部门动态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了解甚少，尽管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话题，但它的确会对美国甚至全世界带来高昂代价。2017 年 1 月，当奥巴马政府的主要公务员准备迎接特朗普政府新来的工作人员时，通常没有任何人露面，可见许多部门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知识鸿沟。从多个方面来看，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很奇特，而他倾向于通过长期关闭政府以迫切建立美墨边境墙，只能算作另外一个方面。至于经济政策方面，他几乎没有能为他提供超过 18 个月支持的顾问。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是为数不多的顶尖经济学家。在 2018 年 3 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当哈塞特被问及对美国钢铁和铝行业的进口关税的看法时，他回答道，因为关税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征收的，所以他无法表态。这就是一位经济学家的回答，显然他对这种进口关税的经济逻辑存在疑虑。根据局部均衡分析，特朗普政府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即对中国征收高额进口税将为美国带来客观收益，但一旦外国直接投资也被囊括其中，则这个局部均衡分析就存在缺陷，并且简单的贸易增长模式和外国直接投资很快就会表明，人们不应期望美国能从美国的进口关税中长期获益，该模式和增强的局部均衡模式如本书第二部分的目录所示。

为赢得 2016 年总统大选，特朗普总统一方面试图聚焦于希望降低税率和放松管制的富裕选民，另一方面试图关注所谓被遗忘的男人和女人，即他对工人和相对贫困阶层的简称。这种双管齐下的有效方法使其在选举人团中获得了大多数选票。

2016 年，民主党便失去了对相对贫困阶层的传统领导。仅在两年后的 2018 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通过全国普选取得了明显胜利。就美国众议院的选票而言，民主党的票数比共和党领先 7%。然而，美国的政治体系并不一定为普选获胜者提供白宫的钥匙，这一现象在 2016 年就很明显（乔治·小布什和阿尔·戈尔在 2000 年的总统大选中也是如此）。2018 年末的美国中期选举可能被人们理解为一个信号，因为这预示着具有高风险政治议程的民粹主义总统不会轻易赢得下一届总统大选。然而，即使特朗普总统在下一届大选中失败，很快人们也会投票选举出一位类似的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这会成为一种新趋势。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每天都流传着数百万条未经评定的信息，新闻平台也经常展现虚假新闻、虚假信息或阴谋论，激进的政治候选人便有了新的机会。当然人们也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在 911(2001 年)后成为了一个在政治上比以前更加紧张的国家。在大规模跨大西洋银行业危机之后的最近几年中，这一点尤其明显。这场危机显然破坏了美国和英国等国的统治精英的信誉。

2009 年英国女王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会问到为什么没人看到危机的到来，这实际上表明了对经济学家和顶尖企业中现代经济体系领导人的不信任。女王正在传达全英国（以及更远地方）的普通选民都在问的问题，却没有得到真正的答案。在美国，大多数选民对美国大型银行中主要银行家的大智慧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没有了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系统性竞争（于 1990 年结束），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变得越来越亲市场，且规程被削弱至超出合理范围的程度。除加拿大外，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对银行和金融市场广泛实行了放松管制，直到 2008 年那场大规模银行业危机出现，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在其中破产，使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几近崩溃，然而这场噩梦被乔治·布什总统所避免。他挽救了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并采取了

一系列旨在支撑大型银行的救助措施（英国和其他欧盟国家以及瑞士采取的很多救援措施的代价高达数十亿英镑、欧元和瑞士法郎，然而这些国家的选民们却听说，国家对其他重要预算项目并没有资金可投入）。奥巴马总统不得不清理部分由小布什政府造成的经济混乱。第二届奥巴马政府试图引入一个更广泛的医疗体系，但是改革出现的问题以及与奥巴马改革相关保险费的增加，显然助力了特朗普在 2016 年赢得多数席位。然而，医疗保健也是 2018 年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个话题，许多选民都明白，特朗普试图推翻“奥巴马医改”的做法将会使保险失效，突如其来的贫困将成为普通家庭最大的隐患，即一个家庭在可能没有保险的情况下有人身患重病。

尽管希拉里·克林顿赢得了普选票，但民主党在 2016 年末的总统大选中准备不充分。狡猾的唐纳德·特朗普机灵地击败了竞争对手，终获共和党提名，成为了选举人团中出人意外的胜利者，因此成为美国第 45 任总统——一个没有政治经验，但具有公认的沟通才能的商人。但随着时间流逝，显然特朗普总统建立的政府表现得异常无力。

答案是明确肯定的，而且矛盾的观念与大多数美国选民在关键问题上的错误期待有关。同时，特朗普总统一直在竭尽全力破坏美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如果他成功了，未来几年西方理性的领导力量将会被剥夺。

随着交易成本下降以及国际网络效应在某些领域日趋重要，美国领先全球的数字化转型过程正在推动着全球化发展。数字化世界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市场集中度，2018 年美国十大领先股份公司中的大多数都来自数字化和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在政治竞争中，数字通信领域的领导力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唐纳德·特朗普确实在 2016 年总统选举中绕过了许多传统媒体。后来作为第 45 届总统，他是推特通讯的领头羊，至少在定量的交流方面处于领先。在数字化世界里，信息和新闻的质量不得而知，因此在 2000 年后，西方世界社会中一定程度的混乱便已成为一个暂时性的特征——大概在 2008 年跨大西洋银行业危机出现时达到顶峰，这样的混乱主要是基于低质量信息，即来自一些所谓领先评级机构的评级信号。银行业危机削弱了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选民对政治精英的智慧及可靠性的信心，这使相关法规变得如此脆弱，以至于这场银行业危机几乎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内部崩溃（尽管西方世界在 20 年前的冷战中取得了胜利）。1985 年后的三十年里，收入差距的急剧上升，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主要银行家和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表明了分别在相对生产力和资源稀缺性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仅对专家而且大多数普通公民来说都是难以置信的。美国、英国、欧元区和瑞士的中央银行将量化宽松政策作为对策，即央行大量购买政府债券和其他资产；这样一来央行便处于零利率下限。量化宽松政策对银行和企业的投资和承担风险的意愿起了支撑作用，其副作用便是加剧了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现象。许多公司所有者获得了客观的资本收益，并利用低息贷款或公司债券（量化宽松所创造的机会）取代高收益债券，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社会的经济不平等。但至少从 20 世纪 80 年代罗纳德·里根降低美国所得税率，特别是最高边际所得税以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成为了美国一个颇具挑战的趋势。

特朗普当选第 45 任美国总统意味着权利向民粹主义转移，而这很大程度上被媒体所忽略了，他的上任似乎也很难让人理解。然而，经过仔细研究和考虑美国选民的想法后，可以发现特朗普获胜的原因比最初人们对他的想法更为显而易见：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选民们在某种程度上拼命寻求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办法，但

迄今为止所有的解决方案已被证明无效，因此，日益严重的挫败感引导着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成为了政治上反精英候选人的多数派（20 世纪 60 年代，约翰逊总统实行了一个名为“伟大社会”的项目，旨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现象；参见 Atkinson 2015）。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为下层社会带来了实际收入增长，这些项目的影响也就没那么明显了。由此给美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问题将不容易得到纠正，较为贫穷的选民也会产生巨大的挫败感。

大多数选民的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经济动态意味着，到了中期，50% 贫困家庭的收入份额将会进一步下降，美国的调查显示，为克服这种不平等挑战而采取的首选补救措施是不可行的；也就是说大公司会自行降低执行总监和高层管理人员的薪水，而提高非技术性的低收入员工的工资，这是不现实的。无论是在美国还是 2018 年的意大利，又或是在贝尼托·墨索里尼领导下的意大利，不再抱有幻想且深感沮丧的选民都属于民粹主义运动的基层。此外，民粹主义统治方式以情绪化的政策和错位的自信间相互作用为特点，属于自上而下且自相矛盾的一种新型方式，即政治承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事实可以在一段时间用意识形态狂热掩盖，包括在数字领域也是如此。

从政治角度出发，自 2000 年起，美国对现实的呈现、感知和影响都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互联网为荒谬的观点和蓄意的谎言提供了平台，这会使政府所实施的政策受到影响——甚至在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总统领导时期，未经打印的写给当地报纸编辑的信，在当下的脸书和其他网站上可以获得数百万的点赞和关注者。

如果特朗普总统以其贸易保护主义方式来阻碍美国经济的全球化，那么他还将阻碍到一些贫穷国家的经济追赶进程（有关全球化带来的积极影响，请参见 Bhagwati 2004）。从南半球到北半球增加的迁移压力将为进一步的民粹主义运动铺路，身份、国籍和文化的问题将成为重点，从而引起反移民政策的呼声。这通常是由于人们坚信移民会成为国家的经济负担，为此纳税人会支付大笔资金——在美国、英国和一些欧盟国家确实有这么一笔费用，但经合组织却认为，这样的方法不适用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德国、法国、爱尔兰和斯洛伐克除外）。

尽管美国选民普遍认为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有失公正，但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选民对于如何有效缓和这种趋势并没有现实的想法或概念。同时，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力量，加上中国的出口动态，导致美国非技术性劳动力，甚至大多数选民的相对收入状况不断恶化。特朗普总统对奥巴马时代的医疗政策进行了改革，为了不陷入贫困，他让数百万人失去了重要的安全保障，这正是特朗普政府领导下权利竞逐产生的悖论。有趣的是，特朗普还遵循了一项反移民议程，这对于美国总统来说十分反常，他利用这项议程将已经很小的美国社会体系缩小了。除税收政策领域外，特朗普在现任政府中几乎没有可支配的经济竞争力，这一论据有充分理由。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充满着自相矛盾之处。到 2025 年，美国 50% 较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份额将达到 10%，和 1980 年的水平相比这个数额已经降低了一半，收入差距还将继续扩大。尤为重要的是，美国工会的权利下降，同时工业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在不断缩小，并且国外资本收入的接受者还在不断获得更高的回报（税后），假如美国的这种趋势紧随瑞士这一领先的全球化经济国家，这似乎也合情合理。总之在瑞士，对于 1% 顶端高收入人群来说，税后收入的强势增长可归因为一个共同因素——来自国外的收入增加，国外对

资本收入的征税相对宽松。低税收的美国与瑞士非常相似；与这个高山国家一样，美国从国外吸引的利润大于从美国流向外国的利润。

在 2016 年的总统竞选中，唐纳德·特朗普显然传达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民粹主义信息：他对普通民众和所谓“被遗忘的男人和女人”的蓝领工人再次表达了关注，还承诺在某些情况下会让他们找回原来的工作，并许诺将创造数百万个新的工作机会。他承诺要提高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及影响力，并减少移民数量，他声称这些移民正在使美国人失去工作。同时，数百万移民（据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发表的“移民政策”演讲中所说）正在滥用美国的社会制度，而特朗普已将这一点作为反对一些社会政策的论据。此外，对大政府一直持怀疑态度的特朗普通过承诺放松管制和启用新型商业模式，向共和党抛出了胡萝卜。同时他还提出了减税政策，从长远来看，顶端收入人群将会从中获益最多。毫无疑问，特朗普的豪言壮语可以为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人群带来安慰；但是，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只能用起暂时缓解作用，而处于美国收入金字塔下端的人群所面临的重大风险将得不到永久缓解。

相反，随着一直青睐自由贸易的共和党成为全球贸易战的推动力，一场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即将来临。特朗普对墨西哥、加拿大、中国、欧盟、日本和韩国都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特朗普以铝和钢铁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北约盟国征收进口关税，而其他关税和相应威胁也紧随其后。就中国而言，2018 年中美双边关税呈逐步上升趋势。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不适宜长久持续，这样只会损害美国、欧洲乃至世界经济。自美国明确表示不再支持欧洲一体化这一超过六十多年的传统以来，再加上特朗普与各国打交道以及试图压制其他国际组织时，在不断推行一种破坏欧盟稳定的双边策略，产生了经济制度间的一种新型竞争：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与欧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中国及其一党专政政府之间的竞争，该政府推动了国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混合市场经济的发展。

如果特朗普破坏了多边主义以及国际组织如世贸组织在关键领域中的作用，那么由混乱和缺乏监管的贸易、投资和移民所导致的中途数量将会增加，从而使世界经济倒退至 19 世纪。脱欧后的英国在退出欧盟后，将寻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特殊关系”，这将为美国民粹主义者提供把民族主义和排外政策议程出口到欧洲的新途径。

在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包括在一些东盟（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各国政府分别对区域一体化和多边主义带来的益处充满着越来越多的怀疑；尤其还要顶着压力与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保持距离。因此，现在正是欧盟 27 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一体化和多边主义的时候了。欧盟能否成功改革欧洲社会市场经济，将其转变为具有全球影响力，被视为具有吸引力的经济体制模式，还有待观察。如果美国在未来许多年内继续推崇右翼民粹主义，那么欧盟国家将成为自由主义、法治与立宪主义的领导者；这对于欧盟来说将是一个难以适应的新角色，因为这样的角色将需要广泛且快速的改革，还必须与声称自己是多边主义体系的捍卫者相联系。只有欧盟能够说服中国参与其中，才有可能实现后者。这将是一个挽救国际组织广泛运作系统的机会。不久之后，进行自我改革的美国将再次在全球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关于这一点，美国民粹主义政治的新阶段至少会被视为一种中期化现象，这种现象可能会在一位美国新任总统任期内进行改革，所以对欧盟而言，从本质上对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上进行重新定位是明智的。然而这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没有健全的的改革和强化的欧盟-亚洲合作，欧盟将不可能长期维持其目前享有的独立性和国际影响力。此外，了解在欧洲（EU，欧盟）、南美（Mercosur，南方共同市场）、东南亚（ASEAN，东盟）和非洲（ECOWAS，西共体）区域一体化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例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特朗普主义作为美国新民粹主义变体，即使在特朗普卸任后仍将存在多年。特朗普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将保持不变。这是西欧在中期内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一旦跨大西洋的经济和政治冲突不断发生，那么欧盟/欧元区向亚洲，尤其是东盟和中国寻求可靠合作伙伴的压力将越来越大。东盟是一个由6亿人口组成的国家共同体，欧盟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在外国投资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将会使东盟迅速受到中国投资者的影响。以“关税跳跃”为例，中国将力图以东盟国家为依托向美国出口产品，旨在避免美国采取针对中国生产商品的措施。虽然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将减少，但美国的“中国问题”将依然存在；唯一的影响是美国将在东盟成员国中失去权利和影响力。

要战胜美国民粹主义的问题，包含三种选择：第一，在美国范围内，通过对内部进行改革和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二，美国外部经历不同制度间的新型跨太平洋竞争，而欧盟国家在这些竞争中大都没有做好准备，它们还将日益寻求在全球范围内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其成为值得全世界各国采用的一种模型；第三，也是最后一种，即依赖捍卫多边主义的全球力量，尽管作为迄今为止最大经济伙伴的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经验甚少。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来，迄今为止还未能成功制定或提出自己的多边主义设计理念。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在美国持续的时间越长，争取在全球传播意识形态的政治风潮就越强；“新旧”欧洲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以及他们自身的新旧民族主义经验，都将受到威胁。有着不堪回首历史的德国，可能会成为西欧的一个弱点：因此，制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崛起，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变得重要。

从欧盟的角度看，美国似乎进入了一个充满巨大内部矛盾的阶段，这一情形既意义重大又令人遗憾不已。在欧洲、亚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右翼和民族主义政党以及美国利益集团，将寻求在美国的支持下获得政治影响力。在德国，可以明显看出，产业方面的差异化做法让人联想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情形：包括西门子和博世在内的一些跨国公司表示捍卫全球化，而高管们则公然反对仇外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但是这并不能排除，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公司或其他公司自身在寻求从打民族主义牌中获益的可能性。

想要在欧洲传播信条的美国人，一定程度上在政治上很激进，他们还得到了意识形态特朗普阵营的财政支持。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旧世界经济首次面临大规模变革。要了解这种变革的动力并确定旨在避免全球政治权利转移的措施，以及随之而来的这种在19世纪末全球范围内的重返趋势，是这一分析的关键方面。

第二节

美国不平等现象调查结果和经济分析：结构性特朗普主义

这研究是一项针对《全球特朗普》的调查。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分析了唐纳德·特朗普于 2016 年末当选美国总统以及在其任期的头两年中制定多项新政策方法的原因，此外还分析了动摇美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些民粹主义观点。虽然在 1991 年，西方市场经济体（大部分实施民主和法治政策（在国际层面来看，通过多边国际组织实施）看起来是冷战以及市场经济体与社会主义集中管制经济体之间角逐之后的最大赢家，但 2016 年全世界发起了对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对。在英国，大多数选民都出乎意料地投票赞成脱欧（对此，我本人并不感到意外。我一直密切关注英国《金融时报》记者 Gideon Rachman 的言论。对于在 2007 年至 2009 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的部分美国和英国精英人士，我有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质疑（Rachman 2016; Welfens 2016））。在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和更有政治手腕的民主党派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之间的总统竞选中取得胜利，美国大多数媒体对此结果感到惊讶。相比于外交政策、贸易政策和财政政策等而言，特朗普政府实施的政治变革（总统任命的秘书和其他官员经历了大洗牌）更具有重大意义。特朗普政府的看法很独特，政府认为 2016 年的美国经济处于疲软状态，以及多年来在其参与的多项国际贸易谈判中和其他国家之间签订了一些不公平的协议：美国将采取新双边政策，因此决定中断持续六十年的国际合作和多边政策（其中国际组织起到关键作用）。由于这些新的政策方针，特朗普政府与加拿大、墨西哥、德国、法国、大韩民国、日本、土耳其和中国等主要盟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如果本文给出的分析是正确的，则基于关美国的新调查材料，并以及结合我自己对国际经济学的认识，以及结合数十篇学术论文和书籍以及线上信息源和数据，将会得出相当引人注目的关于美国和世界经济的结论：

美国民粹主义所取得的新局面不仅是一种短暂的特朗普主义现象，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挑战。如果不对美国政治经济体系进行系统性的大幅度调整，那么美国将无法克服这一挑战：虽然改革要求并非不可能被公众接纳，但换一种简单的说法可能会取得不同的效果，欧盟也一样。以特朗普为主的美国民粹主义有着许多一厢情愿的想法，在许多领域做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治承诺。它的兴起代表着美国科学界的衰弱，由于互联网的扩展，美国科学界对政治的影响已大大减少。

截止到 2016 年 6 月 23 日，即在英国举行全民公决日，英国脱欧过程持续了两年以上。在 1975 年的全民投票中，三分之二的英国选民拒绝脱欧，选择留在欧盟内，然而在 2016 年的英国公投中，51.9% 的人赞成脱欧：赞成脱欧的人数似乎达到多数（有关公投杂乱无章的言论，请参阅 Welfens 2017b；根据英国标准流行度函数得出的一般结果为 Remain 占 52.1%）。大部分欧盟成员国前赴后继地假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广泛的标准式合作，但是他们之间已经出现的矛盾却相当严重，并且显而易见。即使欧盟 28 国非常希望忽视与美国之间直接存在的政治经济紧张局面，但欧洲人也无法忽视中美贸易战（主要由特朗普政府挑起）所产生的如此广泛的国际经济溢出效应，以致于欧盟 28 国将不得不面临来自美国和特朗普总统所施加的巨大的新挑战。

美国在中期面临的双重挑战是，美国在未来应该向欧盟国家学习更多有关市场经济的知识，而欧盟可以也在其他关键领域向美国学习，如风险投资主义。在2016/17年度，西方经济体系的两大支柱变得不牢靠。美国和英国分别是第一和第二位全球领导者。英国曾经是历史上的老大，但现在位居美国之后，偏离了西方市场和法治经济的轨道。脱欧和特朗普政府都明显削弱了国际法律规则的作用。传统的西方领导者能否尽快重回其领导地位，能够尽快稳定政治经济局面以及能够尽快重获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信任？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除非美英已经退出了主要国际组织，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能力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都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新的脆弱的全球体系才可能会出现——这种体系与战后七十年来，在美国历届总统的领导下西方世界主导的体系截然不同。显然，中国是新兴的全球经济新星。尽管中国人均收入仅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但根据购买力平价指数，中国国民收入在2017年已经略超过美国。此外预期到2030年或2035年左右，中国人均收入将是美国的三分之二。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已经增强，但美欧联盟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此外，尽管特朗普利用Twitter进行宣传，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期望美欧之间可以就中国和亚洲问题进行经济合作。但是由于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政府的作为，欧盟28国与美国就中国问题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很小。美国总统本人发表了许多靠不住的言论：《华盛顿邮报》（2019）中的一篇文章，通过对特朗普每日所做的虚假和误导性言论建立数据库，重点关注总统的谎言和他那一些不正确的猜想。西方世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混乱局面，未来对欧洲、北美、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会产生哪些严重的影响？

我们不应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虽然美欧之间合作大大减少，但可能在新体系下得到增强。如果美欧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制度分歧，那么欧盟社会市场经济体与美国之间的合作将会变得更加容易。对于欧洲来说，这应该意味着美国的社会政策将与欧盟的主要国家靠齐。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只要美国政党开始更仔细地审视一种更现代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根据这一体系，医保覆盖范围更广，医疗保健服务更好，以及为许多孕妇和未出生婴儿开展多种常规检查（欧洲标准））以及其对美国的好处。如果美国的婴儿死亡率达到德国/法国/英国的低水平，美国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将意味着，美国会在60年内新增约5,000万的人口。根据美国目前的制度，许多相对贫困家庭的孕妇没有能力进行常规的产前检查，而这是美国婴儿死亡率很高的原因所在。多个欧盟成员国都实施了一些有益的制度改革，这种改革对于美国来说同样有用。同时，欧盟可以在一些领域向美国学习。对于欧盟来说，可以选择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中欧之间的陆上物流通道为中欧之间的即时交付新合作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为汽车等多个行业带来许多益处。

欧盟也应该尝试向东盟各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传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这反过来可能会鼓励美国更仔细地审视，在国内实施欧洲的一些改革。

该研究还引发人们对一个问题的思考，即美国为什么不能消除其所面临的贫困风险（最重要的一种风险，即无医保情况下的患病机会），以及美国的政治辩论话题为什么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医保系统，如欧盟各国、瑞士和挪威以及冰岛实施的医保系统。相对于国民收入，西欧国家（EU15）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要比美国少得多，但所有国家的国民预期寿命都要比美国高，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要研究欧洲的医保模式。这项研究还为欧盟和欧洲以及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由于中国仍处于追赶阶段，

因此仍需考虑应在哪些领域采用准欧洲（而非北美）的政策方针，而欧盟各国也可以向中国和美国学习。但是，这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借鉴瑞士或新加坡的模型，因为它们是最优模型。只有我们愿意认真地研究全球基准，才能推动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

2010年，美国基尼系数（不平等程度的度量指标）要高于欧盟（欧盟27国，不含2013年才加入欧盟的克罗地亚），详细信息请参见表1。S10是指总收入排名前10%的国家比例，S1是指总收入排名后10%的国家比例。该比例值是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一种度量指标，从中可以看出美国高于欧盟。另一方面，P90:P10是指排行榜前十位（即第90个百分位）下限与排行榜最低分位数上限（即第10个百分位）之间的收入比。在欧盟27国中，“贫困”家庭占比约为23%，而在美国为33%，但按平均贫富差距（PPP=购买力平价指数）计算，欧盟27国和美国的值相同。

表 1: 欧盟与美国贫富差距对比 (2010 年总收入^a乘以不平等系数)

	欧盟27国 (PPP ^b)	汇率	美国 \$
基尼系数	0.303	0.305	0.380
S10:S1 收入占比	13.8	22.8	15.9
S10 收入占比 (%)	25.9%	26.8%	
总收入 (%)	31.0%	32.2%	46.4%
P90:P10的十分位数截断比率	5.5	8.3	6.1
贫困率			
• 住户占比	23.2%	26.9%	32.9%
• 收入占比	7.5%	7.5%	7.9%
• 平均贫困差距	37%	46%	37%

注：^a 除非另有说明，收入是指净等值收入

^b PPP指购买力平价指数

资料来源: Salverda 2015: EU Policy Making and Growing Inequalities, DG ECFIN Discussion Paper 008, 2015; Fellowship Initiative 2014-2015, Brussels, Table 3, p. 22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政府大力克服金融风波，并缩小贫富差距。此外，对于无能力购买医保而致贫的美国人来说，政府还尽力降低了这些人的致贫风险。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2017）在总统经济报告中（第181页，ACA = 2010年奥巴马医改中的平价医疗法案）说道：“虽然奥巴马执政期间政府制定的、关于贫富差距的财政政策的影响

因指标而异（例如基尼系数下降了 3%，1%的最高收入与 20%的最低收入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下降 20%以上），但所有指标均显示出贫富差距呈显著性地缩小。”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突出指出（第 181 页），由于自 2009 年以来实施的税收变革和 ACA 纳税范围规定，2017 年，对 0.1%最高收入人口征收的平均税率将提高 7 个百分点，即从 31% 增至 38%。对于位于收入金字塔顶端的前 1%（但又不是前 0.1%）的家庭，这些变革将使其平均税率提高 4 个百分点。在 2017 年，收入金字塔中前 1%的家庭收入会降低 1.2 个百分点（7%），即从 16.6%降至 15.4%。委员会还指出，根据 CBO 数据，对于处于收入金字塔低位（即收入排行末端 1/5）的家庭，其税后收入所占比例将从 1979 年高峰时的 7.4%下降至 2007 年的 5.6%，而处于收入金字塔前 1%的家庭的税后收入所占比例从 1979 年的 7.4%增加到 2007 年的 16.7%。很明显，特朗普政府在 2016 年末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和特朗普税制改革使得已经缩小的贫富差距又重新有所“扩大”。在医疗保险方面，ACA 的首次公开实施使美国未参保人群的比例从约 15%降至 10%；1965 年引入的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计划在短短几年内将未投保率从 20%降低到了约 15%（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2017 年，第 202 页）。值得注意的是（第 207 页），儿童（<19 岁）的未投保率稳步下降，并于 2015 年达到约 6%，但 26-64 岁年龄段的成年人的未投保率则有所上升，从 2000 年的约 17%上升到 2010 年的约 20%，而在 2013 年 ACA 首次公开实施后，该年龄组的未投保率有所下降，并于 2015 年降至约 14%。对于 19-25 岁年龄段的年轻人（第 211 页），2016 年的未投保率（2010 年接近 35%）降至约 17%。委员会在标题为“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的经济后果”的报告（第 223 页）中写道：“证据表明，该法案已经成功地提高了新投保人获得医疗、健康和财务安全的机会，并减轻了由于医疗费用无法报销而对整个医疗体系施加的负担。除了医疗方面，该法案也有助于缩短收入差距。”唐纳德·特朗普在 2016 年底的大选中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其承诺会恢复奥巴马执政期间实施的“奥巴马医保”和医疗改革，同时承诺会进行税制改革和新的国际政策（鼓励双边主义，取消多边主义）。详细信息请参阅国际组织的影响。

特朗普在 2016 年美国大选获胜，这表明民粹主义总统在经济和军事强国内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本文所指的民粹主义者定义为：政府（美国政府）实施相当激进的政策措施，试图破坏宪法，在政治上投机取巧，因而不被外国伙伴所信任，此外还采纳有关反移民和民族主义的言论，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并制定了反多边外交政策议程，旨在削弱国际组织的作用。概括来说，这种民粹主义是一种“新民族主义”，它不反映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欧洲传统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有其在数字时代沟通和影响稳定的特点，其中互联网这一新事物至关重要。数字时代下的民粹主义常常发布一些实际上没有根据的新闻/消息，反映和加剧了社会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偏见。主要政府官员编造的故事破坏了社会和选民对宪法和已建立的政党和机构的信心。

在美国历史进程中，美国出现过几位民粹主义总统，而如今，随着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美国又有了另一位民粹主义总统。人们不禁会问，特朗普是如何赢得选举呢？在随后的章节中，本文会对该问题作出一些解答。此外，有人认为，特朗普主义（一种民粹主义，对于特朗普当选和随后的总统连任来说至关重要）代表了结构性的美国政策问题，并在未来将面临许多挑战。反过来，这必将对欧洲、亚洲和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在有关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 2016 年竞选获胜的分析文献中，有几本书值得推荐：

《民主制度是如何消亡的》。在该书中，Levitsky and Ziblatt (2018)列举了一些西方国家（许多拉丁美洲、亚洲和欧洲国家）民主主义的不稳定程度。破坏民主制度的根源通常不是外在力量，也不是选民不支持民主制度等内部因素，而是民主主义通常受到政府或总统本人的攻击，而这些政府或总统往往是借助民主制度上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制度的破坏、新闻自由和承诺为普通阶层选民利益考虑的民粹主义政策是典型的因素。在本书中，特朗普政府被认为处于独裁行为的危险边缘，为此作者使用了四个指标（第 65-67 页）对此进行解释：“（1）拒绝实施民主规则（或实施力度不大）。（2）否认政治对手的合法性，（3）容忍或鼓励暴力，（4）准备限制反对派（包括媒体）的公民自由权。”独裁统治的关键因素还在于，总统试图直接利用联邦机构（如税务机关或特勤局（CIA）），向反对派施加压力，这破坏了主要国家机构的中立性，在由法治塑造的体系中，这些机构不应成为总统压制其他派系的武器。土耳其和俄罗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美国也出现这种现状。作者明确指出，多年来，放弃政治宽容和对政治对手的尊重一直是削弱非正式的政治体系的手段之一，特朗普总统加快了最初美国茶党在共和党内发起的激进运动进程。

Barry Eichengreen 在《民粹主义的诱惑》的研究对此类议题有着建设性的贡献（Eichengreen 2018）。在书中，他研究了美国民粹主义所经历的一些历史事件，并着重指出了特朗普主义和美国民粹主义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他指出，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并非为零成本的。该书列举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例子。肯尼迪总统于 1962 年将进口关税削减 50%（通过《贸易扩展法》），制定了关于工人再培训和求职援助的计划，“并为因外贸而流离失所的工人提供了额外的资金援助，以争取工会领袖对贸易扩展法的支持”。Eichengreen 认为，二十一世纪初的许多政治家尚未建立这种联系：“失败的勇气……或简单的逻辑失败”。有资料补充说明，对荷兰的调查结果表明，对普通工人人的培训/再培训的社会回报率可能不会比对技术工人的培训/再培训的社会回报率低（Fouarge 等，2013）。尽管普通工人人申请培训、再培训项目时会遭遇一定问题，但没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认为只有培训技术工人人才会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如果经济全球化加快了产品创新的周期，那么很显然，那些参与全球竞争的公司应该对技术工人进行再培训。美国和欧盟内的许多领先企业的确在实施此类计划。Eichengreen 强调了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 2016 年总统大选期间，在拉票会中发表了他对于移民的看法，特朗普认为，社会政策所带来的一大部分好处都流向了经常利用社会政策体系的移民，为此应该抵制移民政策以及扩张性社会政策。正如对美国社会政策的分析结果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猜测不正确。民粹主义政治宣传的原则是无休止地重复阐述关于现实的虚构言论，直到大多数民众接受他们宣传的内容，并认为这就是一种现实。

Pollak and Schweikart (2017) 认为，报纸、电视台等传统媒体低估了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的受欢迎程度。特朗普每月宣传一个关键主题的策略、线上营销手段以及在全国许多城市的支持者们之间的多次会晤等都奏效了，而希拉里·克林顿却没成功。

另外，在 Isabel Sawhill 的《被遗忘了的美国人》的书中，她使用了许多描述性研究成果着重展示了选民对联邦政府信心下降以及普通工人人工资持续下降等问题（Sawhill 2018）；显然，这些结果都需要在包括经济和其他关键因素的范围更广的分析框架中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分析。在不考虑中国的扩张以及亚洲整体态势（可能包括

日本，因为在国际基础设施投资情况中，日本的确可能成为中国扩张计划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了解美国的经济动态，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随着数字化的推进，世界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舞台，其中线上辩论、对国外竞选活动的线上干预以及线上业务将成为国家政治经济发生变化的新要素。

当特朗普确实获得了各种社会阶层的支持时，收入低于 30,000 美元的群体对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显然相当低（BBC 2016）：该群体对奥巴马的支持率为 63%，相对而言，米特·罗姆尼只有 35%；希拉里·克林顿获得 53%的支持率，特朗普为 41%；拥有高中文凭的选民中有 51%支持唐纳德·特朗普，而希拉里·克林顿则获得了 45%的支持。拥有高中文凭的选民可能担心美国中产家庭（或收入金字塔中处于较低位的 50%家庭）收入占比下降的风险。

如果特朗普主义是一种的暂时现象，那么美国的主要国际合作伙伴（乃至国际组织）没必要大范围地调整政策或制定新的战略。然而，有人随后会争辩说，美国贫富差距的长期加剧，再加上特定的美国选民、观点以及贫富差距的三重驱动因素（ICT 扩张、全球化和中国强劲的出口增长）会引发特朗普主义结构性问题：出于不难理解的原因，美国出现了强大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而这种力量很难被打败，尽管最后，也许是在十年之后，大多数选民可能意识到，美国民粹主义无法兑现他们的诺言。特朗普政府实行的政策与经济和气候政策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由于忽略了科学建议，因此这些政策本身就与美国的政治传统和“更高层次的常识（科学分析结果）”相矛盾。在下一节中，将了解特朗普主义的新解释。该节内容显然表明，即使特朗普总统将在下一届大选中败北，特朗普主义/美国民粹主义也不会就此结束。但是，如果特朗普主义对欧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构成结构性挑战，那么与特朗普主义只是一种暂时现象相比，该政策所产生的反应将会完全不同。

针对经济学家关于民粹主义的观点，作者 Dornbusch 和 Edwards（1991）在其《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一书中对民粹主义做出了一个实用的定义：民粹主义关注的是收入再分配，而不注重由于政府在中期实际支出的大幅增加、引发通胀的政府融资计划以及凌驾于市场调节之上的政策干预措施而可能导致的经济不稳的风险。

自 1960 年代以来，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多轮洽谈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施行国际贸易开放政策，并降低了跨国贸易门槛。随后的世界贸易组织旨在实行贸易自由化。世贸组织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旨在帮助各国避免发生国际贸易冲突，和平解决该类冲突，并降低关税、减少全球其他贸易障碍。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清算银行（BIS）都是领先的全球国际组织。贸易的全球化使得全球各国的人均收入趋于一致——这与 Heckscher-Ohlin 贸易定理相符合，Heckscher-Ohlin 理论是以本国和国外均使用相同技术这一假设为基础。根据 Heckscher-Ohlin 定理，一国应该深耕其比较优势。资本（包括机械设备）相对丰富的国家（如美国或欧盟）应主要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汽车，而劳动力相密集型国家（例如孟加拉国）应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资本-劳动力比是一种可以很好地识别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力密集型国家的指标。中国于 1978 年开放贸易，直到 2001 年才加入 WTO。Heckscher-Ohlin 定理不考虑国际要素流动性，例如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性。然而，实际上，自 197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体（此处不包括中国）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具有高度的国际资本流动性。此外，贸易全球化与外国直接投资（FDI）、全球信息和

通信技术（ICT）的推广、国际移民等因素相联系起来。越来越快的贸易和资本流动提高了全球人均收入，但同时，在许多国家，人均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底层人士越来越贫穷，可能会出现移民潮，十分贫穷的人可能会移民到其他国家。在全球化时代，贸易不仅实现自由化，而且还可以吸引来自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对内外国直接投资流。对内外来直接投资通常会带来一些国际技术转移，从而提高东道国的劳动力效率和资本生产率。

简而言之，对于美国和其他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中贫富差距加剧，现总结如下：ICT /机器人技术提高了资本收入份额，部分原因是在高数字创新动力与网络的双重效应下，与 ICT 相关的许多产品能够在众多产品中脱颖而出，正如 Welfens (2002) 强调的一样。就信息和通信技术推动数字市场和相关市场内产品价格实现良性差异化而言，其数量将与标准竞争市场模型（需求线和供给线的交点（边际成本曲线）决定了均衡点）数量一样。但是，由于现在平均价格(p_1)高于竞争性统一价格(p_0)，因此利润更高（请参阅附录 B 中的图表）。显然，这一方面表明各领域的利润率以及国内生产总值（新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总价值）中总利润份额均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工资收入比有所下降。此外，数字市场通常具有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的特点。这两种现象提高了在相关领域的市场支配力，因此提高了成本加成率，利润率将再次提高。

正如金融全球化一样，在未来，数字化扩张将持续进行，直到主要国家设置国际资本流动障碍。金融全球化意味着低实际利率，劳动所得较高的家庭（技术工）和已经拥有相当大财富的家庭将从中受益，因此他们为了获得大量贷款可以向银行提供抵押品。非技术工人是数字和金融全球化的输家---而工人确实经常被银行出售的反竞争的贷款和支付保护保险捆绑剥削。从普通工人角度来说，金融全球化是不公平的，这可以简单地通过国家或国际竞争政策加以补救，按照这些政策，银行禁止做出捆绑销售；但即使在德国，这种捆绑销售也一直持续到 2016 年，那时德国改变了其法律，要求银行允许替代供应商签订付款保护合同（非捆绑式）。技术朝着某一方向进步所产生的结果也有利于技术工。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中，越来越多的人使用 ICT / ICT 资本，因此对技术工的需求增加。Jaumotte 等人（2008）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从贸易全球化的层面来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南半球各国经济迎头赶上北半球经济，也有利于国际经济融合，但经济全球化是偏爱技术工的。由于技术进步是建立在 ICT 基础上的，因此对技术工提出了相对需求。Jaumotte 等人（2008）认为，几乎每个国家都会提高技术工的工资与普通工人的工资之比。Foellmi 和 Martinez（2017）调查瑞士情况得出，通过 FDI 全球化以及国际证券投资的上升，全球化也有效降低了资本所得税。收入排行榜中前 1% 的人都有国外收入。对国外收入征收的税收要比国内收入少，这部分是由于国外收入存在一定的风险溢价。

避税问题、外商直接投资和 20 国集团

即使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FDI 数据缺口也同样令人惊讶。研究结果表明，部分该类缺口与海外隐藏收入有关，因此我们不能盲目信任官方的统计数据，因为这些数据会引发人们对储蓄和国际投资实证分析结果提出质疑，如所谓的费尔德斯坦-霍里奥卡

难题。费尔德斯坦-霍里奥卡认为，尽管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OECD 和一些新兴国家的资本流动性明显增加，但所有投资均出自于 OECD 国家国内融资力量。但是，这一发现可能仅反映了关键数据问题，因为尚未有研究充分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海外再投资收益相关信息。确实，费尔德斯坦-霍里奥卡之谜的一部分与数据问题有关，如 Alvaredo 等人（2018）在《世界不平等报告》中提出的数据问题。在关于西班牙财富不平等的一章中，Alvaredo 等人讨论了 Martinez-Toledano（2017）的研究结果，该研究采用了瑞士国家银行数据并结合了西班牙 2012 年发布的税款赦免政策（使用瑞士国家银行的数据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Martinez-Toledano 发现，经估计，西班牙公民未申报的海外财富为 1500 亿欧元，占个人金融财富的 8.6%。2012 年，对于 50% 的未申报海外财富，其持有方式为投资基金、30% 股票和 18% 储蓄。

如果包括投资基金和股票，则总金额达到 1200 亿欧元。假设 600 亿欧元是指对持有 10% 以上股权的公司的投资以及 FDI 的投资，则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隐藏金额为 600 亿欧元，约占西班牙 GDP 的 5%；如果股本回报率（总值=净值）为 4%，则西班牙每年外流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隐藏金额为 24 亿欧元，占西班牙 GDP 的 0.2%（占西班牙官方对外投资总额的六分之一以上）。我们无法从上面的例子中轻易得出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情况一样，因为就隐藏的对外和对内外国直接投资来说，各国之间确实确实存在差异，这对准确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说至关重要。对于外直接股票投资隐藏净额数量不小的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差值被低估，因此在估计消费函数、储蓄函数和进口函数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比例结果时会出现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西班牙的数字只能表明海外隐藏财富值被低估，因为 2012 年的税款赦免数不太可能代表西班牙公民的海外所有隐藏财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隐藏数可能是《2018 年世界不平等报告》作者们估计的隐藏数的两倍，这意味着西班牙对外直接投资隐藏金额（可能是所有其他国家）占 GDP 的 0.4%，因此在 2.2% 的投资为隐藏的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投资与 GDP 比为 18%。当然，这在简单的 Feldstein-Horioka 回归分析中无法识别这一点。如果假设隐蔽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总外国直接投资的八分之一，那么外国投资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8%。这样一个数量级值与经济有关，国际研究组织的经济学家应该能够以较精确的方式识别和分析这种现象。然而我们很奇怪地发现，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政府对弥合这种统计差距几乎不感兴趣。

但是，似乎没有多少国家真正致力于揭开海外财富持有量的秘密。尽管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强调打击海外逃税行为，但许多欧盟国家却对此犹豫不决-特别是英国（在我申请获取银行业 FDI 数据之后，官方机构研究人员回答：您真的认为有人愿意向您提供这些数据，来揭露国际逃税行为吗？）。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某些国家（瑞士、英国和加勒比海群岛某些国家）从经合组织成员国等处吸引了大量的隐性资本流入，并从海外财富持有量中受益。我们可能会认为，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在公司税率和最高所得税率领域的巨大分歧刺激了国际逃税行为。那么，避免越来越多的不当逃税行为将是 G20 峰会以及实际上包括瑞士在内的 G20+ 团体之间进行税收合作的目的所在。各国之间达成的最低公司纳税标准和类似的税基对于在全球税制中实现更高等级的公平性以及推倒民粹主义可能非常有用，这成为一种政治趋势，有利于为贫困阶层重新分配财富，而这些人会担心全球化会对其带来不利影响。但是，随着全球税收越来越公平，对于正常的政治体制而言，担心经

济全球化的必要性显然会减弱。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的确是制定越来越多的、为贫困阶层考虑的、通过税收方式筹集的财富重新分配政策（例如在德国，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部长 Hubertus Heil 即将推出一项“基本养老金”计划，为所有工龄至少为 35 年且收入较低的人们资助近 1000 欧元的基本养老金：每月补贴最高可达 450 欧元）。通常不被政治家理解的是，通过税收方式筹集的基本养老金会产生双重经济副作用，即储蓄率降低，以及所得税提高（由社会福利增多可以看出），因此从长期来看，增长路径较低。我们可以通过 Solow 改进版增长模型，轻松验证这一点。根据 Solow 改进版增长模型，使用税款进行社会保障这一做法通常会降低有效储蓄率，从而带来实际的收入损失：当 Heil 部长在 2019 年 2 月初公告说该计划的养老金受益者人数为 3-4 百万，金额达到 5-60 亿欧元，但是他没有告知公众储蓄率降低了 1 个百分点，这表明了这一项退休后改革激励措施使得退休金降低，特别是在 2025 年之后，当德国人口老龄化加速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这会使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降低约 0.5%，加上税率以及 40% 的社会保障率，产能将下降 170 亿欧元，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将减少 70 亿欧元。这意味着，由于养老金改革（无论多么受欢迎）计划不周所产生的实际本可能远远超过直接预算成本。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税率的提高不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因此，在二十一世纪流动资本不断增加的世界中，老龄化社会很可能会面临重大挑战。

人们可能会期望，政府工作部门应该会考虑到这种影响，而不是简单地忽略或抑制最重要的直接负面影响。这与西方民主主义精神不相符，因为该精神始终强调应该进行批判性分析以及建立适当的改革模型。在西方民主国家中，中间党越不成功（即政府组织越不专业），民粹党上台执政并痴心妄想地想要建立完整世界的愿望就越容易实现。

工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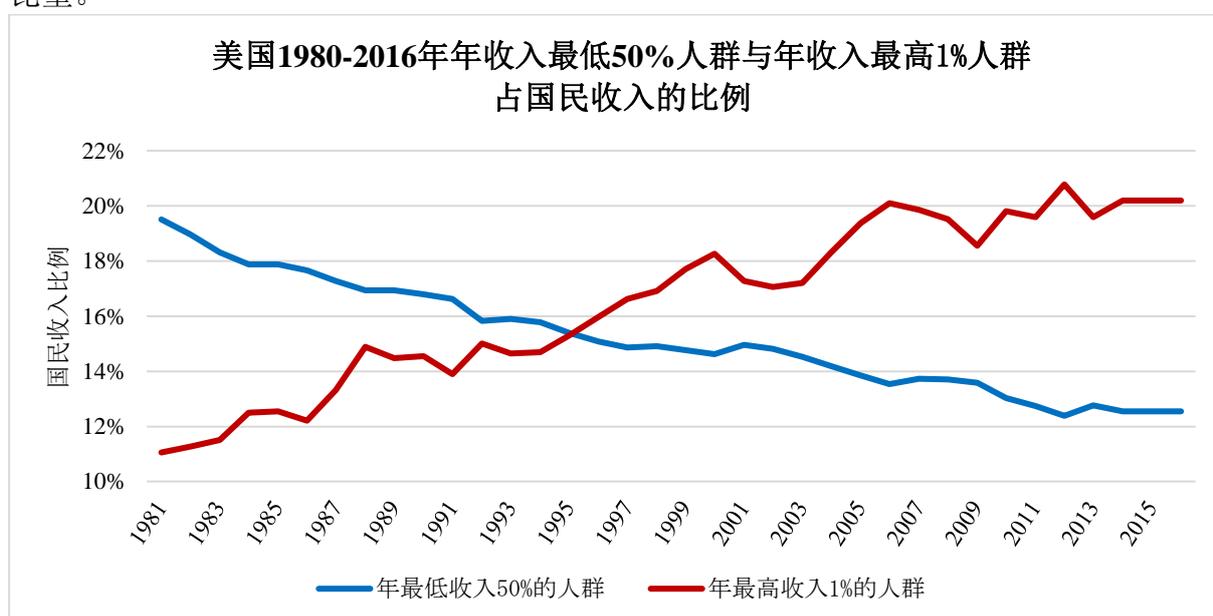
经合组的一项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工资差距加剧的最关键驱动因素是中国（参见 Breemersch 等人，2017 年）。自 1985 年以来，中国实现强劲的出口增长，令世界瞩目。中国的出口使得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中出现了工资两极分化：由于出口动态和结构性出口格局，市场上已经没有了薪资中等的工作，因此中等收入阶层正面临新的挑战。中国的出口削弱了美国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地位，并加速了美国的结构变革（Autor 等人，2016）。中国作为主要经济体和出口国，由于中国向世界大量出口价格相对低廉的产品，因此某些领域内的商品价格相对下降，这可能会使 OECD 国家面临工资下降的巨大压力。在具有优质的人力资本和再培训计划覆盖范围广的西欧国家中，面临中国进口压力的公司可以通过寻求产品创新，以此来避免市场份额和出口单位价值的下降。然而，在美国和英国，失业人人均再培训支出较低（德国的支出是英国的四倍，大大高于美国）。

如果不考虑德国统一以及东德人均收入更高（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产生的工资差距，德国工资差距不会增加太多。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亚洲相关的增长动力，德国会从中受益，因此其机械设备的出口量会有所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最低

工资水平的下降也可能加剧美国的工资差距现象，此外 1980-2016 年间观察结果显示，美国工会数量也有所下降（Eichengreen，2018 年）。

应该指出的是，在美国，收入较低的一半人口的国民收入份额从 1981 年的 20% 下降到 2015 年的约 13%（见图 1；西欧情况，见图 2）。此外，数字化的发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增加以及中国全球出口的增加，这些因素所产生的组合效果加剧了美国的工资差距。

图 1: 美国 1980-2016 年收入* 最高 1% 与收入最低 50% 分别占国民收入（市场收入）的比重。



*注：占国民收入比重指税前收入。

资料来源：利用世界不平等数据库（<https://wid.world>）上提供的数据，自行整理所得

在同一时期内的西欧，下半部分收入较低者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并没有下降太多，仅从 2015 年的约 22% 降至约 20%。然而，在美国，美国工资差距动态图，以及美国的社会调查结果，均表明了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

- 大多数美国受访者认为，工资差距加剧（尽管他们认为努力工作是收入增加的基础条件）是一个问题，但相对多数人的首选补救措施是，大公司应作出改变来减少工资差距-参见 Lindh 和 McCall（2018）。还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为减少工资差距而实施的干预措施并没有获得多数美国选民的支持。Lindh 和 McCall 的发现结果可以简要概括为：这是美国公众的一种幻觉。在美国式的股东经济中，不能指望主要上市公司会愿意以某种方式降低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或大幅提高普通工人的薪水。我们应注意，美国在可贸易产业所面临的某些挑战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无关，而与中国向所有进口国的出口增加以及世界市场价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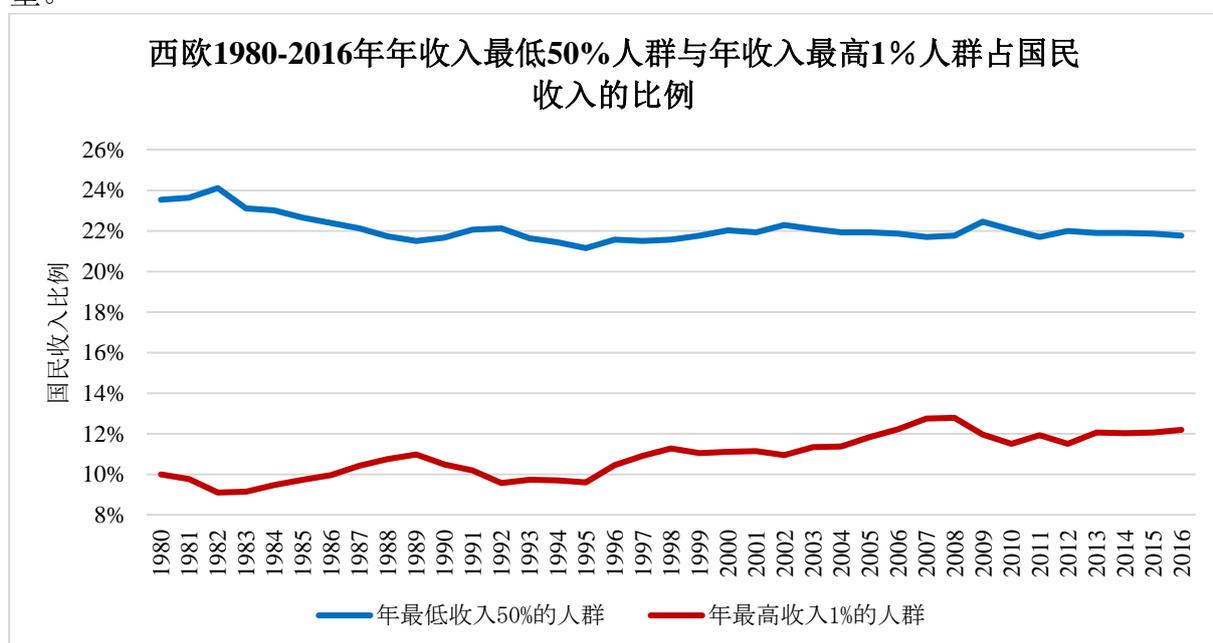
降有关。因此，如果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进口关税，这一行为不会提高相关商品的世界市场价格；相反，会降低世界市场价格（扣除进口关税）；

-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来说，日益严重的工资差距与美国无力/不愿扩大收入再分配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强烈矛盾，会使贫困选民继续感到失望。因此，民粹主义总统会向“被遗忘的男人和女人”承诺改善其收入状况（特朗普在 2016 年总统大选中所说的话），以及进口保护主义和反多边主义政策（主要向选民展示国际政治激进主义思想，并为无效的民粹主义政策提供替罪羊）可能成为美国的一种长期现象；
- 美国民粹主义领导人试图将民粹主义思想传播到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通过推动其他国家的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特朗普政府破坏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制造新的国际冲突、使全球繁荣消退。美国的确可能会破坏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稳定，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期间支持英国脱欧是第一步（特朗普提议，任命民粹主义反欧盟党 UKIP 负责人 Nigel Farage 为美国驻英国大使。驻英大使的变动是民粹主义奇怪政策思想的一个例子）。因此，美国可能会使得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新的安全问题。特朗普关于提高军品出口，以此改善美国贸易平衡的战略提议，最终可能会引发新的安全问题。
- 在选民们理解民粹主义许下的都是徒劳无用的诺言之前，美国的这个民粹主义问题可能会持续存在。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在专制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在德国和奥地利，时间更早（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部分地区就已经察觉了民粹主义无力实现承诺的问题。在民粹主义的初始扩张阶段，民粹主义通常会夸海口，许诺言，常常带有宗教或强烈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色彩；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实施部分诺言，和反国际主义或反全球化（特朗普 2018 年 9 月 25 日于联合国的讲话）。最后阶段的特征是内部矛盾和国家或国际冲突不断激化。特朗普政府无力执行一致的贸易政策，是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民粹激进主义的开端。由于特朗普只能重新任命其前任总统奥巴马遗留下来的四分之三的政治职位，因此特朗普政府在关键领域也面临着无力施展其权利的危险。如果发生国际经济危机，IMF 的工作人员不太可能真正知道他们应该与财政部的哪些员工合作。实际上，在奥巴马任期结束之后，有许多职位处于空缺。此外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前后不一致的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务部几十个经济专家席位的空缺。在阅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一篇关于美国关税政策福利影响的报告后，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长期来说，关税政策对美国的经济影响是消极的（Kim & Shikher 2017，有关福利损失的详情，请参阅附录 B）。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政府可以让人联想到 Goethe 的魔法师的学徒——当大巫师不在家里时，学徒试图运用他先前观察到的各种巫术咒语，但由于他不了解施法的原理，因此唯一的结果就是淹没了建筑物，直到最后，大巫师回到家，将所有东西放回原处，一切才得以复原（请参阅附录 D 中这首诗的翻译版摘录内容）。
- 我们不能否定的是美国政府在未来可能会决定实施欧盟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欧盟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收入再分配和社会政策，对于之前政府很少干预的美国来说，不是一场自然形成的改革，而是一种控制下的社会政策，反映了美

国在移民方面是全球领先的地位（选民会担心过度慷慨的社会政策会吸引非技术类移民人数增多）。在医保领域，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美国的医保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大约是德国/法国/英国的两倍，而预期寿命却比后者约低 2.5 年。不考虑医疗保健支出，并考虑到这些国家实施的长假政策（与美国相比），西欧国家的人均消费量大约和美国一样高。据统计数据显示，西欧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比之前几乎降低约 30%。

西欧经济两极分化程度一直要低于美国（见图 2）。

图 2: 西欧 1980-2016 年收入最高 1% 与收入最低 50% 分别占国民收入（市场收入）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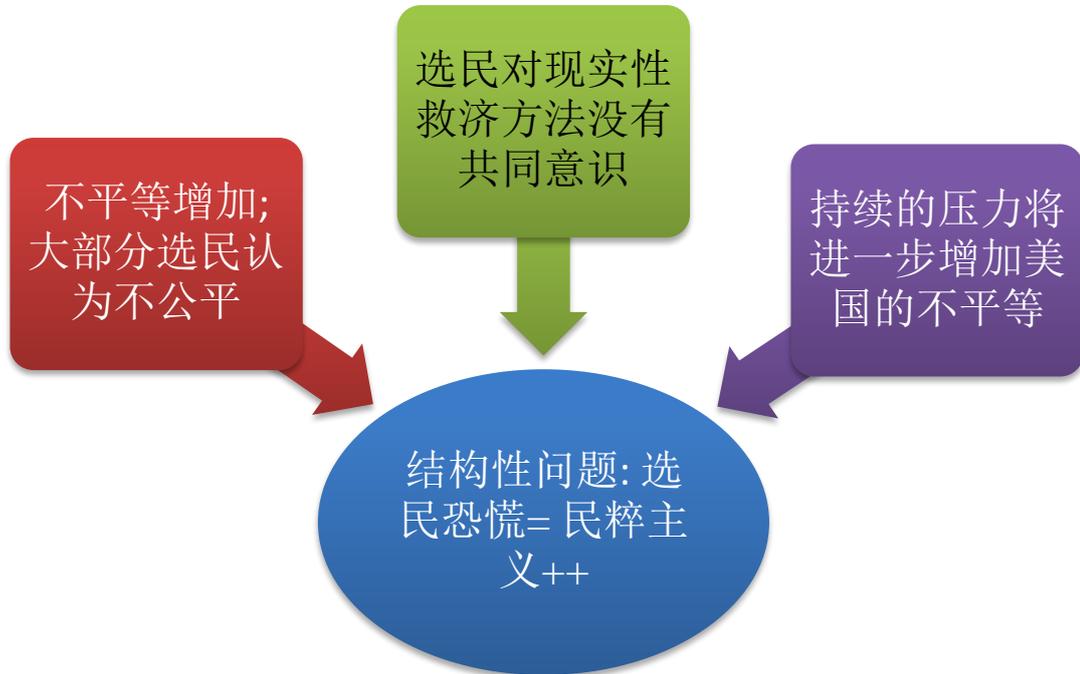
*注：占国民收入比重指税前收入。西欧是指德国，法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欧洲其他地区通常是指除德国、法国和英国之外的地方。

资料来源：利用世界不平等数据库（<https://wid.world>）上提供的数据，自行整理所得

有关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国民收入比重，请参阅附录 A。经合组织成员国中资本占比的增加以及所有国家/地区技术工工资溢价的不断上升，刺激了全球移民，使得某些国家更加仇外并实施民粹主义政策，特别是面临难民潮的国家。难民和移民所引发的政治混乱局面表明西方世界部分地区政治理性的下降。可以通过实施再分配政策、社会政策、教育政策和再培训计划（应提供通用、有效且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数字版本），来缩小南北国家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潜在收入差距。荷兰的经验表明，对普通工人的再培训所产生的教育回报率并不比技术工的低，但是普通工人申请再培训计划的意愿似乎通常比技术工人的弱。国际组织应在帮助收集相关数据和组织基准测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我们可以轻松总结并解释特朗普胜利和美国特朗普主义/民粹主义扩张现象（见图3）。

图 3: 美国结构性民粹主义问题



资料来源：自行整理所得

只要选民对不断加剧的收入差距加剧感到失望，并且这一现象还将继续下去，那么民粹主义将在政治竞争中轻松取胜。

经济不平等与文化反冲假说

Inglehart 和 Norris（2016）通过考察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得出了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扩张与不断变化的经济不平等现象之间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与文化反冲有关：根据 2014 年 Chapel Hill 专家调查，作者确定了欧洲 31 个国家中 268 个政党的意识定位。根据欧洲社会集中调查所得的统计数据，作者一方面分析经济不安全/不平等影响的跨国证据，另一方面又分析了民粹党支持率预测指标的文化价值。文化反冲假设得到充分佐证。作者总结了两种解释民粹主义兴起的方法（第 2-3 页）：

“有大量证据表明，西方国家收入和财富不均现象将愈演愈烈……根据这种观点，左翼分子所具有的、越来越强烈的经济不安全感和社会剥夺感加速了政界的愤慨……另一个相关说法是，文化反冲理论表明，民粹党支持率激增不能简单定性为一种经济现象，而应该被视为对渐进式文化改革的回应。该理论以“价值变化的无声革命理论”为基础，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人民在战后几十年来生活在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的安全环境中，因此人们的观点开始朝着后唯物主义价值观（如世界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转变，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绿党等自由主义左翼政党，以及其他有关环保、人权和性别平等的进步运动。我们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地看出，人们对这些发展的响应引发了强烈

的反革命反冲情绪。尤其是在老一辈、白人和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中，这些人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衰落，并主动拒绝进步性价值观的升高趋势。他们对他们所熟悉的传统常规的缺失表示愤慨，并拥护民粹主义。”

尽管作者提供了关于欧洲国家文化反冲假说相关性的经验证据，但我们不应该排除这一假说也适用于美国情况这一可能性。但是，有几个参数需要考虑：

- 当然，美国民粹主义的动力更多地来自于不平等现象——实际上，如上所述，美国不平等比西欧更为严重，而相当多的欧洲人具有 Inglehart and Norris (2016) 所提的文化反冲特征。欧盟国家更容易成为穆斯林国家人民的移入国，在冷战结束后新兴宗教力量崛起时期，这些国家倾向于强化传统价值观，制造身份问题和文化不确定性。自 1979 年在推翻 Shah 国王统治后，伊朗宗教领袖 Ayatollah Khomeini 的上台极大地刺激了政治伊斯兰现象，自此伊斯兰恐怖主义在部分穆斯林国家蔓延数年。此后，许多欧盟国家将来自阿拉伯国家、土耳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难民和移民视为一种安全威胁。
- 这两种假设可能都与美国欧（或两者之一）的民粹主义支持率有关，我们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
- 自苏联在 1991 年解体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恐惧感越来越弱，正是这种恐惧感，西方各国曾团结在一起。此外，许多欧洲国家还表现出政治纪律开始松散这一趋势。美国不再是主要的领导人。为了帮助西方世界组建成一个经济实力更强、社会更稳定的团体，美国一度对在幕后介入欧洲事务很感兴趣。我们很难想象某个保守派政府（如 2009 年希腊大选时发生的情况）本意想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的赤字比为 4%，而真实的为 15%，但是由于担心自身的经济危机而失去美国的支持，从而没有这么做。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签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议等方式，加大美国在亚洲的参与度，这也使欧盟国家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向美国抱怨说，美国并没有对欧洲给予足够的关注，只有到奥巴马上任后，才决定洽谈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事宜，但是，直到 2016 年底，谈判仍未结束，因此新当选的特朗普总统才能抓住民粹主义机会，试图取消该项目。

有充足的证明可以佐证，随着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以一种不为大众所知的方式发展，因为在美国 2018 年中期选举期间投票后民意调查中并未显示该点（仅仅因为相对多数的美国选民认为，不平等不是一种政治问题，而是大公司应该注意的问题。这是一种错觉，必然会造成民众对政府越来越失望）），美国情况与欧洲不同。但是，一旦民粹主义总统重新当选，美国民粹主义将拥有足够的动力和资金，将其思想广泛传输到欧洲和拉丁美洲。

在巴西，新民粹主义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与特朗普总统持相同观点。继特朗普之后，贾尔·博尔索纳罗认为气候保护不是政治优先事项，而经济增长才是优先事项。显然，如果美国民粹主义在该地区拥有意识形态上的合作伙伴，那么美国民粹主义将更

容易地实现繁荣发展，因为这将促进美国与各个伙伴国家在某些领域达成合作。此外，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上形成的区域网络会人们普遍认为民粹主义正在崛起并且是一种成功的思想意识，因此更加吸引那些希望成为大选获胜方的浮动选民。尽管反移民问题对特朗普成功当选和对英国脱欧都起着作用，但英国的情况与美国有很大不同。

反欧盟 UKIP 党（右翼民粹党）时任领导人奈杰尔·法拉格在 2016 年初的全民公投期间强调，英国面临着大规模移民和庇护问题，与 2015 年的德国情况类似。UKIP 党在电视上展示了德国于 2015 年遭遇的情况。在默克尔总理于 2015 年 9 月向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的难民开放了边境之后，2015 年 9 月，大量的难民不受控制地涌入德国。（不幸的是，默克尔总理在没有经过柏林议会辩论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决定，因此在德国该决定的支持人数很有限，且不太合法）。法拉格的观点极具误导性，因为英国（爱尔兰一样）不属于欧盟的申根区。在申根区，人员跨国流动通常无需受到移民管制。Boris Johnson 在 2016 年公投中警告，如果英国继续选择留在欧盟，将面临来自土耳其的大规模移民潮。法拉格和 Johnson 创造了一种政治恐惧感，旨在从社会底层人士那里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因为这些人可能会担心不断涌入的移民和寻求庇护者会压低他们的工资，夺走工作并加大住房压力。

美国的情况与大多数欧盟国家不同。在欧洲，与美国相比，提供强制性医疗保险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状况。同样明显的是，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西方贸易伙伴，因此，与许多欧盟国家相比，美国更容易受到结构性变化的影响。虽然美国快速的数字现代化进程有利于美国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某些子领域的垄断者，从而提高其国民收入中的资本份额，但这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的结构变化和工资两极分化。由此可以得出，美国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必将进一步增加。但是，有人可能会争辩说，美国约 40% 的家庭（见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 2017 年发布的报告）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了一些股票投资，因此确实可以从功能性收入分配中不断增加的利润占比中受益。值得注意的是，与 70 年代或 80 年代相比，现在，社会底层人民可以更轻松地组织起来。互联网和数字社交媒体平台为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相当便宜且有效的社交方式。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互联网社会中已经成为可能。因此，政治民粹主义进入了一个可以轻松获得群众支持的时期，这种现象在美国、拉丁美洲和欧洲，甚至可能在这些地区之外仍然存在。有人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互联网会导致西方国家面临阶层分化（Conover 等人，2011）。但是，以简单而令人信服的方式从互联网上收集经验证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乎没人会否认，特朗普在 2016 年的竞选活动中相当有效地使用了互联网-包括 Cambridge Analytica 工具，以此鼓励其追随者支持一个相当激进的政治计划，并劝阻希拉里的潜在支持者，放弃支持相当中立的政治方案（Howard 等，2017）。至少在美国，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在特朗普党派中，互联网助长了政治分化。当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他继续利用互联网和 Twitter，游说更多的人，为其政策提供更多政治支持，包括他的一些激进计划（例如美墨边境的隔离墙）。

相对收入份额和绝对收入水平

就美国而言，一半数量的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会长期下降。如果在接下来的 35 年中，其收入以 1981-2013 年的速度继续下降，那

么 2050 年 50% 的最低收入者（即家庭/选民）的收入将仅占国民收入的 6%。就此点来说，如此严重的经济两极分化现象可能会导致美国向欧洲的移民人数显著增加，除非欧盟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人们还必须考虑到，美国如此严重的经济两极分化将引发大规模的政治激进化运动：收入金字塔中收入较低的 50% 人群可能会在美国社会内部寻找某种政治共识，因此那些充分强调会加大脱贫力度的总统将在选举中获胜，例如，通过降低大学学费和加大再培训和教育投入力度等。还可能会直接重新分配收入，例如，对高收入者征收更高的所得税，加大向低收入家庭（无论是联邦还是整个国家）援助的力度。我们不应该排除一种可能，即在 2018 年之后的三十年中，由于数字式工作将实现标准化，软件更易于使用，因此技术工目前享有的工资溢价将大幅下降。但是，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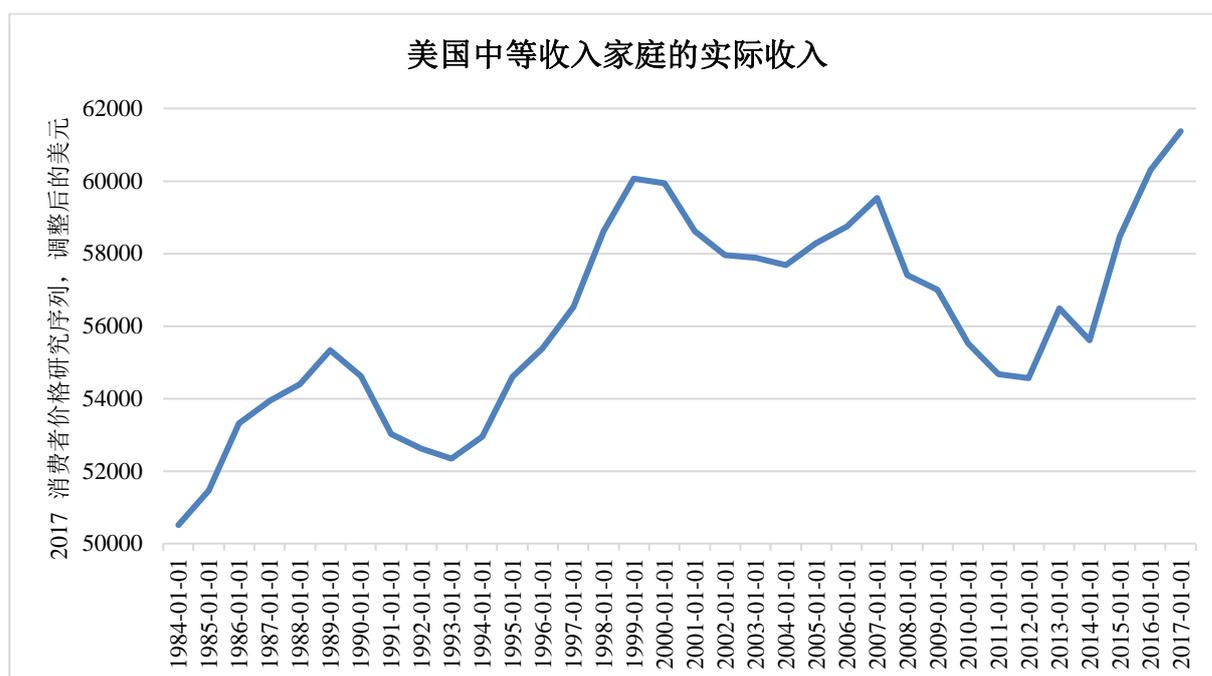
承认美国收入较低者的相对收入状况持续强劲下降不仅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具有政治意义，可以从新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此进行分析：

- 在美国，这种收入两级分化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 与欧盟，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发展势头如何？
- 数字社会可以为贫穷人民的政治利益带来哪些好的或坏的条件？
- 中等收入家庭的绝对收入水平（以实际价值计算）是否足够高，从而使得该群体和收入最低的 10% 家庭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所得税抵免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市场收入非常低的人而言-政治体系是否可以从政府资金中拨出足够的资金？
- 美国普通工人和半技术工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表明中国在某些领域出口增长率较高，这导致了美国制造的产品价格下降。如果美国生产的商品（例如，电视屏幕）并不多，那么，美国会进口更多廉价消费品（例如平板电视，计算机/平板电脑），因此由于绝对下降的价格，美国实际收入会增加，特别是数字领域的产品（ICT 产品）。

但是，对于美国而言，实际工资是否能够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如果实际工资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保持一致，工资收入的份额就不会下降。回顾过去的 50 年，Feldstein (2008) 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尽管考虑了非工资福利。关于美国的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很明显的是多年来一直保持一种适当的速度增长（见图 4）。然而，由于美国的人均实际 GDP 一直在增长，因此实际 GDP 与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似乎越来越大。

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保持一种适度的速度增长，这可能得益于技术进步的作用（加大了对技术工的相对需求）。Jovanovic 和 Rousseau (2005) 指出，在 1870-1915 年期间，美国技能溢价相当高。在电气化浪潮的后期，技能溢价从 1.7 急剧下降到 1.1，在 1978 年以来的计算机/IT 浪潮中，技能溢价再次上升：1980 年之后的三十年中，技能溢价为 1.2 到 1.4。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由于高收入者通过股票、债券、房地产和其他资产的收益形式获得财富，因此其收入份额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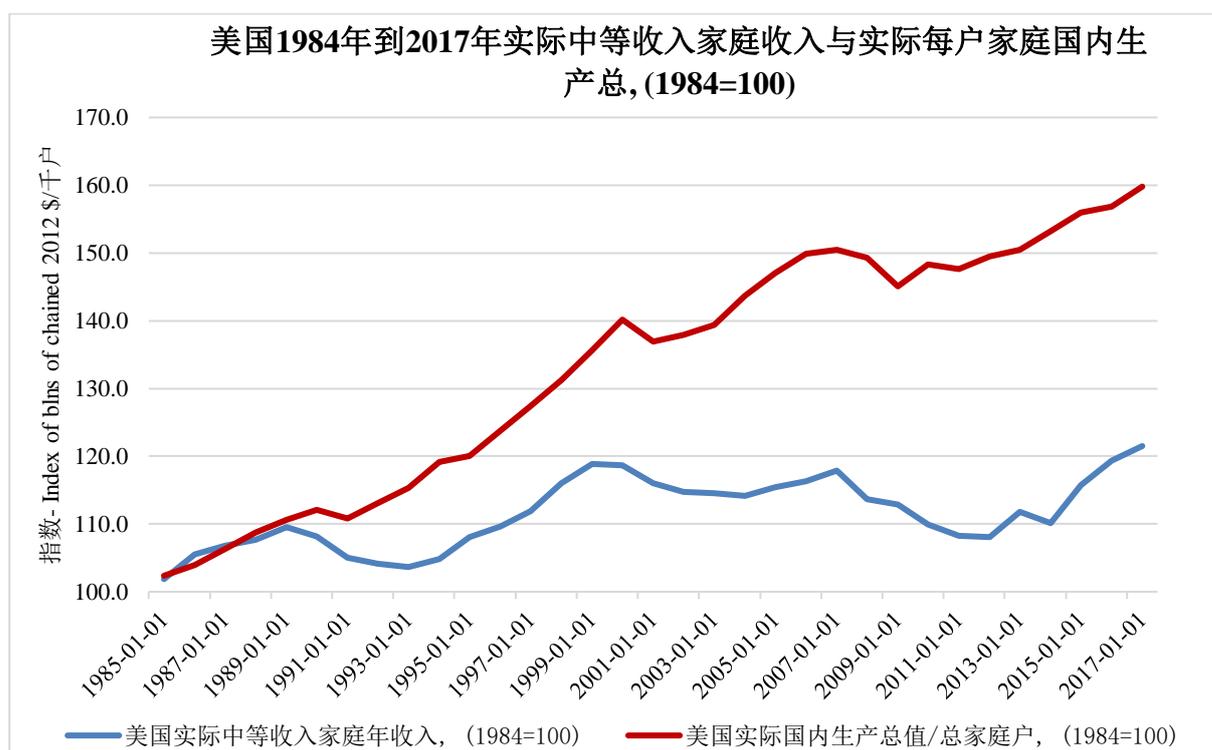
图 4: 1984-2017 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 根据美联储经济数据、从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获得的数据, 自行整理所得

但是, 应该指出的是, 由于每个美国家庭的成员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家庭数的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 因此美国中等家庭收入数据可能具有误导性。由此导致任何按人均计量的结果 (包括中等家庭的收入) 要比用平均家庭数所得的结果增长的更快 (更多信息, 请参见附录 H)。考虑到家庭结构的变化, 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较小; 然而, 尽管差距有所缩小, 但该差距仍然很大 (Zimmermann, 2016 年)。图 5 反映了这种差距。

图 5: 1985-2017 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与美国实际 GDP /家庭总数之比。



注：年度数基于2012年美元指数1984 =100。

资料来源：根据美联储经济数据、从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获得的数据，自行整理所得

美国消费者金融数据调查：由 Janet Yellen 分析

关于收入和财富的统计数据，《美国消费者金融数据调查》（SCF）给出了有关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独到见解。其中，美联储理事会时任主席 Janet Yellen 做出了关键性的总结(Yellen2014, p. 4):

尽管最近，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差距越来越大，但对特定家庭的影响部分取决于该家庭的生活水平是否随着其相对地位的变化而提高。尽管多数家庭的收入有所增长，并在某些时候手头相对宽裕，但不平等现象却有所扩大，因为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也正在按一定比例增长。如果大多数家庭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可能就不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在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也是如此，当时大多数家庭的实际收入在增加。然而，在其他时候，之所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是因为高收入者的收入和财富增加，但其他人的收入和财富则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了。在其他时候，虽然大多数家庭的收入下降，收入较低者的人数越来越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不幸的是，过去几十年收入差距现象的加剧常常使许多家庭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或下降。

她随后还说道（第5页）：

财富分配甚至比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SCF 结果显示，自1989年以来，财富差距的增长速度超过收入差距的增长速度。[...] 1989年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最富有的5%家庭拥有54%的财富，其财富份额在2010年上升到61%，并于2013年达到63%。相比

之下，在 1989 年，财富分配排行榜前半部分的剩下家庭（2013 年净资产在 81,000 美元至 190 万美元之间的家庭）持有 43% 的财富，而在 2013 年其财富份额仅为 36%。排行榜下半部分的家庭在 1989 年持有 3% 的财富，2013 年这一数字为 1%。

最后，Yellen 描述了美国教育方面所面临的挑战（第 9-11 页）。

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研究表明，家庭资源可以用于未来增收或实现其他经济成果，例如购买社区较安全且周边学校资源较好的住房、更好的营养和保健、早期教育、对学习障碍的干预、旅游和增加其他可能潜在且丰富的经验。资源富裕的家庭拥有大量资源，为孩子成年后具备经济优势打下基础，而 SCF 数据表明，许多其他家庭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导致差距产生的因素还包括可以为后代提供更好的经济基础等其他家庭特征，如房屋拥有率、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以及稳定的家庭结构。

根据 SCF 的调查，过去 24 年中，收入最高和最低且有孩子的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一直在稳步扩大，但最近扩大的速度越来越快。[...]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财富榜上处于低位的、有孩子的家庭的平均财富从 2007 年的 13,000 美元下降至 2013 年的 8,000 美元，下降 40%。与剩下 45% 的有子女家庭财富值不断增加相比，这些财富显得微不足道。但是，这些家庭的平均财富也实际下降了三分之二，从 2007 年的 34.4 万美元下降到 2013 年的 22.9 万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有子女家庭中排名前 5% 的家庭的平均财富仅下降了 9%，从 2007 年 350 万美元降至 2013 年的 320 万美元。

最重要的是，Yellen 的分析深刻地说明并反映了美国财富不平等状况和美国教育系统中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从联邦资金中拨出一些资金，用于提高贫困地区教育和学校质量，可能是造福子孙、实现平等的一种方法。

OECD（2018 年）调查了收入流动性问题（个人或家庭提高或降低收入的能力，将流动性概念与收入不平等联系起来）。他们发现，当一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时，代际收入流动性就越高。经合组的调查结果表明，代际收入流动性也与教育息息相关，如以下摘录所示（见方框）：

OECD（2018 年）调查向上和向下收入流动情况（按照收入金字塔的五分位数；每一区间占总家庭数的 1/5）

“处于中位的家庭拥有更多的机会，但也承担更大的风险

处于收入分配中间位数的家庭（即第二、三、四区间）的收入流动性较高。这不仅意味着这些家庭的收入向上流动的机会很大，而且收入下滑的风险更高，有时甚至下降到最底端：七分之一的中等收入家庭在四年的时间内下滑到收入最低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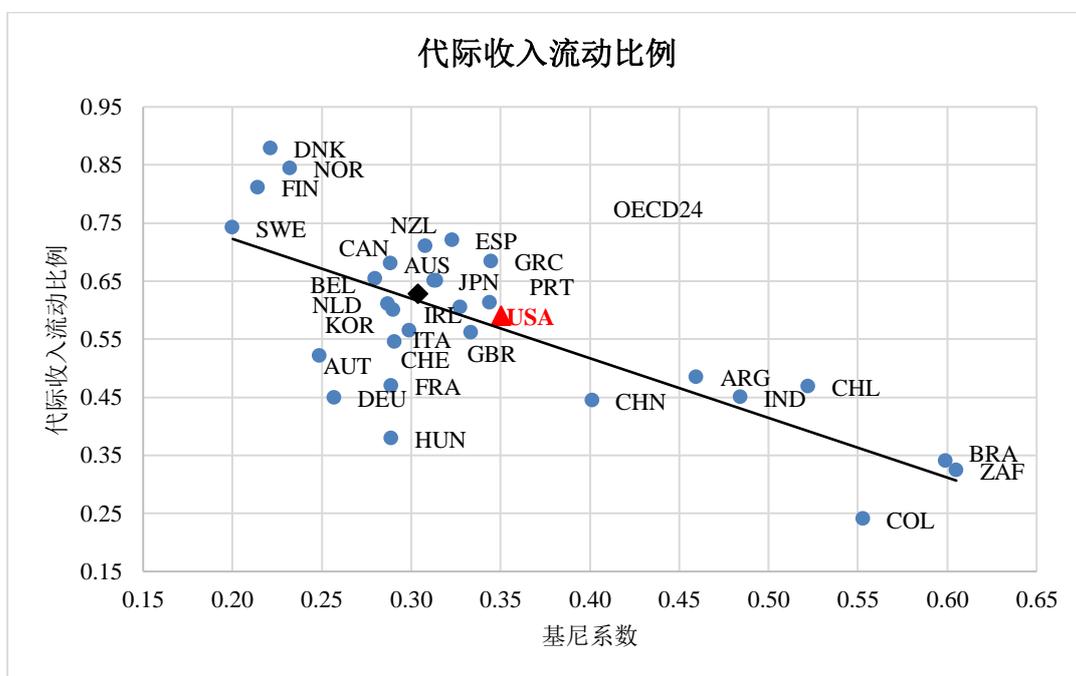
此外，有迹象表明，中低收入阶层的人更容易出现收入下滑，这种机会远大于中上阶层的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处于第二个区间（即“最低 40%”，而不是“最低 20%”）的劳动年龄人群平均收入继续下滑的风险略有增加。而且，相比于 90 年代末跌至谷底，如今，收入在中等及以上（第三和四个区间）的人抗收入下滑风险的能力要大一些。

同时，收入排行榜中处于中间位的家庭上升到最高区间的机会普遍下降。

低社会流动性意味着不平等吗？

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多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较低的社会流动性意味着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高。在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代际收入流动性通常较低。这种负相关关系被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图 6，Corak，2006；OECD，2008）。在曲线的左上角，我们可以发现北欧国家的收入流动性较高，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到右下角，对于智利、另外一些拉美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其收入流动性较低，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非常高。但是，对于某些欧洲国家而言，这种负相关性表现地更细微：奥地利、法国、德国和匈牙利的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平均水平，收入流动性也比较低。没有哪个国家同时具有收入的高不平等性与高流动性。

图 6: 当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时，代际收入流动性往往会更高。



注：代际收入流动性由1减去代际（父辈与子辈）收入弹性来表示。基尼系数是指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的系数

收入的不平等与代际收入流动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不平等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体现出来的。在收入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就水平和质量而言，低收入的父母难以对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进行昂贵的投资。同时，高收入父母大部分生活在学校较好的社区中，他们有能力支付高昂的学费，并且可以依靠自己的专业网络，帮助孩子实现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因此，小康家庭的儿童处境较好，可以充分获得教育收益。这种影响是一代一代不断增强的：在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不仅花在教育上的时间更少，而且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也较低。因此，教育质量差距甚至比仅凭收入差距所预期的差距还要大（Cingano，2014；OECD，2015）。”

实际人均收入与卫生系统有效性问题

当想要比较美国和西欧有效的人均消费水平时，应考虑到这两个地方国定假日的长短差异。下表基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数据提供了清晰的统计信息（请参见表 2）：欧洲工人享有的假期比美国员工更长。针对假期的经济价值，可以使用收入中位数进行评估。由于西欧国家的假期比美国长，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人口具有经济优势。美国的法定最低带薪假为 0 天；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法定最低带薪假介于 20 到 28 天之间。因此，例如法国和英国的有效收入大约比美国普通工人的有效收入高 10%。

表 2: 经合组织部分成员国的年假情况

国家	法定最低带薪年假	节假日	总天数
法国	25	11	36
德国 ^a	20	9-13	29-33
意大利	20	10	30
西班牙	22	14	36
英国 ^b	28	9	37
美国 ^c	0	10	10

注：a 在德国，几乎完全由州（而不是联邦政府）制定节假日，带薪节假日的天数在 9 到 13 天之间，各州情况不一。

b 在英国，节假日不必定为带薪假，雇主可以选择将节假日作为工人法定年假的一部分

c 美国节假日的数据是基于联邦政府制定的节假日。在私营领域，是否为带薪假由雇主决定

资料来源：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家庭数据库、就业、劳工和社会事务局收集的数据，并自行进行整理所得。

此外，我们还可以计算出一个有效可支配名义收入比，该比率考虑了美国、德国和法国在假期和医疗保健支出方面的差异，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天数的差异的影响（请参见表 3）。相对于德国和法国来说，美国的官方相对收入比显然要远高于此段开端处计算出的、更具有经济意义的有效可支配-名义收入比。

表 3: 1995 年至 2015 年德法相对于美国的有效可支配名义收入 (y' ; 年度数据) (购买力平价, 美元)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平均 寿命(L')	$L' \times y'$

法国	14,244	16,741	19,549	22,909	24,576	82.4	2,025,056
德国	15,221	17,894	19,643	23,580	25,855	81.1	2,096,881
美国	15,706	19,639	22,154	23,826	26,302	78.6	2,067,298
平均 差异，百 分比 (法+ 德/美)	6	12	12	2	4		

注：^a在此，“有效”是指在休假时间和医疗保健支出方面经校正过的差异。与美国相比，将德国和法国的名义年收入乘以1.1，表明这些国家额外假期时间为一个月。美国官方数据下降了18%（美国医疗保健预期支出占GDP的比例），德国和法国下降了11%（2017年法国和德国医疗保健支出支出占GDP的比例）。最后一栏中，将2015年有效收入与预期寿命相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高估了欧盟的优势以及德国和法国的领先优势，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未来的收入应按适当的贴现系数进行贴现。

资料来源：EIIW利用经合组织收入分配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计算。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影子经济在内的有效收入有利于表明德法之于美国的相对优势（法德影子经济约占GDP的16%，而美国影子经济约占官方GDP的9%）；相比之下，根据Medina和Schneider（2017）1991年至2015年的研究结果，在税率较高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其影子经济约占GDP的20%。有关医疗保健支出和预期寿命的经合组数据，请参见表4。

表4: 医疗保健支出占GDP之比和预期寿命：美国，加拿大，西欧

国家	总健康支出与 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国家	总平均寿命，年数
美国	17.15	瑞士	83.7
瑞士	12.26	西班牙	83.4
法国	11.46	意大利	83.3
德国	11.27	卢森堡	82.8
瑞典	10.92	挪威	82.5
加拿大	10.41	法国	82.4
挪威	10.37	瑞典	82.4
奥地利	10.32	加拿大	81.9
丹麦	10.22	爱尔兰	81.8
荷兰	10.14	奥地利	81.7
比利时	10.02	荷兰	81.6

英国	9.65	比利时	81.5
芬兰	9.22	芬兰	81.5
葡萄牙	8.99	希腊	81.5
意大利	8.90	英国	81.2
西班牙	8.84	葡萄牙	81.2
希腊	8.37	德国	81.1
爱尔兰	7.10	丹麦	80.9
卢森堡	6.08	美国	78.6

注：医疗保健支出与2017年有关，是临时或估计数据。预期寿命数据与2016年或最新数据相关

资料来源：OECD数据，医疗保健支出指标和OECD发布的出生时预期寿命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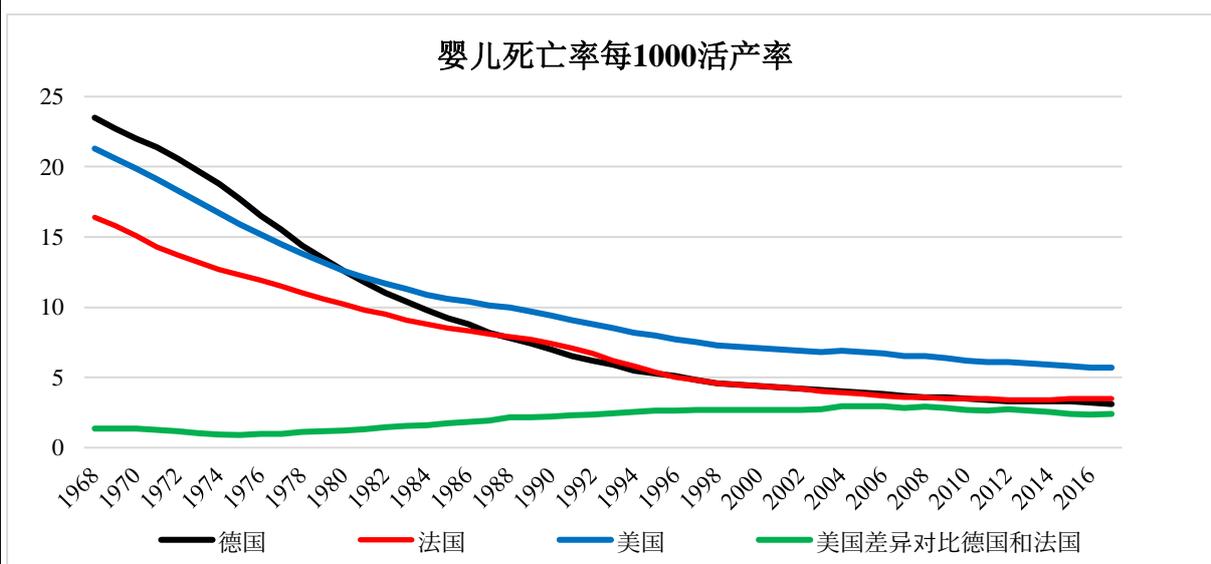
<https://data.oecd.org/healthstat/life-expectancy-at-birth.htm>

<https://data.oecd.org/healthres/health-spending.htm>

与欧洲体系相比，美国医保体系效率低下：与西方欧盟体系相比，美国人口减少了五千万

实际上，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出生率差值变小。自 90 年代开始，美国在该出生率方面的劣势显现出来。但是，在过去 30 年中，0.25 的婴儿死亡率差距意味着美国人口比西欧少了近 800 万；但是，除非美国降低其婴儿死亡率，否则 1988-2048 年期间该数值将增至为 5,000 万（见图 7）。

图 7: 美国、德国和法国的婴儿死亡率发展情况（1960-2016 年）。注意：由于美国和德法之间在婴儿死亡率方面的差异，这些国家的死亡率定为 50/50。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并自行进行整理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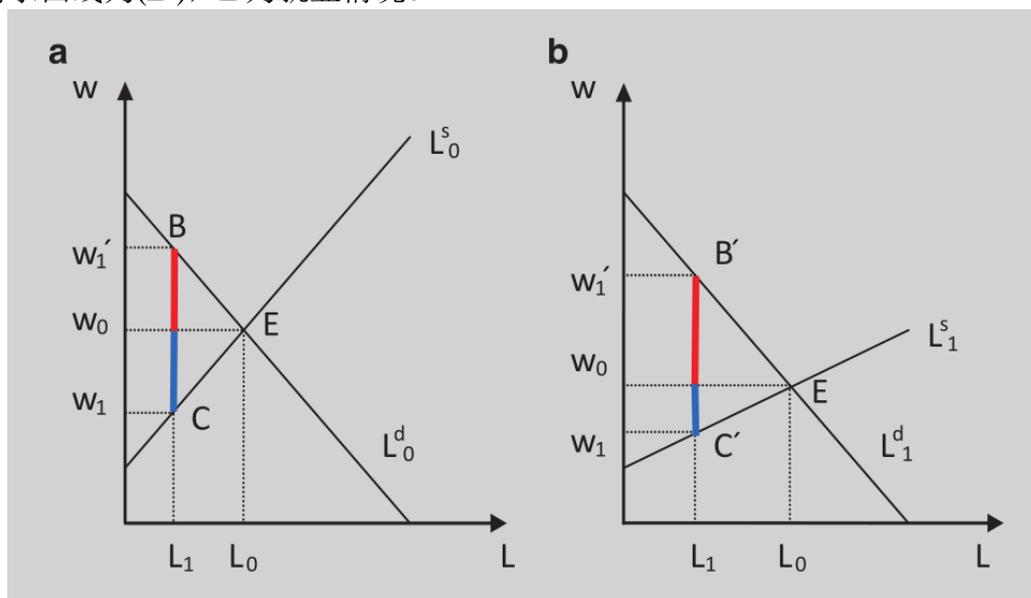
美国医疗系统在某些方面非常出色。但是，美国医疗体系和医保体系却出人意料地“薄弱”，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该体系太贵而无力承受（相比于德国或

法国，美国医疗支出约占国民收入之比要高 6%)，而预期寿命却比西欧低约三年。美国采用隐性的方式为 65 岁以上（医疗保险）的老人和十分贫困家庭提供全额健康保险。

大约有六分之一的美国人没有医保，这些人都比较年轻且身体健康，并且不想在健康保险上浪费钱（逆向选择问题）。还有一组相当贫困的家庭，由于没有达到十分贫困的级别，因此无法享受医疗补助。美国在如下两个领域的医疗支出特别高：那些必须经常支付极其昂贵的医疗事故保险费的医生的报酬，这使得美国医生的保费高于大多数欧盟国家。在美国，医疗器械支出也很高，由于定价体系不透明，医院通常向没有资格享受医保且没有保险或保险不足的穷人收取很高的价格（Reinhardt 2006）。投保人可以报销的疾病诊断用医疗保险（DRG）通常比医院给出的官方报价低很多，通常只占一半左右（实际上，每种疾病诊断用医疗保险均按照统一收费率收取）。医院收取很高的服务价，而且操作空间很大。

在德国，国有或私营保险公司与医疗系统的供方进行谈判，供方也会排除特定的利益小组/机构代表自己进行谈判。在美国，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对于没有保险的穷人而言），医院是根据个人合同而收取费用的，因此，在所有市中心，医院收取的费用通常都很高，除非健康维护组织制定有特定的收费限制或团体诊断类费用在医保报销范围内。公司通常给雇员购买医保，并可以从税收中抵扣此类支出，从而人为地刺激了这些公司多付医保费-这种“不良刺激”受到公司税率的影响。将医保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一种捆绑行为-例如，为了从一家银行获得贷款，您必须购买该银行的付款保护险：这种捆绑销售使客户在贷款时候不在仅仅关注利息，因为降低了客户换一家银行进行贷款的倾向（德国情况如此）。想象一下，您买了一辆通用汽车，但只能购买埃克森美孚公司的汽油（这不是真实情况；如果是这样，那这很荒谬，会削弱天然气市场的竞争）。将工资与医保合并在一起的目的是降低劳动力供给的弹性（见图 8 中无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工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L^S) 更加陡峭。在很大程度上，净工资率 (w_1) 与“总工资” (w'_1 , $w'_1 - w_1$ 的差值=医保缴费率，类似于税收) 之间的差值由变小的净工资率（由工人获得）表示，因此总工资率仅小幅增长。

图 8: 医保缴费率 (a) 非弹性劳动力供给曲线(L^S) vs (b) 弹性劳动力供给曲线(L^S)。企业需求曲线为(L^d), L 为就业情况。



资料来源：自己整理所得

蓝线($\overline{w_0 w_1}$)表示减少的净工资。我们可以看到，在劳动力供应缺乏弹性的情况下（工资和医保捆绑在一起而导致的），净工资降低所产生的影响明显大于劳动力供应更具弹性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如果医保和工资没有捆绑在一起，（见蓝线，在弹性劳动力供给的情况下），净工资的减少量下降，而医保缴费率则更多地通过总工 w_1' 表示。这意味着公司提供的医保福利在很大程度上由工人支付。实际上，公司提供的医保福利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净工资率。效果越大，医保费率和医保支付收入比就越高。劳动密集型生产领域更多的执行美国现有的医保制度，这对于一个资本相对丰富的美国来说是一个有趣的偏颇现象。

并不是所有美国人口都有医保这一事实意味着无医保或医保覆盖率较低的十分贫穷的工人或个体经营者的健康状况相当差，从而削弱了他们的工作能力（负因素输入效果），从而对生产潜力产生负面影响。相比之下，全面覆盖医保可以提高老员工的平均健康水平，从而增加生产潜力和国民收入。因此，全面医保覆盖体系的医疗收支比可能低于美国传统医疗系统下的医疗收支比。关于更有效的医保覆盖范围的影响，我们可以参考俄勒冈州“实验”统计数据。2008年，俄勒冈州决定将政府收入的一部分投资于医保彩票（一种医疗补助计划延伸项目，用于囊括更多的人群），因此州政府开展了一项在自然条件下进行的调查，该调查结果值得我们仔细对待。结果显示该项目的实施对收入和就业没有影响（Jameel 2014）。但是，我们可能会忽略以下关键问题：拥有医保的人是否具有更好的整体健康状况，是否能降低缺勤率或是否愿意通过再培训提升人力资本价值？由于孕妇在怀孕期间可以更加频繁地去看医生进行产检，从而可以更早发现婴儿的健康风险，降低婴儿死亡率（一些德国保险公司甚至向参加所有产检项目的孕妇提供小额奖金），婴儿存活率是否因此有所提高？从长远来看，

这种做法会增加俄勒冈州投入的有效劳动力，从而提高区域生产潜力和实际收入，进而可以降低医保收支比。

还应注意，与大多数欧盟国家一样，一般的医保制度（为学生和工人提供强制性医疗保险）与就业无关，也会使劳动力供应曲线上移，因此可以有效地反映出医保成本；随着公司间劳动力流动性的提高，劳动力供给曲线将变得相当平坦，从而医保缴费率将更有利于工人。公司将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医保费用。

西欧国家的医保系统并非完美无瑕，但美国应该认真研究欧盟国家在医保领域中所做的领先作用，并将从中受益匪浅。

研究美国健康状况的联邦基金会（美国基金会）工作人员 David Squires 和 Chloe Anderson（Squires 和 Anderson，2015 年，第 16 页）认为：

从人口健康的几项指标来看，美国人的表现要比国际同行差。在被调查的国家中，美国预期寿命最低，2013 年为 78.8 岁，而经合组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 81.2 岁。此外，在被调查的国家中，美国婴儿死亡率最高，2011 年为每千名活产婴儿中就有 6.1 人死亡，而经合组国家的平均死亡率为 3.5。

在美国，慢性病的患病率似乎也更高。2014 年联邦基金会国际健康政策调查发现，美国 68% 的 65 岁或以上的成年人至少患有两种慢性病。而在其他国家/地区，这一数字介于 33%（英国）至 56%（加拿大）之间。

相对较高的肥胖率是一个特殊的问题，需要加大教育力度，鼓励所有公司和政府部门开展体育运动，并需要数字信息网络发挥作用以及对传统高热量软饮料征收特别税。

如果美国扩大其医保覆盖范围，并且在结构上与西欧更加趋近，那么医保支出占 GDP 的比例将约为国民收入的 12-13%。在给定的所得税率条件下，政府可以实现占 GDP 4-5% 的政府支出，从而可以免去本科学费。

如果社会支出不包括医保费，则美国的支出占瑞士的三分之一，而德国仅占后者六分之一（见表 5）。由此看来，美国的社会支出占 GDP 的比例并不是很理想。

如果美国的医疗体系与西欧的非常相似，那么美国的儿童死亡率将会降低，人口增长率将会提高。因此，如果自 1958 年以来美国的儿童死亡率一直和西欧一样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那么 2018 年美国人口数量将比现在高得多：美国与西欧的儿童死亡率差值为 0.25%。如果在过去 60 年中美国能认真对待这一差距（只是一种假设；实际情况，请参见附录 G），那么美国 2018 年的人口将比实际（估计）拥有的 3.28 亿人口多 5200 万；3.8 亿居民的寿命也将延长 2 年。美国 2018 年的国民收入也将增加约 16%，约为 3.2 万亿美元。

表 5: 2016 年社会支出（不包括医保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

国家	2016 年社会支出（不包括医保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美国	2,2

瑞士	7,5
荷兰	11,6
英国	11,7
波兰	13,7
德国	14,2
挪威	14,6
西班牙	15,6
丹麦	18,3
意大利	19,9
法国	20,0
芬兰	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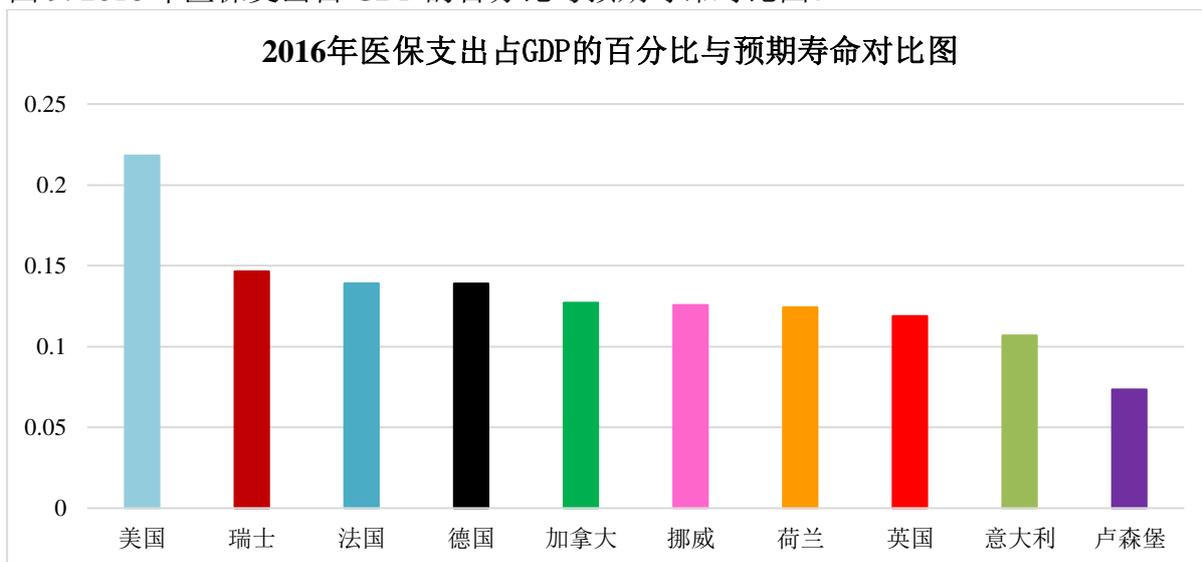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使用EIIW并使用经合组的可用数据、2016年总卫生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卫生支出和筹资：卫生支出指标）和2016年社会公共支出占GDP百分比（社会支出：汇总数据）计算得出

虽然特朗普总统自豪地宣布美国 2018 年的经济增长近 3%（+ 6,000 亿美元）（部分是由于所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提高社会政策支出以及提高全面医保制度效率将对于美国的繁荣、平等以及政治和经济实现长期稳定来说至关重要。

如果将医保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与预期寿命相比较，与其他经合组国家相比，美国在这方面的效率十分低下。这是一个美国人未曾讨论过的问题。图 9 中的指标表明，美国在这方面的效率仅为英国或意大利的一半。

回顾 1960 年以来美国和其他西欧主要国家的预期寿命发展情况（见图 10），我们可以发现，在 70 年代，由于上半叶预期寿命的明显增长，美国的预期寿命要比德国要高。但是，自 80 年代初以来，美国的预期寿命增长率大大降低，而德国和法国的预期寿命却持续增长（在 90 年代德国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美国）。

图 9: 2016 年医保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与预期寿命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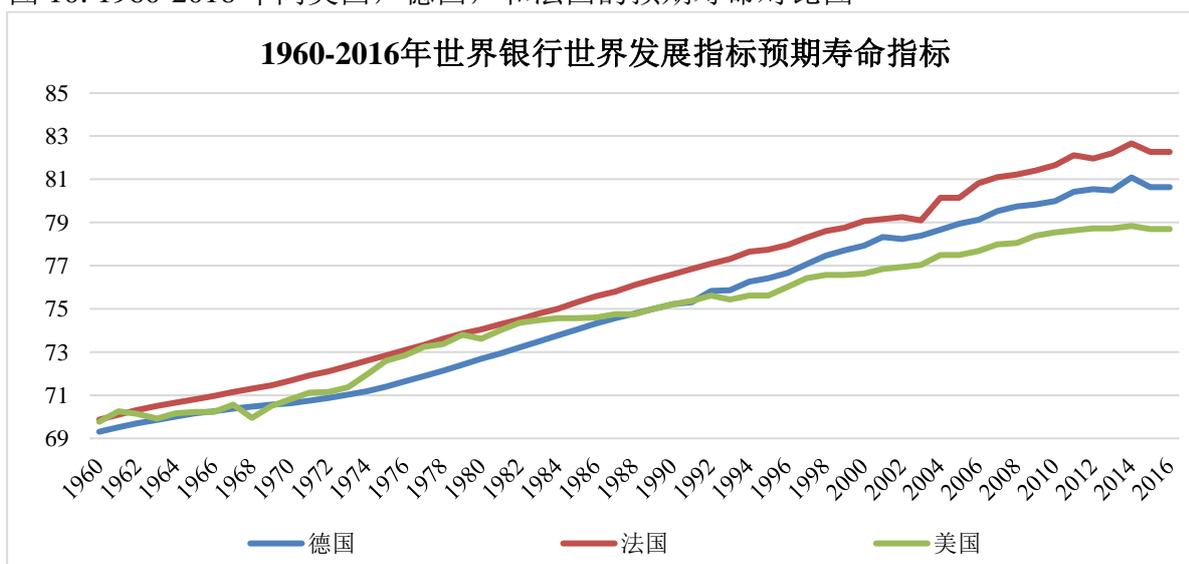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EIIW使用经合组织提供的医保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与预期寿命对比数据进行计算所得

美国医保支出的驱动因素

许多研究已经对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医保支出（占 GDP 的比例）进行了对比。Horenstein 和 Santos（2019）总结了一些关键驱动因素。他们认为，医保支出的长期增长（自 1978 年以来美国医保支出表现出强烈的增长势头）无法用资本和劳动力的过度使用来解释。相反，研究发现，由于美国医疗领域中经常使用先进技术，医保价格通常会上涨。因此，市场是美国医保价格的关键驱动因素。实际上，在 1978 年至 1990 年期间，医院和相关医疗服务是导致医保领域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医保保费出现了强劲的增长，远远高于消费者价格指数（以及 CPI-医保指数：CPIMC）。他们还说道，相对于消费者物价指数，在 1978-1990 年期间，住院费累计约增长为 70%。相比而言，CPIMC 同期累计增长 35%（相对于消费者价格指数）。在 1978 年至 1990 年期间，医疗事故保险费大约增长了三倍，但医疗事故费用并不是医保支出的主要驱动因素。医疗事故保险费占医保支出的 1.25% 或国民收入的 0.14%。但是，考虑到医生数量仅占美国员工总数很小的一部分，因此医疗事故保险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很高的。

图 10: 1960-2016 年间美国，德国，和法国的预期寿命对比图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作图

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数据有偏的美国和欧洲人均消费比较

2018 年 10 月，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发表了一项题为“社会主义机会成本”的研究，其中 CEA 在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进行了一些比较（因此，尽管事实是在 2016 年初选的候选人中，没有一个候选人提议仿照委内瑞拉实施不负责任的政策和政治，但委内瑞拉却成为美国政治辩论的参考对象）。此外，尽管欧洲经济学家仅将准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朝鲜、古巴、委内瑞拉、前苏联及实施集中规划制度和特殊的国有体制、政府控制外汇和价格（社会主义影子经济体之外）、以及政府管理公司的东部欧洲卫星国家

（但是也有一些特例，如波兰农业部门），但美国仍然与北欧国家（被归类于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了大量比较。将美国与古巴和委内瑞拉进行比较是否是一种反常的意识形态比较手法？国会或总统预选的任何候选人是否真的赞成引入社会主义专政？明显不是。Hassett 主席主持下的 CEA 分析随后也将美国和北欧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CEA 的研究存在偏差：这容易误导总统和美国公众。

如果要比较人均消费和经济福利，则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关键点：

- 是否只应考虑个人消费，还是应该加入一部分公共服务？例如，加拿大的一个方法就提出了后一种建议（Wolff 等，2012）。
- 如果只强调个人消费，显然应考虑休闲准消费价值；如果国家 i 和 j 在这方面有所不同，则只有在包括休闲时间的机会成本时（休闲时间的机会成本可以使用每小时的消费量来近似得出），这种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才有意义。只有在非自愿失业的情况下，才需要将北欧或西欧国家的休闲优势纳入到增加的人均消费数据中。
- 应考虑医保支出的国际差异，例如，应考虑美国医保支出中个人自付比例较高，而北欧国家或德国和法国私人医保支出较低。个人自付占医疗总支出的 11.1%（约占 GDP 的 17%），人均有效消费降低 1.87%，而法国个人自付比例降低 9.7%（占医疗总支出的 11%），这表明法国有效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降低 0.76%（关于医疗保健支出，请参见附录 B）；由于消费与收入成比例，因此在国与国人均消费比较中，法国医保支出略占优势，约 1 个百分点。对于德国而言，由于个人自付部分高于法国，因此德国与美国相比优势不大。在 2016/2017 年，德国医保总支出与 GDP 的比率与法国相同。
- 经济规模很重要，而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类型。像美国或欧元区这样的大经济体（其中美元和欧元都是主要的世界储备货币），人均消费自然要比通常不享有储备货币地位的小国高（瑞士是一个特例）。如果某国享有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这表明该国可以免费进口一定数量的商品；在美国，免费进口的消费品约占 GDP 的 1%，在欧元区，免费进口的消费品约占其 GDP 的 0.5%。这意味着瑞典、丹麦或挪威等国家（欧元区以外的国家）在人均消费方面自然会与美国之间存在约 0.5% 的差距。因此，如果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为 100，则瑞典、丹麦或挪威的人均收入水平应为 99.5，因此不能说美国的经济体系要好于这些北欧国家的经济体系。

随后，我们可以推测，美国在医保费用个人自付部分要比北欧和西欧国家的个人自付费用平均高 1%。

CEA 对美国 and 北欧国家人均收入比较的猜想

CEA 将美国和挪威，瑞典，芬兰和丹麦等国进行了比较，但 CEA 推测的有关医保系统和相对人均消费（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数据有偏。有关美国和北欧国家人均消费量对比情况，见下表（表 6）。

表 6: 按当前价格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个人人均消费量 US = 100

国家	2016
丹麦	69
芬兰	70
冰岛	69
挪威	82
瑞典	68
美国	100

资料来源：CEA（2018）《社会主义机会成本》表5第36页。

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民账户数据。实际个人消费支出（AIC）由单个家庭获得的消费品和服务组成。根据经合组数据，AIC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1)“家庭在消费品或服务上的支出，包括以不具有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的非市场商品或服务的支出”，(2)“政府单位在以实物转让形式提供给家庭的个人消费品或服务上发生的支出”和(3)“NPISHs在以实物转让形式提供给家庭的个人消费品或服务上所发生的支出”

CEA 在推测时没有考虑几个关键点（请参见表 7）：

- 北欧国家的预期寿命高于美国更高，婴儿死亡率低于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更健全的医保体系有关，例如，孕妇（包括来自低收入阶层的孕妇）会定期进行产检，有利于降低北欧国家的婴儿死亡率。
- 由于北欧人每年的工作时间比美国短，因此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获得额外的收入，大约相当于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由于消费与收入成比例，因此足以根据休闲时间数来校正经合组的人均消费数据，但是较高的休闲数据情况除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非自愿失业）；这种方法在法国起作用，但在德国和北欧国家却不起作用（相对于芬兰来说，作用很小）。
- 由于北欧国家医保支出占 GDP 的比例要比美国低约 6 个百分点，特别是因为北欧和西欧的预期寿命比美国高，因此在对比美国和北欧和西欧之间的福利时自然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表 7: 1995、2000、2005、2010、2015、2016 年美国、北欧国家、英国、德国和法国的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工作时间和失业率对比图，

		美国	挪威	瑞典	芬兰	丹麦	英国	德国	法国
1995	预期寿命	75.7	76.7	77.9	76.6	75.3	76.7	76.6	78.1
	婴儿死亡率	7.6	4	4.1	3.9	5.1	6.2	5.3	5
	工作时长	1840	1488	1481	1668	1419	1563	1528	1590.67
2000	预期寿命	76.7	77.9	78.8	77.7	76.9	77.9	78.2	79.2

	婴儿死亡率	6.9	3.8	3.4	3.8	5.3	5.6	4.4	4.5
	工作时长	1832	1455	1483	1636	1466	1539	1452	1549.98
2005	预期寿命	77.6	79.2	80.3	79.1	78.3	79.2	79.4	80.4
	婴儿死亡率	6.9	3.1	2.4	3	4.4	5.1	3.9	3.8
	工作时长	1794	1422.8	1449	1594	1451	1515	1411.3	1527.35
2010	预期寿命	78.6	80.6	81.2	80.2	79.3	80.6	80.5	81.8
	婴儿死亡率	6.1	2.8	2.5	2.3	3.4	4.2	3.4	3.6
	工作时长	1773	1415.3	1476	1566	1422	1476	1389.9	1527.96
2015	预期寿命	78.7	81	82.4	81.6	80.8	81	80.7	82.4
	婴儿死亡率	5.9	2.3	2.5	1.7	3.7	3.9	3.3	3.7
	工作时长	1785	1423.9	1454	1537	1407	1501	1367.8	1509.43
2016	预期寿命	78.6	81.2	82.5	81.5	80.9	81.2	81.1	82.3*
	预期寿命占美国(=100)百分比	100	103.31	104.96	103.69	102.93	103.31	103.18	104.71
	婴儿死亡率	5.7*	2.2	2.5	1.9	3.1	3.8	3.4	3.7
	工作时长	1781	1424.4	1465	1535	1414	1515	1363.4	1502.73
	工作时长占美国(=100)百分比	100	79.98	82.26	86.19	79.39	85.06	76.55	84.38
	失业率	4.87	4.68	6.99	8.81	6.18	4.81	4.12	10.06

注：a对世界银行的数据进行计算所得

资料来源：对经合组数据库的数据自行整理所得

上面提到的三点情况均符合美国和德国以及法国之间的对比结果。美国的人均有效终生收入与德法相同。在对比这些国家之间的收入时，CEA 充分考虑了在医保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方面的差异。CEA 得出，北欧国家的人均消费比美国低 30%，这种结论是错误的，因为有意义的比较应该基于一年以上的数据。CEA（2018，第 36 页）认为：“人均消费比美国少 20%（或以下）的唯一一个北欧国家是挪威，挪威的人均消费是美国的 82%”；在 2016 年，其他北欧国家的人均消费是美国的 70%，如上表所示。

为了更加充分地分析并对比国与国之间的消费水平差异，不是只需关注一年的消费数据，而是要关注终生消费数据。如果将终生消费因素（扣除医保支出）（考虑到美国与北欧国家在医保支出占 GDP（或 GNP）比例方面的差异）考虑在内，美国和北欧国家的数字大致相同。在北欧国家，闲暇时间所产生的收入相当于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北欧国家的预期寿命比美国高 4%（请参见表 7），因此为了求得北欧国家（不包括挪威）有效终身消费 C' ，我们得出： C'/C'^* （*为美国）：

$$C'/C'^* = (C/L)(1.2)(1.04)/C'^* = 0.7(C^*/L^*)(1.2)(1.04)/C'^* = 0.8736/C'^* ;$$

北欧的休闲时间系数为 1.2，表明北欧国家在这方面所享有的领先地位。北欧具有较高的预期寿命，其系数为 1.04。在校正美国和北欧医保收入比差异后，美国校正后的数据（人均收入初始水平 $C^*/L^*=100$ ）为 $C'^*=0.99$ 。这表明，在考虑终身消费后，美国与丹麦、芬兰、冰岛、瑞典之间的人均有效消费差值不是 30%，而是 12%，而挪威的人均有效终身消费确实是高于美国：

- 0.82（CEA 所提供的数字）乘以 1.2×1.03 ，得出 1.0135。美国的终生消费指数数值为 0.996。
- 因此，挪威人均有效终生消费比美国高 1.8%。因此 CEA 得出美国要比挪威领先 18% 这一结论极具误导性；错误容限为 20%，这不是小的偶然性偏差，而是重大错误。

如果将折现法用于计算挪威人的额外预期寿命，那么在合理使用折现法折现后的美国数据仍将低于挪威。而且，由于婴儿死亡风险降低，在北欧国家（和西方欧盟国家），孕妇及其丈夫/伴侣将会获得更好的准消费福利，从而降低了家庭风险，北欧国家在这方面超过了美国。假设两个国家的效用函数相同，则挪威人的平均经济福利超过美国人的平均经济福利。如果家庭表现出利他主义，那么儿童所享受的福利会对父母的收入产生积极影响，北欧欧洲（和西欧）婴儿死亡率的降低表明挪威在经济福利方面比美国更具优势地位。我们确实可以说是和美国的经济福利相比，北欧和西欧国家所提供的福利更好。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如下：亚洲国家应该仔细考虑欧盟市场经济的模式，而不仅仅是关注美国所宣称的主导地位。此外，也应该考虑欧盟国家的重要改革要求。

由于 CEA 显然想将美国与北欧国家进行比较，以避免美国的政策在未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如北欧国家/西欧国家（例如德国和法国）所见）。有人可能认为，在仔细重新计算经充分分析后所得的结果后，我们没有理由不实施欧洲现代市场经济体制。CEA 所得出的、低于标准的研究结果对特朗普政府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显然，美国需要实施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应制定医保公司竞争系统以及医院竞争系统。但是，我们应该研究欧洲社会市场经济体，而不是试图阻止他人进行有关系统改革的有益讨论，因为在讨论中，美欧之间可以相互学习。

经济顾问委员会调查得出，北欧国家的不平等标准统计数（参见表 8）（即基尼系数、税后和援助系数）约为 0.26，而美国的基尼系数则高得多，2015 年达到 0.39；美国的帕尔马比值（P90 / P50 可支配收入十等分位点比率）也较高，达到 2.3，相比于北欧欧洲国家的 1.7。虽然有人可能认为北欧国家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 CEA 的数据出现令人诧异的偏差，此次糟糕的经济分析，误导了国会、总统和美国公众。研究人员首先要问的是，相比于北欧或欧盟国家的公众来说，美国公众普遍对收入平等的渴望是否要弱一些。《世界价值调查》（Inglehart 等，2014）的数据表明，与欧盟国家相比，美国人口对收入平等的偏爱确实较弱。但是，毫无疑问，在 2008 年之后，美国选民越来越担心收入不平等状况（Lindh 和 McCall 2018）。Lindh 和 McCall 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美国收入不平等非常严重，但却寄希望于大公司和美国跨国公司，这种痴心妄想的想法表明了美国部分公民对此存在很大的误解。

表 8: 2015 年相对收入不平等状况

国家	基尼系数 (可支配收入, 税后及转账)	帕尔玛比值 (P90/P50 可支配收入等分比率)
丹麦	0.26	1.7
芬兰	0.26	1.7
冰岛*	0.25	1.7
挪威	0.26	1.7
瑞典	0.27	1.7
美国	0.39	2.3

注: *2014年冰岛数据

资料来源: CEA (2018): 《社会主义机会成本》表6第37页。

经济顾问委员会还认为, 美国的大学体系要比北欧国家好, 但北欧国家的学生通常不需要支付学费。此外, 各阶层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收入差距有关。例如, 从丹麦和美国之间的对比结果中,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 但是 CEA (2018) 并没有引用相关文献。从更大的层次来看, 这也与公众对收入再分配的看法有关, 而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与人均收入以及其他个人或家庭特征有关。读者可参考 Welfens 和 Udalov (2018) 调查结果及相关文献 (例如《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期刊》2018 年特刊)。

在北欧国家, 人们通常认为收入再分配政策与“积极的”教育政策相结合将有助于提高效率和促进社会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通常被认为是这种政策结合的典例。然而, Landersø 和 Heckman (2017) 在对美国 and 丹麦的社会流动性进行比较后,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就收入流动性而言, 丹麦是一个流动性相当高的社会, 但是就教育流动性而言, 情况却不是如此。丹麦收入流动性相当高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所实施的税收再分配策略、慷慨的援助策略和工资压缩策略。此外, 再加上针对儿童的社会政策, 丹麦内弱势儿童拥有更高的认知能力, 但这并不代表丹麦的教育成果更令人满意, 部分是因为税收再分配策略破坏了收入流动性的激励措施以及丹麦并没有充分激励其公民获得足够的教育。因此, 在将丹麦和美国之间进行比较后, 我们可以发现就大学教育可以降低不平等程度而言, 美国制度具有某些优势, 丹麦制度具有某些局限性。美国制度似乎对所有社会成员开放, 并且在任何情况下, 在激励内生性人力资本形成方面, 比丹麦提供了更强大的动力。我们不知道与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或德国/法国/荷兰相比, 情况又如何, 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结论, CEA 对社会主义机会成本的研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工作, 与文献研究关系不大。在对国与国之间就人均消费和经济福利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时, 其结果当然也不能令人信服。读者对这篇研究的主要印象是, 该机构虽然是一种行政机关, 但向总统和美国公众提供了一些具有混淆性的建议, 并似乎建议美国政府不应将北欧国家视为系统改革的典范

（虽然相关证据严重不足）。在从有意义的长期角度比较美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差距时，CEA 提供的统计数据部分与 CEA 撰写的内容相矛盾。

经济绩效度量

传统上，某个国家的经济绩效和经济福利是使用国民账户体系中的一些指标来度量的，尤其是人均实际 GDP 和人均实际 GNP 以及人均消费水平。度量经济绩效的一种更广义的方法涉及社会指标的辩论结果以及“幸福指数”的最新度量方法。《全球幸福报告》（Helliwell 等，2019）提供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此外，社会发展目标（SDG）指数也是一种优于国民账户体系狭义指标的综合方法，在国际政治辩论中仍然具有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社会发展目标指数》（Sachs 等人，2018 年）显示，排名最高的 14 个国家均属于欧洲国家，排名前三的是瑞典、丹麦和芬兰；《2019 年全球幸福报告》还显示，最幸福的七个国家都来自欧洲-芬兰、丹麦和挪威位列前茅。这种结果显然反映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繁荣、包容性和环境可持续。

美国的贫困儿童与瑞士的贫困儿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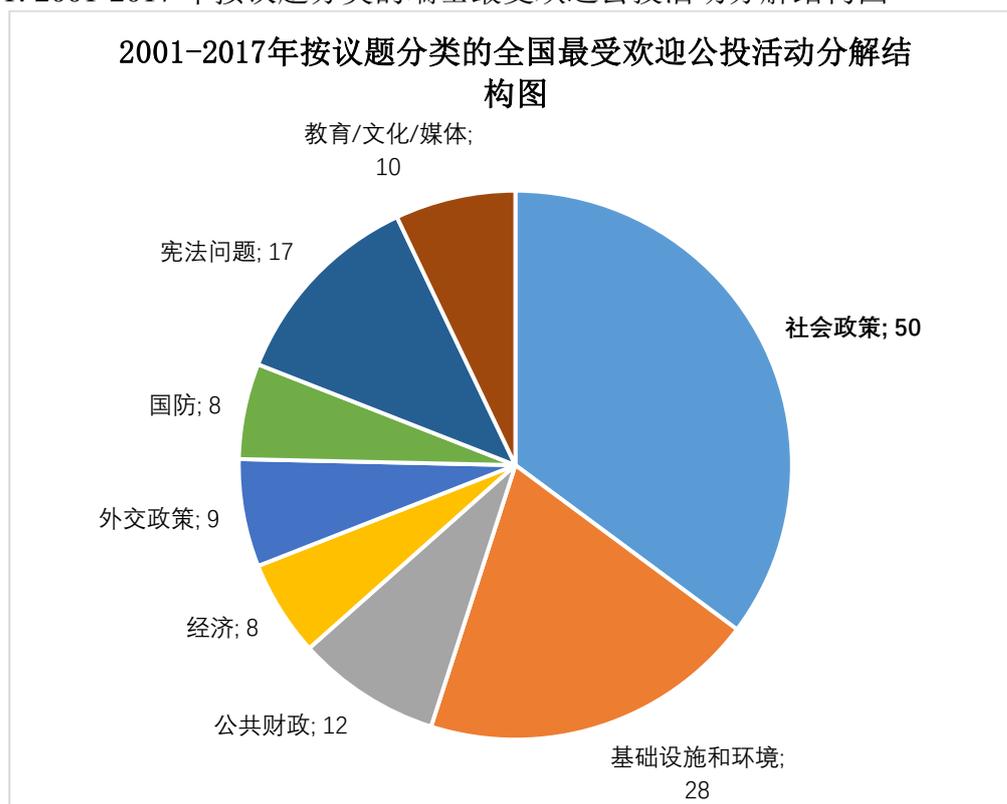
在许多国家中，单亲家庭都会面临贫困问题。在瑞士，单亲家庭面临的挑战不大。在瑞士，如果父亲不支付子女抚养费时，政府会向母亲提供类似于抚养费的福利，然后会从父亲（如果孩子是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则向母亲）那里索要欠款。德国也有类似的制度，但是收回欠款的比例（即其从父亲那里收回欠款的成功率）不及瑞士。在美国，由于人们在其居住地的社区和州政府处的登记率并不高，因此不愿支付子女抚养费的父亲只需离开其所在的地方，就可以不用支付孩子和家人的基本生活费，而且这种可能性还很高。

有人可能会说，美国的儿童贫困问题比较特殊，但是也可以很容易得到解决。改善登记制度并实施类似于瑞士或德国的子女抚养费制度将解决相当一部分的儿童贫困问题，从而有助于美国实现机会均等。

开放经济中的政策重点：瑞士案例

对于一个公投历史悠久的经合组织成员国，经济政策领域和其他政策领域有何等重要性？纵观瑞士，一个在全民就业和繁荣程度方面历史悠久的国家，社会政策领域是一个主要领域。在 2001 年至 2017 年期间举行的公投（和类似的投票活动）活动中，有 50 次是有关社会政策；28 次基础设施和环境，12 次公共财政，10 次经济，9 次外交政策，8 次国防，17 次宪法问题以及 10 次是针对教育、文化和媒体（瑞士联邦统计局 2018 年数据；参见图 11）。

图 11: 2001-2017 年按议题分类的瑞士最受欢迎公投活动分解结构图



资料来源：根据瑞士联邦统计局数据（2018年）自行整理所得。

这表明社会政策问题引起许多选民的关注，而一个具有公投历史的小国（例如瑞士）已经通过制定政治策略以应对了这些挑战；同样这也说明，瑞士是一个特别开放的经济体，必须以多种方式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压力。有趣的是，瑞士已经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在美国，联邦政府对克林顿政府（除了在医疗改革方面的失败尝试之外）和小布什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并未给予太多关注。为了推动社会政策改革，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医保改革，并且一部分医保改革已经奏效。相比之下，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竟然说道，美国的社会政策并不重要，由于社会政策支出主要流向移民，因此确实应减少社会政策。这是一个对美国现实不了解的竞选人所持有的偏见。此外，特朗普总统曾试图遏制奥巴马的医疗改革。

经合组织成员国内导致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原因有哪些？

在许多国家，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是一个挑战。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Piketty（2014）认为这非常不正常）。正常的资本主义长期动力模型是，在实际利率或投资收益率超过产出增长率的情况下，有利于资本所有者的不平等现象一直都是越来越严重。可能有人会反问，在 2010-2017 年期间，美国、英国和德国产出增长率超过了实际利率。法国的实际 GDP 增长率在 2010-2017 年期间一开始就处于高位，在 2011-2014 年期间增长率下降并低于实际利率，之后又回到后三年高于实际利率的位置。然而，在同一时期的意大利，到 2015 年，实际利率往往会大大超过实

际 GDP 的增长率（见图 12，图 13 和图 14）。对于大量富人从国外获得高股息收入的国家来说，Piketty 的观点并不是很适用，因此我们不应专注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而应关注实际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率。

图 12: 1980-2017 年法国和意大利实际产出年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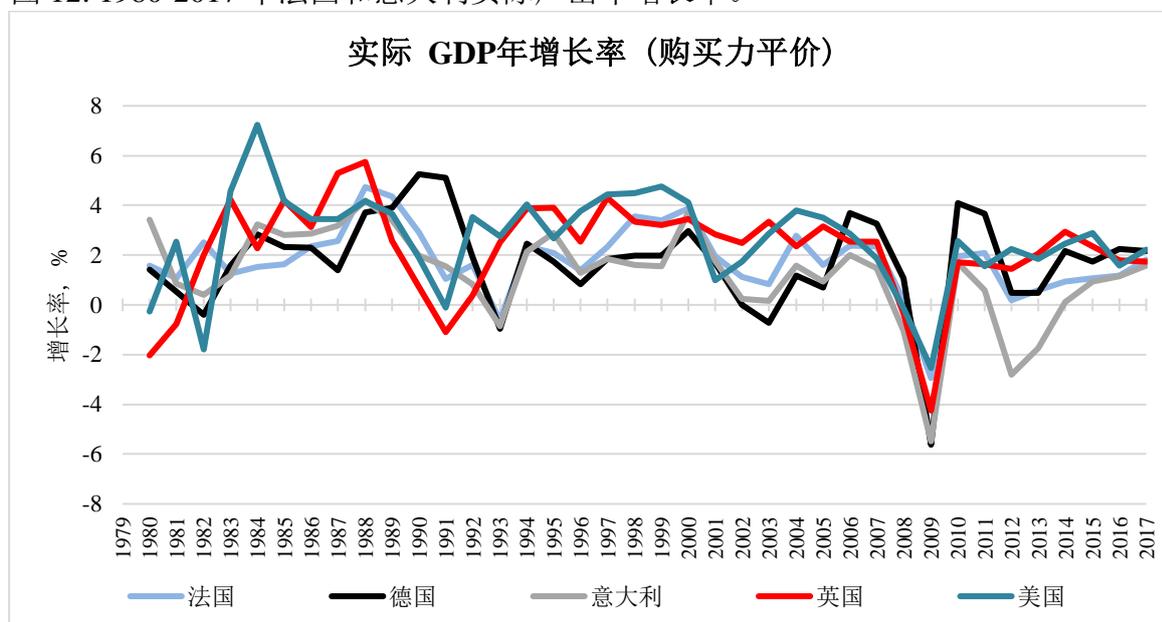


图 13 : 1980-2017 年期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实际利率（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的长期利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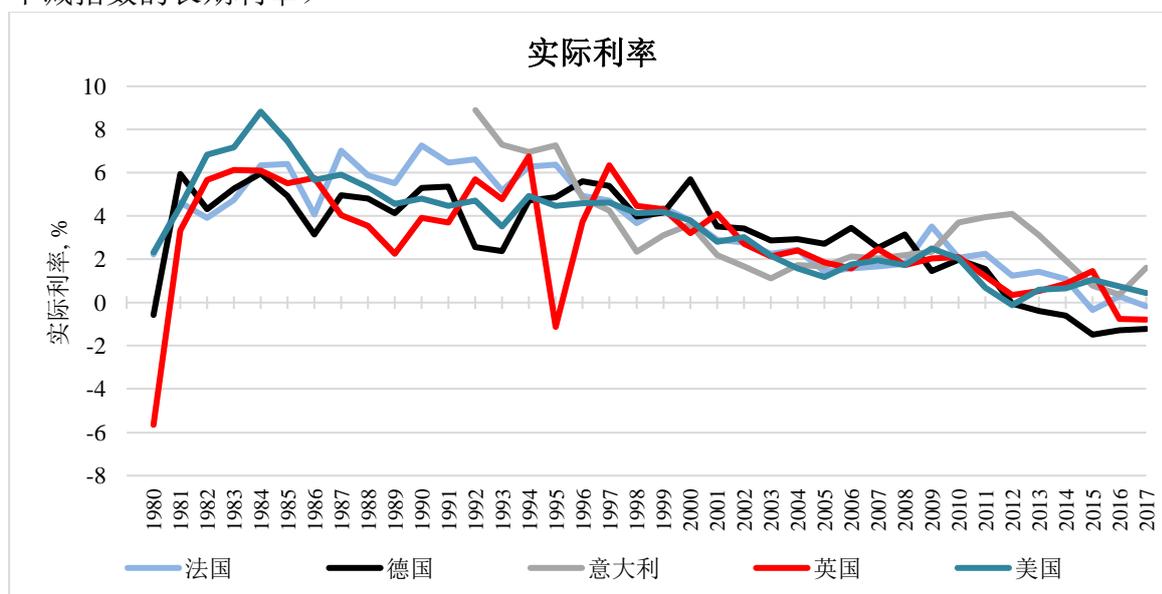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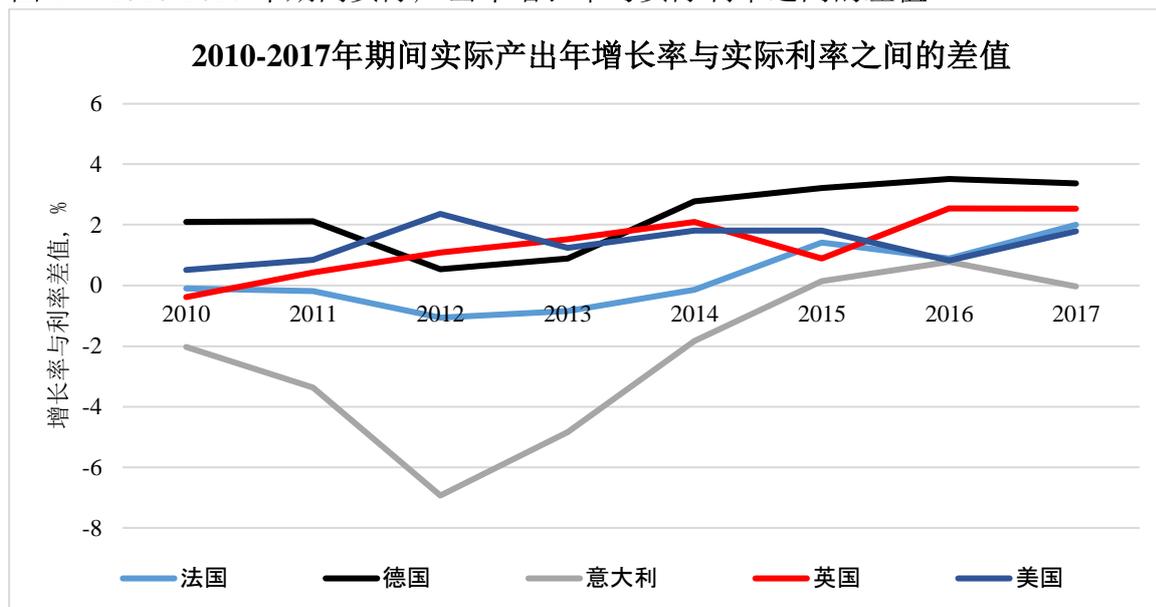


图 14：2010-2017 年期间实际产出年增长率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差值



资料来源：根据经合组数据自行计算所得

如果实际利率高于（或低于）实际 GDP 的增长率（如德国和美国持续数年的情况一样），则资本强度（每名工人的机械和设备）太高（太低）因而无法在最大程度上提高人均消费水平。这就是所谓的黄金法则。太高的资本强度会降低经济福利并导致排放量超标（由于使用过多的机械和设备而造成的）。这会人为地增加专注于设备投资的国家（例如大韩民国、德国或日本）的机械和设备出口量。Temin（2017）还改善了二元经济刘易斯模型（Lewis 1954），以解释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最初的刘易斯模型是针对专注于农业产业（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生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劳动力非常有弹性，并且在现代工业部门内，机械和设备与现代技术和劳动力结合使用。

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所有者提供了足以吸引农业工人的较高的工资。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加上某种流动性溢价，使农村工人有必要搬到城市从事现代工业部门的工业工作。由于资本所有者无意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因此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率。Temin 将这种二元经济方法应用于美国，其中现代工业部门是指 FTE 部门（FTE =金融、技术、电子），这些部门中大约 30%拥有大学文凭或大学学历的劳动力拥有工作；也就是说，FTE 需要资金投入，并还要有技术工，但并不是所有的技术工和员工都能在 FTE 部门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大部分工人工作于其他领域，他们的实际收入较低，实际工资率较低。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的主要资本所有者显示出较强的政治影响力，里根时期和其他共和党总统（所有这些总统都放松管制、减免税收，特别是减免公司税（自里根总统以来公司税大幅降低））时期情况更是如此。

如果收入所得税税率和公司税税率较低，则会对资金的可用性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州政府无法大力投资教育领域，以及联邦政府无法大力实施其社会福利计划。在美国，许多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在提高自身技能方面面临问题，因此大量的移民面临无

法在现代 FTE 部门中找到工作的风险。由于财富被富裕阶层和高收入者按不同的比例瓜分，因此美国将出现收入两极分化的局面，这不仅反映劳动力市场的技能溢价，而且还反映出来自于储户（能够并且愿意进行储蓄）的额外资本收入所带来的影响。Temin 的方法还强调了社会资本在获得足够收入方面的作用，即信任和社交网络在找好工作时所发挥的作用。Temin 的方法包含了所有上述论点，该方法试图解释自 1970 年代以来美国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

为此，美国必须实施改革，可以对高收入个人征收更高的所得税税率，以及对放松管制政策设置某些限制，以遏制美国收入两极分化。然而，特朗普总统却选择了不同的政策：降低税率和在许多领域放松管制；他的激进言论和他显然不愿意在关键领域达成广泛的政治共识，都使美国社会（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因此，美国的信任和社交网络遭遇危机，潜在影响美国的长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政府还强化了种族主义，进而破坏社会政策和收入再分配的作用。1999 年非西班牙裔白人中的穷人比例（即贫困率）为 7.7%，但非洲裔美国人中的穷人比例为 23.6%；非西班牙裔白人占美国人口的 70.7%，但仅占贫困人口的 40%（Alesina / Glaeser / Sacerdote 2001）。在政府一般支出方面，美国支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小于欧盟国家。特别是，在 1999 年和 2011 年，美国的援助率和其他社会福利比值小于欧盟国家（见表 9 和表 10）。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英国相当接近欧盟的平均水平，但其社会援助率确实较低，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一旦英国实现脱欧，英国可能会面临需要效仿美国模式而不是欧盟模式的政治压力。如果英国成为美国的附庸国，则西方世界将面临系统性的新竞争局面，即美英（自由市场经济）与欧盟 27 国（社会市场经济）之间的竞争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全球系统性竞争的主要因素。

表 9a: 政府一般支出的构成部分: 1999^a（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国家	总值	消费		补贴	转移支付和其他社会福利 ^b	投资总额
		产品与服务 ^s	工资与薪金			
美国	35.1	5.1	9.2	0.3	10.7	3.4
欧盟	47.9	8.4	12.0	1.5	18.1	2.8
法国	51.0	10.0	13.7	1.3	20.1	3.0
德国	47.4	10.7	8.3	1.7	20.5	1.8
瑞典	60.2	10.3	16.7	2.0	21.1	2.5
英国	38.3	11.0	7.4	0.6	15.7	1.0

注：^a由于不包括某些类别，无法进行数据总计

^b包括社会保障金

^c14个欧盟国家/地区的简单平均值（卢森堡除外）

资料来源：Alesina et al. (2001), 表 1, 第190页

表 10: 政府一般支出的构成部分: 2011

国家	总值	消费		补贴	援助和其他社会福利 ^b	投资总额 ^a
		产品与服务 ^s	工资与薪金			
美国	41.8	6.7	10.2	0.4	31	3.8
欧盟 ^c	-	-	10.5	-	17.4 ^d	3.6
法国	56	11.4	13.2	1.6	41.4	3.9
德国	44.7	11.9	7.6	1.0	33.3	2.6
瑞典	50.3	12	14.5	1.4	34.8	3.3
英国	45.9	8.8	8.1	0.3	28.8	2.6

注: a总计是指政府一般支出占GDP的百分比, 从OECD获得的数据

b援助和其他社会福利包括政府支付的社会保障金以及家庭获得的现金援助额

c欧盟包括15个欧元区国家

d对于欧盟, 援助和其他社会福利仅包括政府支付的社会保障金

资料来源: 根据经合组第89号经济展望(2011/1版), 自行整理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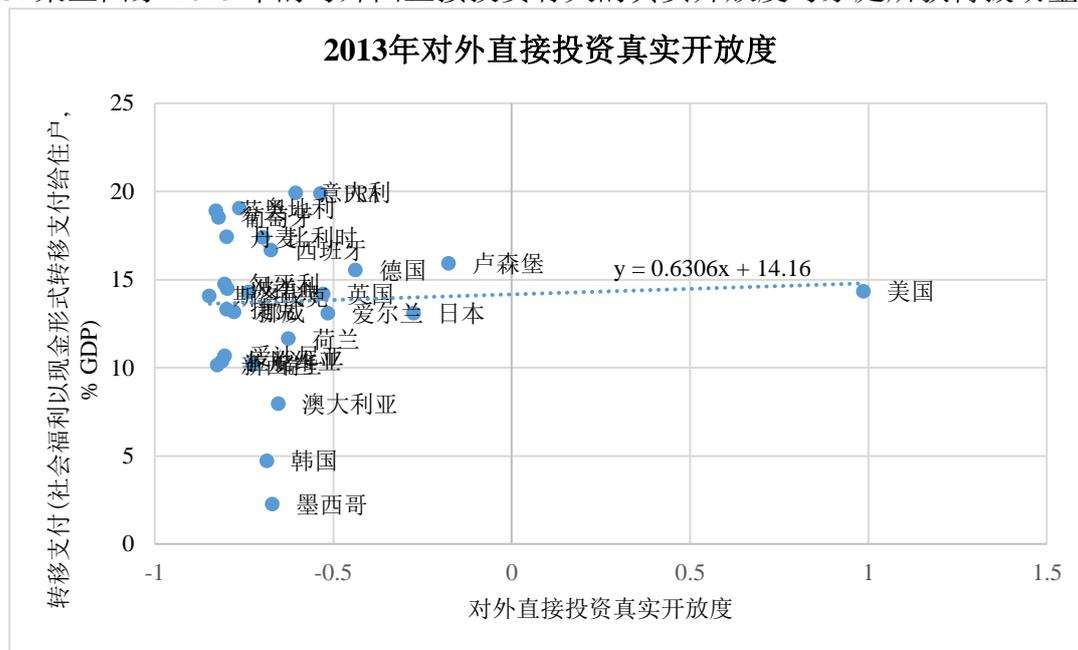
Alesina 等人(2001年)的分析认为, 与美国相比, 欧盟的所得税比美国更为先进。在美国, 相比于欧洲, 对低收入者征收较高的税率, 而高收入者却征收较低的税率。此外, 在欧盟, 政府缴纳的社会保障金高于美国, 部分是因为欧盟国家提供的福利更好。在生病的情况下, 德国和瑞典的疾病和意外伤害津贴替代率, 分别为总收入的 70% 至 80%; 如果一个典型四口之家的户主居住在 1999 年的美国, 则他或他将获得(按 1999 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总收入的 18% 至 63%, 但他或他必须生活在美国 50 个州中提供这种福利的五个州之一; 在美国, 疾病津贴支付周期最多为 52 周, 而在德国, 支付周期为 78 周, 瑞典则可以持续到退休。关于失业救济金, 作者调查得出, 美国的替代率为 50%, 期限为 6 个月。在欧盟, 分别为 59% 和 2.6 年; 在英国, 替代率仅为 38%, 但持续四年。针对“是否具有可行性?”这一问题, 作者(第 200 页)认为: “很明显, 北欧国家的税后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 中欧和南欧处于中等水平, 英国较高, 美国更高。”

在德国, 施罗德政府略微降低了失业救济金, 随后在默克尔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小规模改革。但在 2017/18 年, 欧洲的失业救济金制度仍然比美国更为宽松。瑞典也进行了失业救济金改革, 效率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更高。关于私人慈善团体的捐助, 似乎在公共福利金和私人捐助之间需要权衡取舍。在美国, 私人捐助相当普遍(在调查中有 11% 的受访者参加了捐助活动), 但在社会福利覆盖较广的丹麦(仅 2% 的受访者参加了捐助活动)等国家, 私人捐助极为罕见。

Rodrik (1998) 认为对社会保障金的需求与经济的开放性有关。我们可以使用传统开放度指标出口/GDP 或(进出口)/GDP 之比, 获得对开放程度的第一印象。但是如

果要考虑出口业务的风险敞口，情况就并非如此。相反，应考虑出口附加值占 GDP 比，以及附录一图表中所示的按国家规模进行修正后的出口/ GDP 比。本文认为，真正的出口开放度由按国家规模进行修正后的指标来表示（遵循 Bretschger 和 Hettich 2002 的开放度概念）。随后的数字（图 15 和图 16）可以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真实开放度与家庭所获得援助金之间存在小幅度的正相关关系。

图 15: 某些国家 2013 年的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的真实开放度与家庭所获得援助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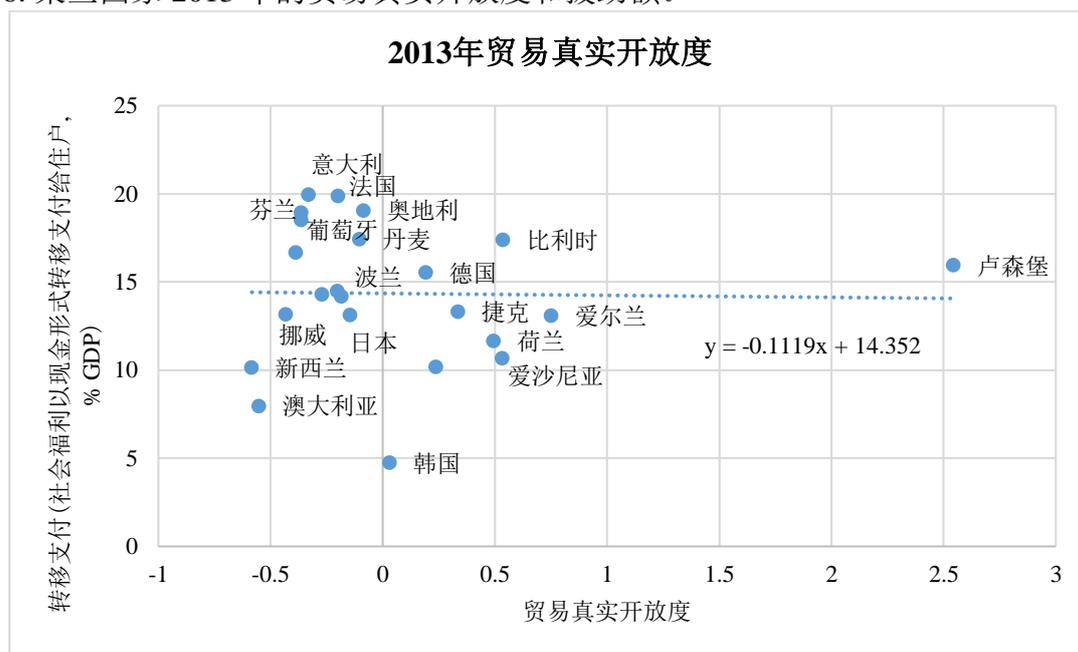


1, *注：以社会福利形式现金支付给家庭。

资料来源：EIIW

1 与美英建立的多数表决制（即“选举制”）相比，欧洲大陆国家基于比例代表制的投票系统使贫穷群体拥有更大的政治发言权。欧盟 27 国的贫困群体可以相当清楚地表达出其再分配政策的喜爱，然后由某些联合政府实施这些再分配政策；

图 16: 某些国家 2013 年的贸易真实开放度和援助额。



注：援助额是指支付给家庭的现金社会福利。

资料来源：EIIW，与贸易有关的真实开放度与援助额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有关开放度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附录 I）。

关于援助和产出波动性指标，可能有人会说，产出波动性的提高应可以表明援助 GDP 比增加。但是，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一个问题待解决：

- 不能排除更高的援助比会提高产出波动性，而这反过来又会增加市场风险溢价，因此随着投资-GDP 比的下降，长期增长率会降低。
-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转移比的增加意味着人们可以对人力资本进行更多的投资（例如，在任何欧盟国家中，所有学生/儿童都可以完成学业，并且如果父母患了重病，也不必中途辍学（与此不同的是，美国没有医保的人口占比 15%），因此实际总收入增长率可能更高，但产出波动性也更高。

在未来，我们需要大力研究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些重要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

表 11: 1960-2000 年美国 and 欧盟之间某些经济指标的标准差

编号	阶段	美国	欧盟
GDP 增长率	1960-1997	0.020	0.017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1980-1996	0.026	0.016
失业率 ^a	1970-2000	0.414	0.220
竞争力 ^b	1975-1999	0.057	0.046

进出口交换比率 ^c	1971-1990	0.086	0.088
外界因素诱发的波动 ^d	1971-1990	1.650	7.010

注：a标准差除以平均值

b制成品相对出口价格指数。欧盟一般是指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

c资料来源：Rodrik（1998）。该研究提供了进出口之间的标准差（用对数表示）

d进出口交换比率波动率乘以进出口总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Alesina等（2001），第215页表7

关于美国和欧盟的波动性指标，从表 11 可推出，欧盟仅在外界因素诱发的波动性指标方面高于美国指标。Alesina 等人（2001）在其研究中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对实施收入再分配的意愿比欧盟更弱：

- 欧盟大陆国家以比例代表制为基础的投票制度，比起美国和英国建立的多数派投票制度--即 "先过后补" 制度，相对贫困的少数派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发言权；欧盟 27 国的贫困阶层可以相当清楚地表达自己的再分配偏好，某些联合政府就可以实施再分配政策。
- 由于美国社会比欧洲社会更加开放，因此即使是相对贫困的人群（年轻人）也可能不会特别支持美国的再分配政策-他们期望他们的收入会很快得到提高，从而影响了他们对美国收入再分配政策的看法。然而，这并不十分具有说服力。Bratberg 等人（2017）关于美国，德国，挪威和瑞典关于代际排名和收入流动性的经验研究表明：德国，挪威和瑞典在排名流动性（即从底部（百分位）位置上移或从顶部位置下移）方面结果非常相似，而美国处于一个怪异的位置，因为其排名始终没有多大波动。基于线性模型的德国和美国排名流动性分析结果表明，这两个国家的向上流动性均低于瑞典和挪威（例如，在瑞典和挪威，如果父母在收入排名中处于最低的 5% 的范围，则其小孩预计将上升到 40%，而美国和德国仅为 31%-请注意：收入排名榜被划分为 100 个均等部分，其中 1/100 被称为一个百分位数，某个人在排行榜中的位置可以从 1/100 流动到前 1%）。在流动性方面，美国国内流动性最高的地区还比不上瑞典，挪威和德国三国中流动性最差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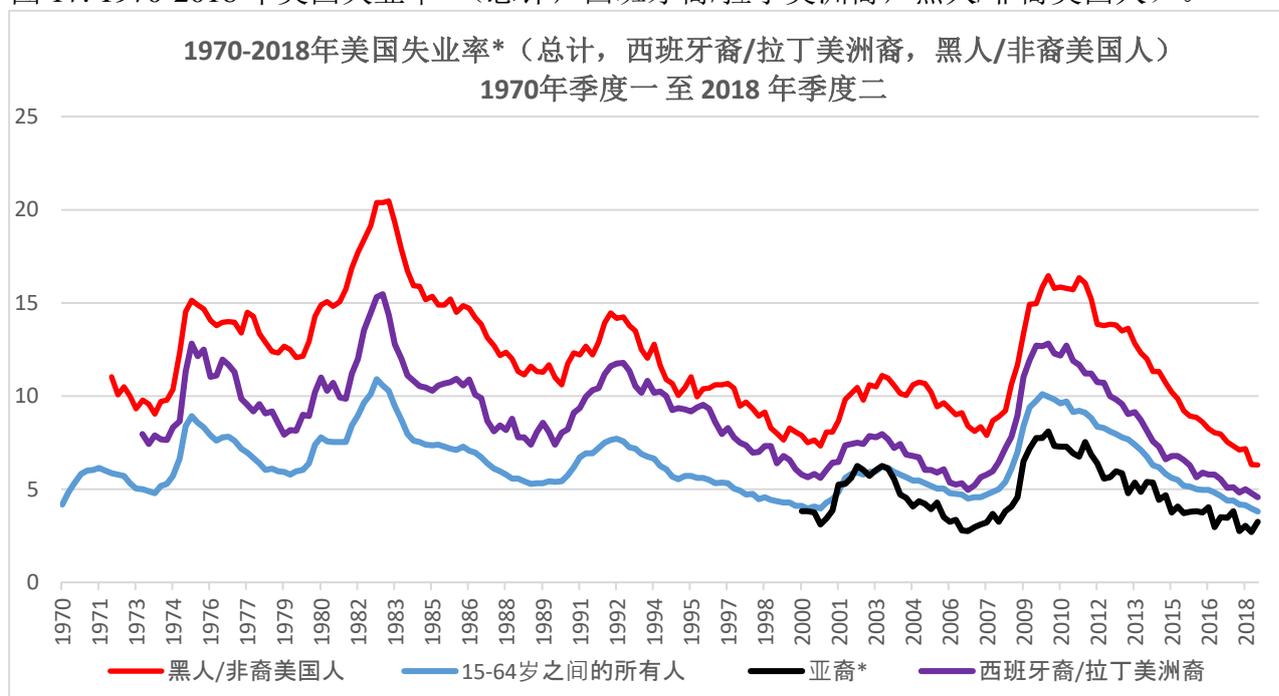
此外，特朗普政府实施的政策还暗示了，从长远来看，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可能会继续加剧，从短期和中期来看，失业率降低可能有助于降低贫困发生率，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初期。由于失业率相当低，预计平均收入会增加。此外，由于就业率高，拉动了工资的上涨，因此技术工和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都将提高。

部分美国移民问题可能没有 Temin（2017）所描述的那么严重，因为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中至少有一小部分移民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移民子女进入大学很重要，这确实需要为较贫穷阶层的学生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或者对大学收取的学费设置一定的限制。特朗普总统的政策方针并未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美国政策方面

关于特朗普 2016/17 年度的经济政策，人们可能希望他的 2016 年税收改革（减税和乔布斯法：TCJA；降低了所得税率和企业税率）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将会推动经济的增长，降低失业率，并且将美国带回到 2007-2009 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就业情况（Burda 2018）：2018 年夏季，美国的产能利用率仍然低于平均水平（78，比临界值 85 还差一点），所有种族的失业率均处于历史低位（见图 17）。特朗普政府同时刺激需求和供给的这一策略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了，给大公司以及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由于受到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的影响，第二和第三季度实际 GDP 的年化增长率接近 4%，其中军事支出、消费水平和投资均有提高。投资的增长似乎得益于专利和 ICT 资本投资的增长，从而提高了生产率。然而，由于 2018/19 年利率上升，政府将背负更多的债务（与德国和法国相比，美国政府债券临近到期），因此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例会增加，这可能很快会成为一个问题。

图 17: 1970-2018 年美国失业率*（总计，西班牙裔/拉丁美洲裔，黑人/非裔美国人）。



*注：15-64岁的失业率季度和季节性数据均经调整，但亚裔季节性数据未经调整。

资料来源：根据FRED（联邦储备经济数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自行整理所得

当有人向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咨询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时，委员会主席兼税务专家 Kevin Hassett 回答到，美国 2018/19 年的较高增长主要反映了资本成本的降低（资本成本下降 1%，投资约增加 1%），进而反映了公司税制改革；美国公司税制改革甚至对欧洲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

Hassett 在 2018 年 8 月在东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Hassett 2018）的演讲中给出了他的观点：

最近，预测值经过几轮修正，这非常有启发性，与税法对增长预期的影响一致。例如，在20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蓝筹股板块对2018年和2019年四季度实际GDP增长的平均预测值大致持平，因为媒体对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前景持悲观观点。因此，在整个2017年11月，平均预测值较低，为2.3%，2018年为2.4%，2019年为2.1%。

但是，自11月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主要预测值一直在稳步上调。由于税法通过，截至上个月，蓝筹股的一般预测是，2018年增长2.9%，2019年增长2.3%，分别上调0.6和0.2个百分点。官方给出的预测值经过更大的幅度的修正。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税法通过之前的最新预测中，预计2018年和2019年的增长率分别为2.0%和1.5%。现在，这两个年度的增长率分别大幅上调至3.3%和2.4%。换句话说，CBO现在预计未来两年的平均增长率将比一年前高出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针对2018-2027年度拟议的公司所得税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CBO将其对该影响的预测值上调4,760亿美元，超过了CBO自身预测的、关于TCJA的4,090亿美元的静态分值。

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WEO）。与10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发布的数据相比，2018年全球增长率被上调了0.2个百分点，同比增长3.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全球增长率大约一半的变化归因于美国财政政策的变化。在美国打磨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中更新并上调了《2017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发布的预期增长率，上调了0.6个百分点，同比增长2.9%。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预期值的上调部分是因为去年12月通过的《减税和就业法》对宏观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

关于全球增长，CEA初步内部分析发现，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外生税收变化可能会对全球增长产生令人惊讶的巨大影响，这表明近期全球增长预期的上升更多受到美国财政政策的影响。将Romer & Romer外生性税收冲击序列应用于全球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结果表明美国税收减少1%（占GDP的比重），欧盟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将立刻增长近1%，两年后超过1%。尽管较大的误差范围暗示我们不太重视这些估计值，但重要的结果是，95%的置信度可以表明无影响的假设是无效的。

尽管将美国外生税收变化与全球增长之间的关系机制仍然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但我相信，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而言，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种影响的严重性强烈表明，上述关系远远超出了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这一简单的算术关系。我们的直觉是，其他国家通常会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并通过采取类似的政策来应对世界经济体前25%个先行者所产生的影响。

但我们不应盲目相信预测值。您已经可以看出数据中出现的影响。根据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17年每个季度的商业固定投资都有所增长，2017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3%，高于2016年的0.7%。在2018年第一季度，该增长率再次跃升至10.4%。在2017年第四季度，设备投资的增长率跃升至11.6%，在2018年第一季度为5.8%，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税法允许公司将2017年9月以后的设备投资计入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在房屋商业投资和知识产权商业投资方面，在第一季度，房屋商业投资也增长了16.2%，知识产权13.2%。在第一季度，私人固定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了自2008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与这种明显的趋势保持一致的是，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资本开支计划综合指数创历史纪录或接近历史高位。

上面所有这些消息对美国工人来说都是个好消息。并没有按照一定的比例将公司税分摊给工人，而是通过长期投资渠道进行分摊，但是这会导致公司、工厂和厂房数量降低，设备数减少，并且最终减少就业，降低工作时间，降低生产力，从而降低工资...

因此，如我们刚刚所做的那样，当我们降低公司税时，从长远来看，我们期望通过增加投资，使工人摆脱税收的负担，从而增加目标资本，增加每名工人的资本，提高生产率和工资劳动。因此，就此点来说，2018年的数据影响与过去一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经济杂志》上的顶级文章所造成的影响一致。

同样令人激动人心的进步举措是，确定税革的调整速度，以使税革产生积极影响，正如我们刚刚经历的那样。根据勒夏特利尔氏定律，流动资本市场会立刻做出响应，并将资金从成熟且资金充裕的公司重新分配给更有活力但资金紧缺的公司，而劳动力和实物资本市场做出响应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但是无论如何，我要说的是，目前美国经济的基本面看起来颇为强劲，供应方面的潜力有所提高。

特朗普政府的税制改革似乎奏效，特别是当许多美国跨国公司已开始将其在国外的累计盈利转移到美国以及总部公司。尽管税率的变化似乎对供给方（通过增加投资和实现创新）和需求方均具有扩张作用，但美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即提高利率，不利于经济的增长。IMF在2018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美国中期增长并不乐观（IMF 2018；见附录C）。

美国利率上升将对许多新兴经济体构成挑战。如果某些新兴经济体（如巴西、阿根廷、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面临资本问题，甚至面临国际市场信心问题，那么美国和欧元区将流入大量的资金，起到避风港的作用。英国也可以从大量的资本流入中受益，但是在脱欧的情况下，英国的避风港角色可能会下降。大量资金流入的副作用是货币升值-因此，美国贸易平衡赤字和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可能会扩大，这反过来可能会使特朗普政府加大实施保护主义力度，比2017/18年实施的力度更大。

显而易见，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将遭到中国等国家的反击，从而损害全球经济增长。一个严重的风险是，特朗普总统可能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出口（高达5000亿美元的对美出口产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由于中国无法在贸易方面实施全面报复（美国对华出口额仅占中国对美出口额的一半），因此中国政府可能会考虑对在美外国直接投资或美国公司国际收入转移设置某些限制。反过来，这可能会破坏对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信心，也会损害欧洲和日本以及韩国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利益。

可以预料的是，特朗普总统将继续通过 twitter 大规模实施其政策措施（通常是心血来潮的），这些活动旨在影响美国选民和全球公众。在国际贸易冲突时期，特朗普的这种行为将引发全球公众产生极大的紧张感。由于中美贸易冲突，在 2018 年末，中国股市遭受股价指数下跌的冲击。由于中国股票市场指数的相对下跌导致中国企业降低在国内的投资比例，因此只要仍有回旋余地，中国政府往往会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及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如果中美贸易冲突严重损害了中国的 GDP 增长，这将对全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5 年第四条磋商工作人员报告》中指出，如果中国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改革，不仅会提高中国的产出，而且确实会对全球产生影响：平均来说，中国境外的人均收入将增加 100 美元-在中国周边国家中，人均收入还会增加更多，因此这些国家会增加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而在离中国较远的欧洲和拉丁美洲，人均收入增加额则比较少。

民粹主义与互联网

民粹主义的再现与互联网的扩展有关。互联网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 私人用户使用互联网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设备和移动数字服务绝对价格的下降使互联网成为每个人的平台，从而滋生出无数的抱怨以及利用用户不满情绪的团体-各种奇怪观点在 Facebook 和其他社交网络上得到成千上万的支持者，这意味着公众之间缺乏凝聚力。与反精英民粹主义政党相比，传统政党通常表现出被动态势（例如，在德国，德国另类选择党在 Facebook 上拥有比保守党 CDU 和社会民主党 SPD 更多的追随者）。
- 搜索引擎的排名算法使得极端的标题更容易地出现在 Google 等首页搜索页面上。许多互联网服务对用户免费的这一事实（实际上是通过资助或广告商资助而实现对用户免费）使互联网上的内容质量标准非常低；全球一部分的互联网充斥着虚假信息，并且由于上述排名算法，极端政策团体表现出占领数字政治世界的雄心。例如，在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AfD 成员经常发布极端的头条新闻，在互联网上传播虚假信息/新闻，从而通过互联网传播政治激进主义思想，破坏了民主：民主的实现需要各党派相互尊重其竞争对手的领导人，但如果所有（几乎）政治信息都是激进和极端的，则政治领导人之间相互尊重的可能性将很低。因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访问其 Twitter 帐户也不足为奇。

西方市场经济中，现代民粹主义属于反精英民粹主义。市场经济以价格、竞争和法治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互联网是传统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的对立面：在互联网上，数字服务的价格不产生直接作用，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价格为零。这会影响到互联网上信息内容的质量。在欧洲和美国，几乎不存在数字数据产权-从传统的西方法律角度来看，数据产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在数字世界中，使用拥有自己的数据或通过友情链接也可以实现有效付款，这一现象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是一件很奇怪的现象，因为这种付款是一种隐性的付款，私人用户通常不了解他们免费提供的数据的市场价值。这个不透明的世界是一个全球性的数字世界，其中法治意识非常薄弱：某些政府甚至试图强加自己的规则，因此互联网上没有有效的规则。互联网是一个类似于社会

主义的世界，具有社会主义制度所存在的许多矛盾现象。当前，互联网具有多种特性，这些特性从长远来看会破坏民主和市场经济。

政治两极分化

美国政治领域朝着两极分化方向发展这一现象背后有许多原因。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以非常低的边际成本访问数字社交媒体，从而推动了在互联网上发布许多极端职位这一现象。此外，在过去，两党制的实施自然会导致竞争中的两党努力贴合中间选民的偏好，而现在这一旧规则已不太可能实现。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使得政党更容易与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打成一片，因此制定了个性化且具有差异化的党纲。Blankenhorn (2018) 强调了以下几点：

- 重新关注左翼和右翼政治部落，虽然这有利于建立成员彼此认同身份的集体，但没有创造统一的价值。
- 选区划分似乎起了作用：1976年总统大选中只有25个县投票率达到20%或以上，获得压倒性优势，而2016年则为60个。
- 政党划分：过去有自由派共和党人和保守派民主党人，但现在这种分类越来越少；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7年的调查结果，政党之间的标准平均差距从15个百分点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36个百分点。
- 为一党私利而重新将划分选区现象增加——民主党或共和党故意操纵选区划分，提高获胜的几率。如果党派竞争对各县的影响较小，并因此发生政治趋同，那么激进主义可能会产生：在风雨飘摇的选区，候选人更加担心的是被自己政党内的极端代表“取代”，而不是担心选举失败。

美国政治体系的两极分化常常使得美国政党之间很难达成和解，并助长了国内的政治激进主义，这反过来增加了国际合作的难度。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例如取消了对各党派捐款的限制，结果使得极少数的、非常富有的美国人（前总统克林顿）对美国政府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实际上，超级富豪很容易地就可以说服政府放松管制，降低税率，这么做尤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在2017/18年度讲话中所透露的信息。显然，特朗普并没有使美国人民团结起来，恰恰相反，使社会发生分裂。特朗普塑造出的富人形象给许多相当贫穷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显然认为，这样的富翁自然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和政治）领袖，因此将推动美国走向繁荣，正如特朗普塑造的形象推动自己达到职业顶峰。但是，这种想法与现实不符。特朗普既没有表现出较强的个人经济能力，也没有聘请顶尖的经济顾问。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 Larry Kudlow（继 Gary Cohn 于2018年春季辞职后）因在美国金融危机前对风险的幼稚见解而闻名，他似乎不甚了解关键的国际经济问题。

破坏国际经济稳定的两种因素：民族主义和银行管制过度的放松

自 1990 年代后期以来，民族主义作为民粹主义的附带结果，正在崛起。在欧盟、东盟国家或南共市中，政府似乎越来越不想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南共市中，只有在巴西民粹主义新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于 2018 年当选之后，在某些国家内，民族主义思想才开始苏醒。某些国家也出现了大量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思想。

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是西方经合组织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欧盟国家）内民粹主义崛起的一部分。正如 Harry G. Johnson 所说的那样（Johnson 1967），我们可以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集体政治利益，它以民族主义的名义为个人带来一些额外的利益。因此，如果越来越浓的民族主义意识是各国的特征，那么即使人均实际消费有所下降，也不一定意味着个人总体利用率的下降。我们可以察觉到一种更具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兴起（如美国的特朗普（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总统以及英国支持脱欧的人）所表现的那样），并且连任策略很成功。但是，显然，我们可以看到，新民族主义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和其他国家的兴起正在破坏国际合作、和平与稳定，至少会削弱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作用，虽然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有利于我们树立信息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对于欧盟、美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而言，要建立新的国际气象以寻求更多的政治合作可能，这并不是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建立更多的贸易和投资联系确实可能会有所帮助。

David Ricardo (Ricardo 1817)提出了一种古老但尚未完全令人信服的观点，即贸易自由化会扩展贸易网络，进而有助于和平。可能有人会说，国际合作体制框架也是必要的。从这点来说，特朗普削弱国际组织的作用这一做法是有问题的，此外英国脱离欧盟也不利于发挥全球多边主义的作用。

英美都在推动新一轮的金融管制放松政策，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国际上。我们不应指望决策者有长远的眼光，也不应指望他们会认真考虑这些负面的外部国际影响-这是全球化时期的一个战略问题。如果没有内部化这些积极和消极的外部国际影响，那么会降低经济效率。历史经验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 2007 年至 2009 年的跨大西洋金融危机中，放松金融管制是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动力。在灵活的汇率体系内放松对外国银行业的管制很可能是一个标准问题，因为金融中心国家放松金融管制这一行为会增加该国的产出（Welfens 2017c），主要是因为将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这在增强版蒙代尔-弗莱明宏观模型中属于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

在 2007 年至 2009 年的跨大西洋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英国两国在多年以来过度放松了金融管制，使欧元区国家承受了巨大的平行管制压力。由于银行业发生严重的危机，国家损失了大量财富，民众也对政府信心丧失，因此国际金融危机正在破坏西方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维持的稳定。2007-2009 年发生的危机情况的确如此。由于金融危机破坏了各方的信心，其后果是政治激进主义的兴起，正如欧盟 28 国中部分国家以及美国在 2008 年后（2018 年 9 月 15 日是美国投资银行公司雷曼兄弟破产之日）所表现出的一样。经济学家缺乏政治考量使得美英分别遭遇金融危机，并且间接地也导致了英美民粹主义的崛起。

第三节

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持续存在的矛盾

关于贸易和全球化的政治争论

自由贸易在历史上有很多支持者，如 1776 年出版的《富国论》（简称）作者亚当·斯密，以及发人深思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者李嘉图。依靠自由贸易和贸易自由化的各国，都已实现了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的上升，尤其是英国，其历史上的自由化进程从 1890 年与法国签订自由贸易条约开始。当时的法国议会并不支持自由贸易，而是寻求英国的支持，对法国南角进行扩张，即当时属于皮德蒙特（今属意大利）的尼斯周边地区。

比较优势的原理对于外行和很多政治家来说并不容易理解。因为它主张，即使 A 国对 B 国开放自由贸易，且 A 国在商品 1（汽车业）和商品 2（纺织业）的生产上都有生产力优势，但是自由贸易也会让两国受益（此处论点部分遵循了 BLINDER, 2019 的观点）。开放自由贸易后，B 国将更专注于相对生产力差距较小的商品的生产，比如纺织品；而 A 国将更加专注于相对生产力领先的产品，即汽车。因此，两国的经济福利都将得到提升，A 国将出口更多的汽车，B 国将出口更多的纺织品。在这种情况下，假设两国都将劳动力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可在以上两个行业中流动，但要素的跨境流动是不存在的。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自由贸易会导致许多工作机会损失，因此更倾向于保护主义才是明智之举——正如布林德所说，政治上“蛊惑人心的特朗普”在其政策中做到了这一点。然而，就像是有人认为通过拿走现代高层建筑的钢材来建造更高更稳固的摩天大楼一样，这一观点是不充分的。很多人至少会明白，钢铁行业和铝行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会提高这两种金属进口中间产品的价格，导致使用这两种金属作为生产投入的铝罐和汽车的价格变得更加膨胀。新增的几百个钢铁和铝行业工作岗位，相对于包括汽车和铝罐在内的几乎所有其他行业的几千个工作岗位来说，都是苍白无力的，因此平均实际收入将会下降。需求一直是相对价格的负函数、实际人均收入的正函数。随着钢铝（以及许多其他产品）的价格上涨，人均实际收入下降，从而使大多数市场需求下降——实际国民收入和人均消费确实可能下降。因此，选择性保护主义对经济不利；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经济学家才会考虑进口保护（或对国外的生产征税），如当来自某国的相应进口商品的生产对进口国造成了伤害。如果国外的商品生产伴随着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了全球变暖以及所有国家的气候政策问题，则会出现以上第二种情况。然而，内化这些国际上外部效应的最佳方式是排放许可证的国际贸易。欧盟、美国和加拿大部分地区，以及中国都在使用这种排放许可证交易(ECT) (WELFENS ET AL., 2017)。这种许可证必须由使用化石燃料的企业购买，这实际上是一种弹性税收，即税率由国际 ECT 市场决定。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地区 ECT 市场能做到这样，因此便缺失了走向全球一体化的步伐——特朗普政府既不支持美国 ECT，也不支持全球的 ECT（他无视全球变暖的科学证据，却拥有自己的“理论”，类似于“地评论”）。

寻求保护的公司，如处于经济衰退时期，比成千上万的消费者更有组织，一旦需要保护某个行业，消费者将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 21 世纪，一半以上的贸易都是中间产品贸易，因此依靠进口中间产品的公司，包括有政治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也会为自由贸易游说。所以，许多行业的跨国公司都在通过一种有影响力的方式支持自由贸易（BHAGWATI，2004）。

在美国和欧盟的结构性改革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几乎不支持对工人进行任何再培训。对于想申请公共基金的工人来说，程序很复杂，而且为此目的划拨的预算还不到美国 GDP 的 0.2%，相当于瑞士的 1/10，而瑞士是一个较小的国家，因此，如果需要将在部门 1 失业的工人重新安置至部门 2 扩张的外国某处，成本并不高。但是美国是一个大国，重新安置人员和公司的成本会比大多数欧洲小国高得多。由此看出美国应实行政策改革。

结构性经常项目盈余的国家对全球化持相当积极的态度，尽管从经济学角度看，各国显然不单单从出口获益；相反，如果市场具有竞争力，进口的中间投入和最终产品会产生福利收益。逻辑上也可以明显看出，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同时拥有经常项目盈余。相对于 GDP 或国外收入而言，经常项目逆差不应超过临界点，否则这样的逆差将无法持续——在某一时刻，该国将分别面临国际信任危机和突然中止，因为资本输入将跌至最低点（净流出开始迅速产生）。因此，确保赤字保持在合理范围内是经济政策的任务。

至于贸易差额状况和经常账户，公众并不容易理解，涉及到 GDP 的货物净出口和服务，是由私人储蓄率加上财政盈余（税收减政府支出）减去投资占 GDP 比例决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认为，美国贸易逆差高的原因是国外的保护主义，或者他简单认为，那些对美国有双边贸易顺差的国家对美国不公平。后一种观点是相当不充分的，因为美国通常会有一些国家与它有双边逆差，另一些国家与它又有双边顺差。如果经常账户合计或贸易逆差占 GDP 比重看起来过大，美国的经济政策当然应该通过适当的激励措施来刺激私人经济存款；但这种方法可能不会被总统所青睐，并会一直没过美国的消费，通过征收更高的销售税或推出一项税率适当的增值税。

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很高，因为国家的储蓄率很高（也因为它的工业产品相当便宜，且大多数质量很好）。而储蓄率如此高，是由于文化原因，许多年轻男性只有在能用一辆车加一套公寓打动新娘家的情况下，才能结婚——北京的婚姻除外。因此，20-30 岁这个年龄段的年轻男性的储蓄率高于美国。美国的投资占 GDP 比重高于中国，但是中国逆差占 GDP 比重相对较小，另外美国的逆差占 GDP 比重相当高，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如果美国的储蓄率较高，国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变得相对较小，由于净出口等于国民产出与国内总需求的差额，改善美国贸易平衡和美国经常账户的关键就在于白宫。因此，特朗普政府不应该通过提高政府支出和降低所得税率以及降低企业税率来提高总需求量——从而提高国内消费和私人投资加上政府购买。

特朗普在 2019 年 2 月的国情咨文中认为，中国正在窃取美国的就业和财富，暗指中国的双边贸易顺差，其言辞很奇怪。相比美国，中国的外贸盈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窃取美国的就业机会。特朗普的措辞具有煽动性。他制造了一种非常人为的繁荣景象，这种情形的特点就是一旦上升期结束，将会有相当严重的内在风险。

实际上，随着现代全球化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国际要素流动。从经合组织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外直接投资，即跨国公司的投资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往往有助于资本形成（“绿地投资”），而且通常会引起国际技术转让，这有利于提高东道国的生产力。从理论上讲，毫无疑问，东道国的工人将通过提高生产力和实际工资（除非某些垄断性工会代表会对生产力的增长“征税”，部分墨西哥产业就存在着这种情况）。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的工人就成为了这种全球化的输家，除非他们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某种养老金计划持有跨国公司的股票。国外的高利润率将会增加这些股票的价值。然而在美国，只有 40% 的人拥有股票所有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2017)。但美国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国，也的确是世界第二大东道国——落后于中国。因此，美国并没有太多理由抱怨外国直接投资。

然而，中国的经济扩张整合、高增长出口，以及有利于技工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结构变化。对于美国收入金字塔的下半部分，往往存在着严重的调整问题。如果说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 ICT 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 1%，那么只要美国政府对高收入人群征收足够的税收，美国政府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培训和再培训应该不是难事——工人、管理者和资本所有者分别代表着那些主要受益于这种产出和收入增长的群体。特朗普政府税收改革的做法却正好相反，针对这些群体降低的税率大于广大劳动者群体的税率。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领导者，ICT 本身的扩张也有利于收入更强力的集中，因为数字化市场和产品分别助长了价格歧视（消费者更愿意为同样的产品或服务支付更高的价格），提高了利润从而提高了美国资本收入的份额；同样的情况也将在亚洲、欧洲和世界上其他地区出现。

从国家和全球角度看贸易、保护主义和生产

国际贸易的增长已经成为了工业革命和乃至现代繁荣的中心支柱。21 世纪初期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是技术密集型产品（VANDENBUSSCHE, 2014），结果比如说在美国或英国的保护主义（此处将脱欧视为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意味着离开一个重要自由贸易区，即欧盟），将对其他工业化国家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相反，与经合组织国家相比，中国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出口产品较不集中。然而，中国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其全球产量的上升部分反映了全球价值链的增长。随着主要经合国家越来越多地从中国采购中间产品，那些工业国可以更专注于技术含量高和知识密集型产品。国际分工促进了全球效率的提高，而且经合组织国家与中国的贸易，代表着缘于贸易的全球股利收入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国外直接投资分别是国际贸易和知识转移的关键因素。技术贸易主要是公司内部的现象，尤其是与跨国公司有关——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之间的技术贸易是这类公司的典型。知识和技术，分别对企业的生产和整个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无疑要纳入一个更广泛的贸易分析中。另外还需考虑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克服进口关税壁垒。例如，不能排除特朗普政府以战略手段提高进口关税，即为了增强外国公司在美投资的兴趣。

国际贸易涉及消费品、包括服务在内的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这意味着保护主义可能会以若干途径破坏经济福利。

- 消费品的种类可能会减少，这相当于一种负面的产品创新，因为在价格数量图中，需求曲线将旋转至原点，反映了消费者可获得的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和平均效用的下降。
- 如果来自国外的中间产品减少，生产成本将增加，因此许多市场的均衡产量将减少——这意味着劳动力的需求减少，除非劳动力能够轻易替代通常从国外进口的中间产品。价格水平将上升，实际收入将下降。
- 如果来自国外的资本货物越来越少——通常是高度专业化的机器和设备——那么资本形成将放慢速度。均衡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以及实际工资将下降（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并比其他情况下（正比进步率）增长慢。世界银行强调，保护主义驱动的资本货物增长将尤其对低收入国家产生不利影响（世界银行，2017年）。
- 如果这种发展影响到大国，那么互相依赖的负面效应将会产生。例如，如果美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减少中国的产出和实际收入，这将减少中国的进口；因为从简单的三边视角看，以及反过来看，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出口，以及美国和欧盟的实际收入将受到抑制。如果美国的贸易伙伴以关税报复美国的保护主义，这将引起（作为美国关税政策和伙伴国反应的综合效应）美国、中国和欧盟的实际收入负效应。

1949年至2016年期间，美国一直是自由贸易的主要倡导者，但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反而成为了保护主义的推动者。这逆转了近期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部分进程，并使西方经合组织国家2008/09年大衰退引发的有些隐蔽的保护主义变得有恃无恐，而大衰退又是由跨大西洋银行业危机引起的。EVENETT/FRITZ（2017）提供了大衰退后西方工业化国家越来越多地使用保护主义措施的证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年度报告显示，世界经济中的贸易限制有所增加（WTO，2017a；2018）。

已经将各自的进口关税降至商定上限以下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有一定再次提高关税税率的余地，许多国家在2008年之后就已经这样做了；此外，许多国家在大衰退之后，在政府采购中加大了对国家采购的力度（KUTLINA-DIMITROVA，2017）。如果假设所有WTO成员国转为最惠国税率并转为WTO规则下的可接受关税上限（约束税率）的经济后果，再加上贸易成本上升3%作为国际不确定性增加的替代，全球经济效应将是世界收入减少0.8%（KUTLINA-DIMITROVA/LAKATOS，2017）。这一效应反映了全球平均关税从2.7%增加到10.2%；其中许多亚洲国家的进口关税出现了高增长。2020年以后，世界贸易流量将相对于基线下降9%——超过2.6万亿美元。这些结果来自一个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代表了非常保守的估计，因为该模型没有考虑对汇率、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企业风险溢价（即企业债券利率与相关政府利率的差异）和创新动态的影响。如果将这种动态影响纳入分析，对全球资本形成、创新、人均收入和就业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此外，在贸易战的过程中，非关税壁垒迟早也会增加，这相当于进一步提高关税。关于保护主义的影响，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可贸易商品在中低收入家庭消费中的比重相当高，因此保护主义将对收入金字塔的下半部分产生强烈影响。保护主义具有递减性，因此对收入不高的个人和家庭的影响比高收入群体更大（FAJGELBAUM/KHANDELWAL，2016；FURMAN ET AL.，2017）。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大萧条中（1929-1933 年），世界贸易减少了近 2/3（CRUCINI/KAHN, 1996；MADSEN, 2001），西方主要国家的实际收入减少了约 10%。虽然大部分收入减少可能与投资减少和失业率上升有关，但贸易下降肯定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消极的动态经济因素加上政治不确定性的增强，二者相互依存。另外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中，产量下降了约 20%，对全球贸易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影响，因此也破坏了欧洲的收入增长。不知目前西方世界是否已经从这些负面的历史动态中吸取了教训。虽然实证和模拟分析（KUTLINA-DIMITROVA, 2018）表明，例如，相当于保护主义的公共采购规则会导致美国效率低下和整体就业岗位流失，但特朗普政府似乎决心在政府采购中强化购买美国的政策导向。这不符合美国的长期经济利益，也不符合美国贸易伙伴的利益。然而，短期的政治考量似乎主导了美国的特朗普政府。由于 2016 年 11 月总统大选后，数十名专家离开了商务部，且无人接替，因此不排除美国经济政策领域的经济学专业程度被大大削弱。

虽然全世界的贸易政策专家和经济学家都对自由贸易的好处有有力的观点，但特朗普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似乎认为保护主义，尤其提高进口关税对美国有利。然而，即使部分均衡分析已经表明，基于只看有限的经济效应，美国可以从对中国的进口关税中获得 180 亿美元的利益，这种做法是相当令人生疑的（ZOLLER-RYDZEK/FELBERMAYR, 2018）；即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和美国在华子公司因美国进口关税而导致的盈利能力下降等方面也应予以考虑，一种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也将更为适宜，事实上，即使是美国对中国的单边进口关税也会对美国产生负福利效应（WELFENS, 2018c）。

自特朗普发表就职演说以来，这位美国新任总统一直持有奇怪的经济观点，包括认为--见 2017 年 1 月的就职演说--美国的经济形势相当疲软。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的关键措辞是，强调其反对精英阶层的立场、美国的经济问题和希望采取新政策，内容如下：

“当权派保护的使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国家的公民.....但对很多公民来说，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在市中心的母亲和孩子正饱受贫困，生锈的工厂像墓碑一样散布在我们国家各处；教育系统资金充裕，年轻可爱的学生却学不到知识.....每一个关于贸易、税务、移民和外交的决定，都将有利于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

在 2016 年的总统竞选中，特朗普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关注“美国优先”，并强调美国经济已经变得何等脆弱。后者对于一个再 2016 年已经走向充分就业，并在 2015/16 年度实现了可观经济增长的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评价。在经济增长方面，美国总统曾在竞选中承诺，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美国将实现 3% 的增长，大约比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率高出整整一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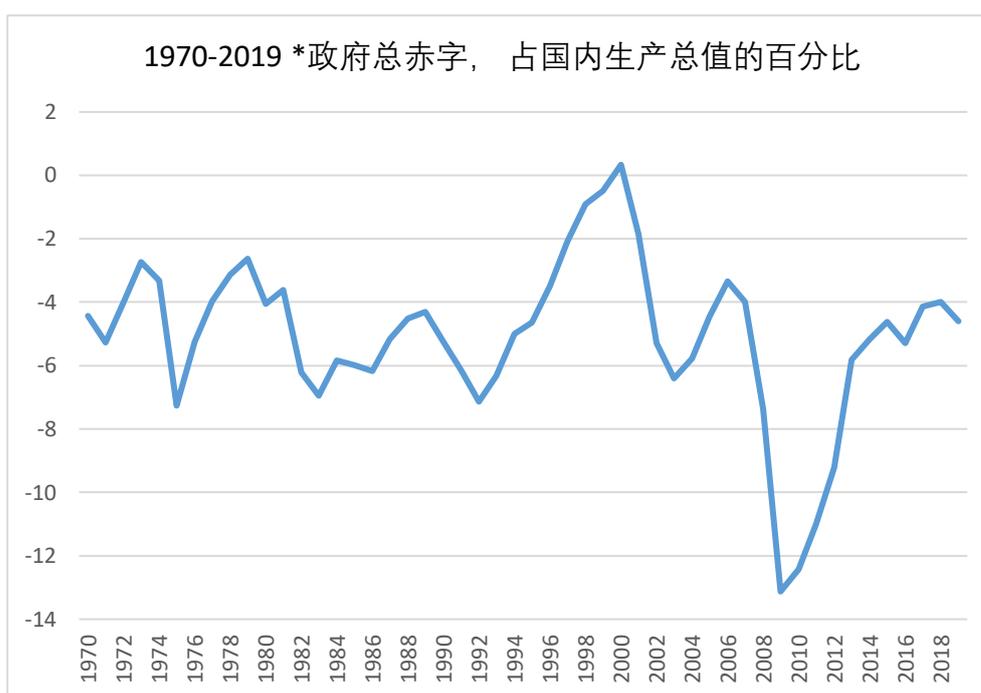
与之前的很多共和党总统一样，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加大了支出和减税力度，所以赤字占 GDP 比重上升，中期债务占 GDP 比重可望上升。随着国内需求的上升，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口增加，所以经常账户占 GDP 比重提高，所以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头几年与里根总统任期的头几年，双赤字问题没有太大区别。FRANKEL (2006) 曾讨论过双赤字问题，他也特别指出，在共和党总统任期内，美国的支出占 GDP 比重趋于上升，

联邦预算恶化。最近，BLINDER/WATSON（2016）也强调了这一趋势，他们提出，国会预算局的数据显示，民主党总统时期的结构性联邦预算赤字（占潜在 GDP 的 2.1%）平均小于共和党总统时期（占潜在 GDP 的 2.8%）。

特朗普的财政刺激

布鲁金斯研究所哈钦斯财政与货币政策中心显示，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在 2017 年支持少量的财政扩张，而在 2018 年通过降低税收和增加联邦政府支出的方式支持相当强劲的财政扩张。在美国经济上升中期，即 2018 年（见后续数据），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经济刺激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0.5%，这几乎与正常经济衰退时典型的财政政策刺激力度相当。因此，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是扩张性的顺周期政策，是对更多周期性上升的刺激。2017/18 年美国的赤字率（见下图）将达到 5% 左右的异常高值。这与经济学公认的知识完全相悖，因为根据经济学知识，在经济上升期的赤字占 GDP 比重应该非常低，这样才能在持久衰退期留下足够的调转余地。随着实际收入的下降，税收将减少，财政支出的增加会强化赤字占 GDP 比重。

图 16：1970-2019 年美国政府总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注：经合组织 2018 年至 2019 年的预测数据(2018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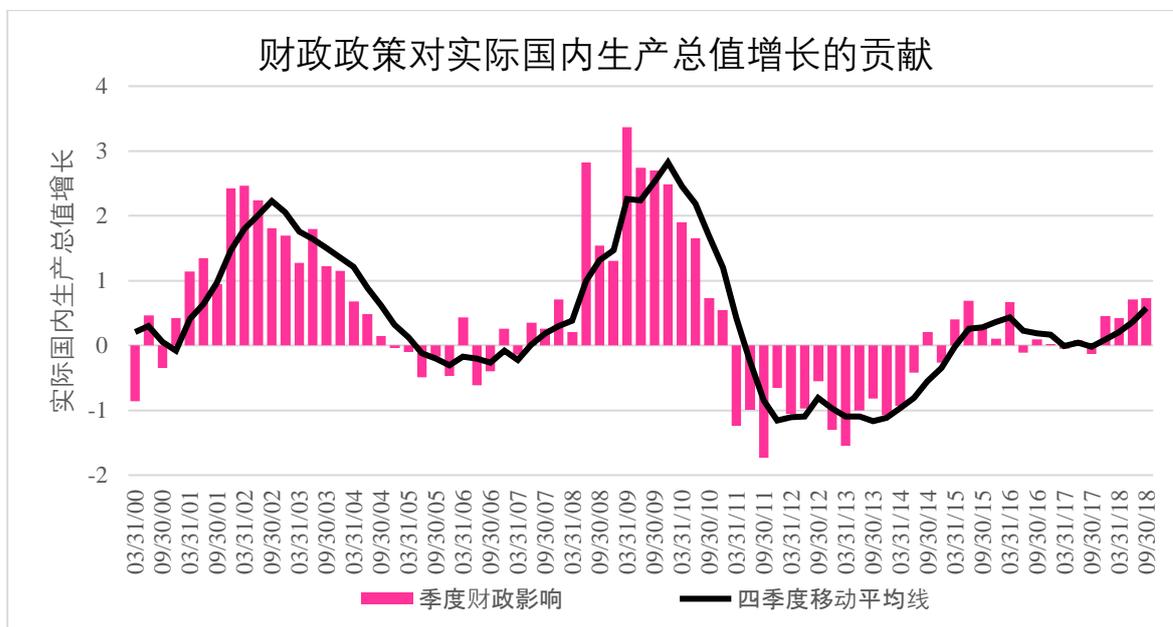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数据，1970-2017 年政府总赤字

特朗普降低税收以及提高联邦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很可能在上升期就已经很早期地引发了十分紧缩的货币政策，因为对于政策来说，美国中央银行遵循泰勒规则（经济学家普遍这么认为）。这意味着如果产能利用率上升——产出缺口缩小——通胀率

高于目标值，中央银行将提高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由于特朗普的进口关税，通胀率上升确实是可能的，扩张性政策使用增加了政府支出，而任何教科书都会建议政府在经济下行时支出，以此对抗强烈经济衰退的风险。2018 年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减少了产出缺口，即产能利用率实现上升，从而引发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利率上升，如果这样的状况转化为实际利率上升或美元实际汇率足够高的升值，则会抑制产出；前者会导致投资下降，后者会导致实际净出口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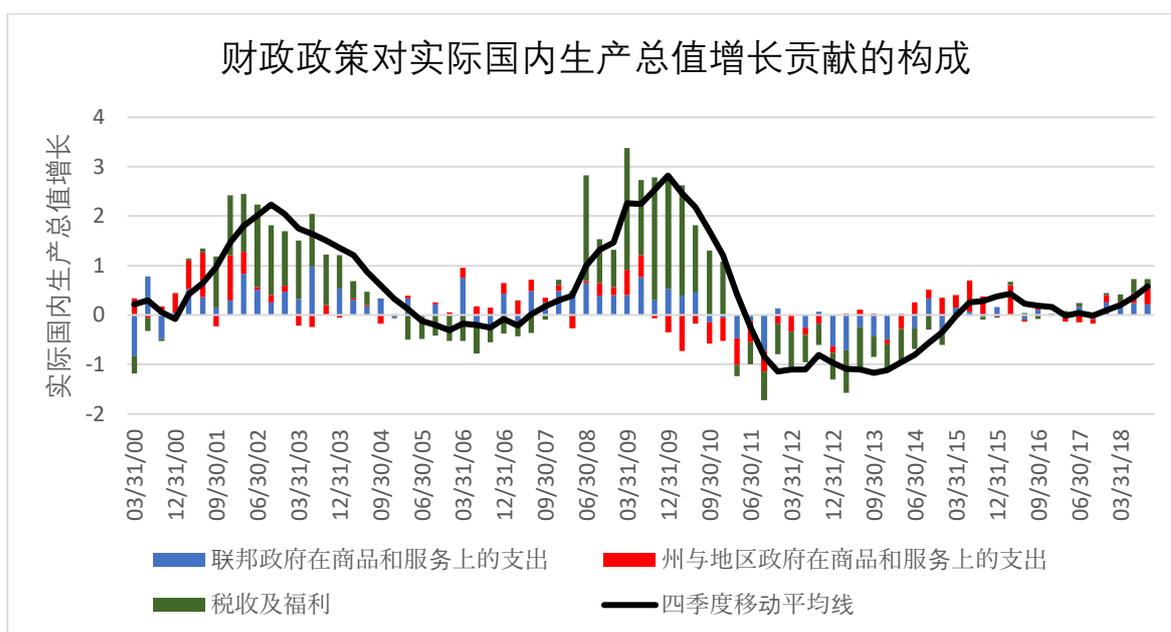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不满 FED 利率上升的原因——他的财政政策和 2018 年的贸易政策一样矛盾。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了产出和实际收入的增长，这样进口增长就会上升，因此贸易差额以及经常账户差额就会增加。

图 17a.美国财政政策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 (2000-2018 年)



资料来源：布鲁金斯研究所（哈钦斯财政影响度量）

图 17b: 美国财政政策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的构成



资料来源：布鲁金斯研究所（哈钦斯财政影响度量）

最后，有两个关键的经济关系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第一个是债务占 GDP 比重，根据多马规则，其长期比率由政府性结构赤字占 GDP 比重 (SDGDP) 与实际经济增速率 ($g_{Y\#}$) 之比得出。类似于多马规则，相对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长期外债（这里用 FIDGP 表示）的长期外债，由经常帐户赤字占 GDP 比重 (CAGDP) 与产出增长率之比得出： $FIGDP = CAGDP / g_{Y\#}$ 。这些公式对美国、日本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超过债务占 GDP 比重和外债占 GDP 比重的临界值，就会导致各国政府债券的评级下降，从而导致实际利率差上升。

对美国国际贸易立场的不一致看法

美国政府也曾抱怨，欧盟许多国家对美国的商品贸易顺差很高，德国是该领域最大的欧盟商品出口顺差国。2018 年 6 月，特朗普主导的咄咄逼人的美国贸易政策变得更强大，他在月初就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以及欧盟的钢铝产品征收美国进口关税；6 月中旬，美国宣布对中国 500 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征收 25% 的进口关税，中国政府转而宣布迅速实行报复关税，但只覆盖总体数量的一半左右。特朗普政府声称还有 20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也被指定征收美国进口关税。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如此急于发动全球贸易战，他的预期是什么，他又期待着何种结果。

唐纳德·特朗普是由许多来自处于美国收入金字塔下半部的选民选出来的，他们在 2016 年占国民收入的 13%；相对于 1980 年，即里根总统上任前一年，惊人地减少了 8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西欧在 1980-2016 年期间，收入金字塔下半部的比例一直相当稳定，处于负 2 个百分点，详见附录 3）。看来，特朗普总统的民粹主义政治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构成收入金字塔下半部的这一群体，并且他认为提高商品贸易顺差是为制造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必然途径。这是一种奇怪的青睐工业工作的偏见，仿佛服务业工

作至少在美国都不会是一个不错的收入来源（这种观点与卡尔·马克思的执念有着一种奇怪的相似支出，即服务业不代表增值，只有工业才可以）。特朗普总统在演讲和推特中强调过，美国每年约 8000 亿美元的商品贸易差额赤字是多么不公平，但所有这些抱怨都是错误的，因为通过国际贸易解释总就业岗位损失，商品和服务贸易差额在某种“机械”的层面上是有意义的。这种机械的观点意味着在特定的国内生产力条件下，如果商品和服务的产品净出口被本国产品替代，人们可以计算出有多少服务业和制造业工作可以产生。例如，LAWRENCE(2017)的研究表明，美国的贸易差额逆差对应的是美国约 350 万个工作岗位。然而，国际贸易的经济观与外行的机械观点不同：随着贸易的增加（或者说区域一体化促进了整体贸易量的增加；由各国组成的区域一体化俱乐部的贸易创造超过了对外部国家的贸易转移，这是一个保守假设），那么每个贸易伙伴国的国际化程度和生产力将提高，因此所有国家都能从贸易中获益。

特朗普的一些贸易顾问显然已经告知过他，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分别反映了长久以来美国进口量的上升以及经济全球化。正如 LAWRENCE (2017) 的研究表明，美国制造业的衰退是一个长期形成的现象。有人可能会补充说，美国具有很强大的服务出口（顺差）地位，所以很多服务业的新工作都在美国产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为美国的非技术工人创造了许多高薪的工作岗位，但久而久之制造业中这类工人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制造业仍未很多非技术工人提供了许多高薪的工作岗位。但几十年来，美国在活跃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并不强势，因此，在亚洲经济体商品和服务出口量上升的背景下，全球结构性变化减缓了美国的工资增长，尤其是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

美国在现代企业家精神方面有着深厚的传统(AUDRETSCH, 2007年)，并已成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领导者。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与高利润率相关联，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可以部分解释美国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国际领先地位。

就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增值在出口总额中的份额似乎出现了下降趋势，这当然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即越来越多的中间产品被进口，这反过来又有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这意味着，美国的进口关税可能会间接地大大削弱国际竞争力。

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开始强调美国的商品贸易差额逆差非常大，并希望纠正区域性贸易协定，比如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协定，他们与美国共同组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地区。一旦特朗普总统在 2016 年底实现了由史蒂芬·姆努钦和加里·科恩主持设计的税制改革，美国政府就转向了每年近 8 千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并攻击许多对美国有双边商品贸易差额顺差的国家；在 2018 年 7 月访问英国期间，特朗普总统公开抱怨欧盟对美国有约 1500 亿美元的双边商品贸易差额顺差，尽管这根本没有经济意义。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自 2017 年 1 月 20 日被任命到 2018 年 4 月辞职（4 月 2 日由拉里·库德洛接任），期间似乎并不支持特朗普对美国的新保护主义做法，他认为特朗普对贸易差额逆差的不够重视（WOODWARD, 2018）。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利用对钢铝进口征收进口关税的威胁，试图在其他国家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权；还特别着重中国，以及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非法转让技

术的问题。2018年6月1日，美国总统已经对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的出口商征收25%的钢铁进口关税和10%的铝进口关税；对中国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征收25%的进口关税，这在2018年6月中旬已经宣布，这将面临过去很少使用的《贸易法》第301条款，但这一次它将适用于广泛的商品，美国政府认为这些商品象征着美国知识产权受到侵犯。与欧盟的贸易冲突属于第232条款的范畴，因此是出于为国家安全考虑的目的。

贸易冲突的一个特例会关注特朗普总统是否愿意改变与大韩民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该条约（"KORUS"）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该条约是美国和韩国之间战略军事合作的一个关键因素。在韩国驻扎军队，并由先进的雷达设备探测来自北朝鲜的任何潜在攻击，是美国的一个关键安全利益。在这种背景下，令人更加差异的是，特朗普总统似乎考虑提前结束目前形式的条约，并重新进行KORUS（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而且特朗普似乎不愿意多听他的经济和首席军事顾问的意见（WOODWARD, 2018）。

美国对韩双边贸易逆差（2017年为180亿美元），是特朗普有意重新进行KORUS谈判的主要动力。然而，美国对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额较高，所以美国在韩国的国外生产有效地创造了高额利润，这些利润被转移到美国母公司或在韩国进行再投资，以创造美国在韩国子公司未来更高的利润。美国对韩国的双边经常项目逆差——相对于美国GDP而言，小于美国双边商品贸易逆差；美国对韩国服务出口的双边高额顺差明显。此外，希望美国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保持稳定的贸易差额的纯粹的双边观点是无稽之谈，会人为地阻止大量的贸易份额，以及全球范围内积极的生产力和增长效应。如果因为特朗普这样人为地推动贸易差额导致全球产出减少，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就会减少，即比其他国家的出口要少。最后，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应永久保持在1%以上，否则会出现全球美元荒，损害全球贸易、发展和繁荣。美元是最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只有凭借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世界上急于在各自的中央银行持有美元储备国家才能获得额外的美元，他们希望在贸易量上升的同时积累美元。特朗普身边的经济顾问没有多少人明白这一点：劳伦斯·B·林德赛显然是其中之一，而目前还不清楚彼得·纳瓦罗（一位经济学家）和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是否了解国际经济学。

根据WOODWARD(2018)，据说加里·科恩曾向特朗普总统提问为什么他如此强调自己的观点，即美国应该增加制造业，出口更多的商品；特朗普回答30多年来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对此，科恩反驳，15年来他一直认为自己可以从事职业棒球生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对的"。这个30年前过时的政策蓝图可能是特朗普经济政策灾难的一部分。

虽然中美贸易冲突是个特例，但跨大西洋贸易充满了利益冲突，尤其是2018年6月8日至9日在加拿大举行的夏洛瓦G7会议失败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恶化更加严重。签署惯例G7联合公报一天后，美国总统撤回了公报上的签名并生效，公报第4点中强调：*我们承认自由、公平和互利的贸易和投资，同时创造出互惠的利益，是促进发展和创造就业的关键引擎。我们再次提出遵守汉堡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关于*

贸易的结论，特别是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关键作用，并继续打击保护主义。我们注意到双边、区域和多边协定必须公开、透明、包容和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重要性，并承诺努力确保这些协定可以补充多边贸易协定。我们承诺尽快实现世贸组织的现代化，使其更加公平。我们努力减少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和补贴”。

如果考虑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可以强调的是，美国总统不仅在 2017 年 1 月拒绝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条约》--涉及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等 11 个伙伴国--送交美国国会批准，还决定不继续与欧盟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进行谈判；除此之外，他还阻止了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法官的（重新）选举，这样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将在 2019 年夏天死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发布的《关于美国的第四条报告》（IMF, 2018a）在贸易政策标题下指出。“美国保持着非常开放的贸易体制。多年来，这支持了美国的增长和就业创造，并帮助提高了生活水平。美国在贸易方面的领导力鼓励一系列国家开放自己的贸易制度，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人们也普遍认为，全球经济需要能够依靠一个开放、公平和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

如果考虑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人们可能会强调，美国总统不仅在 2017 年 1 月拒绝将涉及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等 11 个伙伴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条约》送交美国国会批准，他还决定不继续与欧盟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进行谈判；除此之外，他还阻止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法官的遴选，所以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将在 2019 年夏天停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结束与美国的第四条磋商（IMF, 2018a），并针对美国的贸易政策发表声明：“美国主张非常开放的贸易体制。多年来，这支持了美国的发展和创造就业，并帮助提高了生活水平。美国在贸易方面的领导力鼓励一系列国家开放自己的贸易制度，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人们也普遍认为，全球经济需要能够依靠一个开放、公平和具有规则导向的国际贸易体系。”

奇怪的是，IMF 发布的第四条磋商中，部分说法与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现实有冲突，似乎忽略了在加拿大召开的 G7 峰会前后特朗普传递的信息。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支持双边主义，与之前美国六十年的政策也大相径庭，还不赞成多边主义。特朗普政府也是一个例外，IMF 在报告中指出，特朗普政府偏离了在经济上行期不实施扩张性强的顺周期政策的规则（IMF 指出：“政府税收和支出政策的综合效应将导致联邦政府的赤字在 2019 年超过 GDP 的 4.5%。这几乎是 3 年前赤字的两倍。如此强烈的顺周期财政政策在美国范围内相当罕见，自上世纪 60 年代约翰逊执政以来还未出现过”）。IMF 表示，专家预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 GDP 比重将从 2017 年的 2.4% 上升到 2020 年的 3.6% 和 2023 年的 3% 的峰值。

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多次抱怨货物贸易差额巨大：2016 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约占 GDP 的 4%，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占 GDP 的 2.7%，因此美国的服务贸易收支顺差约占 GDP 的 1.3%，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 GDP 的 2.4%——后者是货物和服务收支加上主要收入余额（主要是美国公司在海外的分红，在美外国子公司的净分红，再加上来自海外的其他净生产要素收入），再加上单边国际汇款（如向联合国

和其他国际组织支付)。贸易差额的改善有助于创造充分就业机会,从这个角度看,人们或许可以理解特朗普总统对美国巨额商品贸易差额赤字的抱怨;但是,美国在2018年伊始就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因此,抱怨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是荒谬的,而且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的抱怨是其任期内的一个不幸,因为特朗普在美国有着许多世界上最优秀的贸易经济学家,但他似乎并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从中可以看出民粹主义的一个关键因素:发明自己的伪科学法则,特朗普的例子不乏对气候变化分析以及国际经济学的关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民粹主义总统一厢情愿的相关案例,2018年7月,他宣布土耳其的高通胀率可以通过土耳其央行降低央行利率来降低,成为了经济学中的无稽之谈)。

美国在2016年和2017年2.4%的经常账户赤字并不引人注目,因为以美元为主要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国可以有效地为1%的进口总额——相对于GDP——提供资金,因为美国从外国央行持有的美元储备中获利,而份额巨大(美国与世界资本市场支付的利息差异也是如此巨大),这为美国创造了相当于1%的美国GDP。因此,假设美国实际产出的长期增长率为2%,那么2016年和2017年的经常账户实际赤字与GDP占比为1.4%,是不成问题的。这意味着美国处于长期稳定状态的外债——相对于GDP——将达到70%,再加上美国须支付利率,假设是1.95%,美国的净利息支付将占GDP的1.4%,这样经常账户情况就会十分稳定。不过,特朗普的财政政策明显有助于提高IMF所强调的中期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但美国伙伴国不应该因为这种发展状况受到指责。

美国能否从保护主义中获益,缩小贸易差额?KIM/SHIKHER(2017)的分析十分有趣,尽管它忽略了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更多的启示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效应,而对于美国来说,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以及美国对外的直接投资都很重要。作者设想了一个有商品和债券市场的三国模型(美国、中国、世界其他地区(RoW))。尤其是他们分析了美国对中国或对所有国家(意即: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征收10%进口关税的情况。美国关税的提高在短期内改善了贸易差额,但终究不会长远。美国的储蓄和投资都会下降,但美国投资的初始下降幅度超过了储蓄的下降幅度。上述平衡模式所考虑的主要影响是:

- 在美国,消费的更多是国内产品;
- 在某些情况下会发生贸易转移;
- 面对美国进口关税的行业和因此减少的美国消费进口,国外的生产价格将下降,这样就会出现美国商品价格的相对上涨,损害美国的出口;
- 非贸易品的生产量将增加;
- 贸易差额出现了轻微和临时的改善;
- 贸易差额改善的幅度相当小;
- 对于美国来说,有福利损失,而外国则享受福利收益。

因此，人们可能会对特朗普总统的激进贸易政策产生巨大怀疑。此外，全球贸易战有加速的风险，这将抑制全球实际收入的增长，所以美国的出口增长可能会减少。考虑到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美国从子公司获得的收益润显然也会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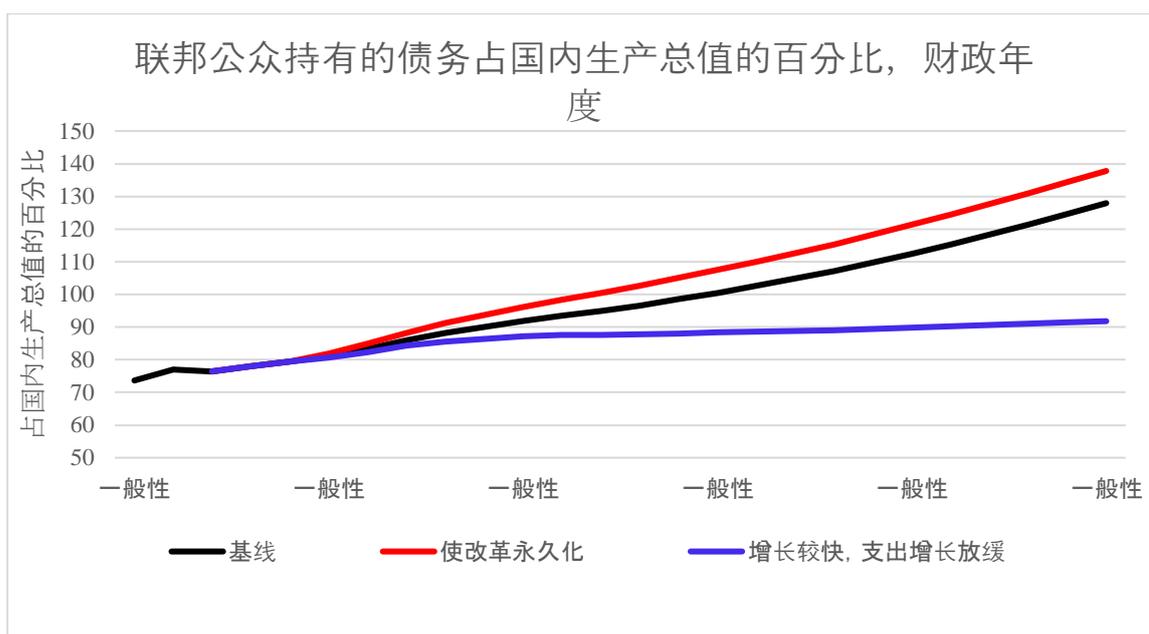
关于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OBSTFELD/ROGOFF(2005)强调，对于贸易差额调整来说，可贸易商品与非贸易商品价格比率的变化比实际汇率的变化重要两倍。一个基本要求是，在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将实际贬值与非贸易品价格的相对下降结合起来：随着非贸易品价格的相对下降，非贸易品的生产积极性降低，因此，未来可贸易品部门的超额供给将越来越多。相反地，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应该面临非贸易品的升值和价格上涨：后者对于像德国这样的结构性经常账户盈余较多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欧元区似乎也代表着结构性账户盈余（尤其是相对于美国的盈余）。从这个角度来看，欧元区公共投资的上升和工资的上升可能是提高非贸易品与贸易品价格比的一个出发点，这也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

随着美国不断动摇世界贸易组织权威，并向传统西方盟友征收进口关税，共同支持经济全球化和更长远贸易自由化的西方世界已不再是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在脱欧这个历史性事件的背景下，即英国离开其作为正式成员超过45年的欧盟（于1973年加入）的背景下，需引出几个问题，同时也要看到欧盟内部更广泛的矛盾，这使得欧盟显得相当动荡；甚至不排除欧盟在中期内完全解体的可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第四条任务报告指出，美国经常账户余额赤字将在中期内增加（IMF, 2018a）。人们可能会补充，被特朗普总统极力强调的美国商品贸易差额逆差也将进一步增加。这很可能使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分别对于欧盟/欧元区和德国更具有保护主义性质。仅仅关注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也奇怪，因为这样一来服务贸易就会被忽略，但服务出口的每一笔出口美元收入都与商品出口获得的美元收入一样；所以特朗普总统对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强调是很不足的——这几乎像是国际版的新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荒谬地猜想就是服务并不是真正的增值，只有商品生产才应该被视为增值。

从美国和欧元区的角度看，将焦点放在经常账户上（贸易差额加服务差额加原始收入，如从国外获得的红利扣除支付给国外跨国公司总部的红利），这对跨大西洋政策对话是合适的。对美国来说，美欧经常账户顺差并不重要，相反，美欧区经常账户差额才重要：至少汇率（欧元/美元）原则上可以起到调整的作用。然而，美国需要一次美元的实际贬值，而美国利率上升和暂时相对较高的美国经济增长将有助于实现升值。2018年美国巨大的财政刺激伴随着非常赤字占GDP比重，即接近5%，这在经济上升期是原不足够的。那么未来经济衰退很有可能导致赤字占GDP比重超过6%，长期来看，这又会提高美国债务占GDP比重。经合组织(2018a)美国国别报告显示，如果特朗普政府延续目前的政策，到2040年债务占GDP比重将接近140%。

图 18：未来美国债务占 GDP 比重（经合组织模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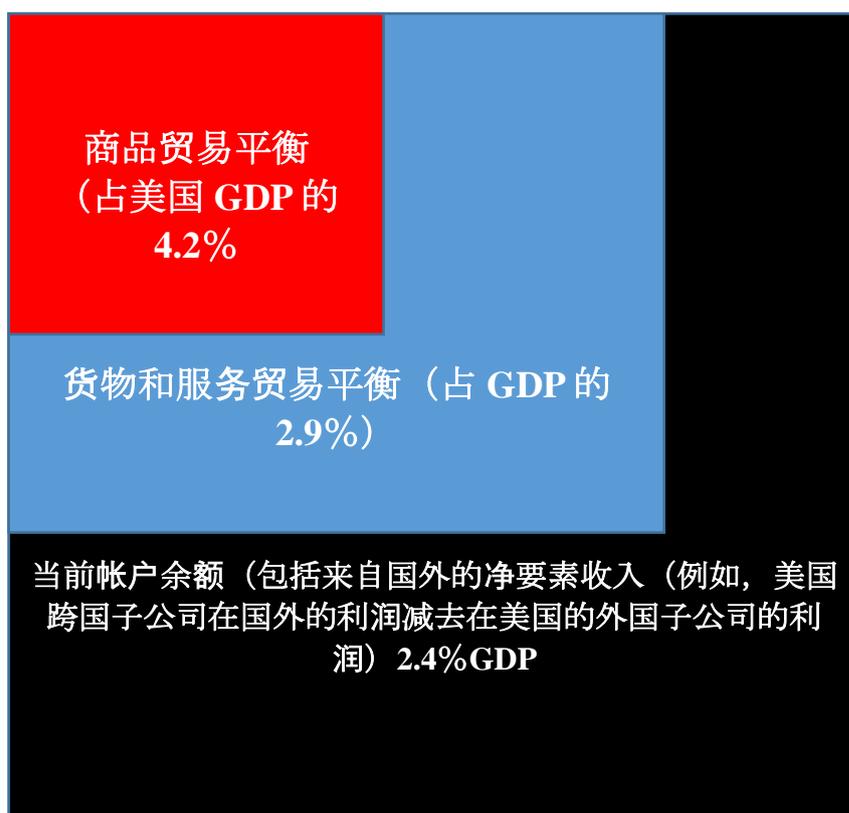


注：基线情景由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自 2018 年 4 月开始预测，基于 2017 年的长期预测对 2027 年以后的情景进行了扩张。相对于基线，使改革永久化的设想减少了税收占 0.8%。该设想将 2018 年和 2019 年每年的支出上限提高了约 1500 亿美元。这些改革被假定将 2018 年和 2019 年的实际 GDP 增长提高至 3%。此后的路径采取 Barro 和 Furman(2018)的计算结果，即在其余设想中，税制改革将比 CBO 的 GDP 预测提高 0.12 个百分点的年增长率。产出增速较高、支出增速较慢的设想建立在前一个设想的基础上，将设想中的平均增速提高到 3.4%，并将模拟中非利息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上升限制在 1.6%。

资料来源：数据详见经合组织(2018a)，图 1.8，第 23 页。

美国的保护主义将降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出口-GDP 比率和进口-GDP 比率，还可能提高全球股市和金融市场的波动性--通过美国作为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在 BREXIT 还将破坏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的时期，这种不稳定肯定是不受欢迎的。随着 BREXIT 的实施，欧盟的金融批发市场--主要以伦敦城为基地--面临着特别的问题，因为 BREXIT 之后，欧盟 27 国面临着以欧元计价的衍生品、货币交易等大部分份额被置于欧盟之外并受其监管的奇怪局面，这种局面本身就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并可能引发冲突。

图 19：特朗普投诉箱



注：2017 年的数字，除商品和服务余额外：2016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经济分析局，《美国国际交易的初步估计》，2018 年 3 月发表。

全球化的问题是什么？

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他认为全球化分别对美国和美国社会关键阶层不利。中国在 1978 年开始实行贸易经济开放，开放跨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在最初的区域限制框架内，贸易自由化令人印象深刻，那么经济理论是如何谈论贸易自由化的呢？我们是否拥有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欧盟与中国贸易和投资动态的分析模块；我们是否理解美国与墨西哥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动态，通过更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执政期间，于 2018 年 10 月完成了稍有变动的更新），实现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自由化？

- 竞争性的两国模式下的贸易全球化--两国都有竞争，没有国际要素流动（因此没有国际劳动力流动，也没有外国直接投资，即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对两个相关国家都有好处。传统的简化教科书模式是假设有两种生产要素，即劳动（L）和资本（K），有两种不同的商品（一种是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比如汽车行业或机械的生产；另一种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比如纺织品）。这两个国家都能从贸易自由化中受益，自由贸易将特别帮助较穷的国家--资本密集度（K/L 之比）较小的国家。会有一个追赶的过程，工资会相对于资本的报酬率，

即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而增加。最后，贸易实现了报酬和实际利率的均衡。K/L 禀赋比率相当高的国家（如美国）会增加生产资本密集型的部门，所以在相对富裕的国家，汽车业将会扩张，汽车将会出口。相对贫穷国家的工资会提高，从长远来看，国际工资差距将被贸易消除。在每一本贸易理论教科书中，这些内容都是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为标题，以两位瑞典经济学家的名字命名，他们在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了关键论点。

- 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表明，在一个简单的教科书模型中，有两个国家、两种商品和两种生产要素(比如可以称为人力资本的技术工，所以我们对资本 K 和非技术性工种运用一种类比)的相对报酬将会怎样。如果一个贸易品 i 的相对价格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里（外生）提高了，就可以说明该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会提高，而该生产要素在生产相应商品的过程中被相对集中地使用。中国于 1978 年开放，但几年以后才看到双方明显的经济效果，如果 20 世纪 80 年代美欧和中国开放双边贸易，提高了机械相对于纺织品的价格，那么在美欧集中使用于机械生产的美欧技术工的报酬必然会相对提高，而在美欧集中使用于纺织品生产的非技术工的工资则会降低。RODRIK（2018）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提到了一些与美国相关的民粹主义和全球化问题，他还指出进口关税的福利损失通常为进口关税税率的平方函数。参与贸易自由化的双方，即中国和合成的一方"USEU"都会受益"平均"，但美国和欧盟非技术工的工资会下降。欧盟国家加上瑞士/挪威的政府会提供特殊的公共资助，用于失业工人甚至有在职工人的再培训。另一方面，在美国，政府几乎不会向失业者或工资减少的非技术工提供补偿或支持。美国政府在培训/再培训方面的支出通常接近或低于 GDP 的 0.03%，不到丹麦此项比率的 1/25，甚至只有瑞士或大多数欧盟西部大陆国家的约 1/10（见后表）。这是明智之举吗？

表 1：选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项目（培训）公共开支公共支出占 GDP 比重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丹麦	0.52	0.49	0.42	0.37	0.35	0.46	0.68	0.64	0.61	0.60	0.59	0.60	0.53
德国	0.44	0.38	0.35	0.30	0.30	0.35	0.27	0.25	0.22	0.22	0.21	0.20	0.19
瑞士	0.28	0.26	0.21	0.17	0.15	0.18	0.20	0.17	0.16	0.17	0.17	0.18	0.19
英国	0.03	0.02	0.01	0.01	0.01	0.02	0.02	0.01					
美国	0.05	0.05	0.04	0.04	0.07	0.05	0.04	0.04	0.04	0.04	0.03	0.03	0.03

资料来源：据经合组织的数据自行整理。

- 贸易理论中一个有用的方法是分析生产的相对利用度与产出结构之间的联系(所谓的罗伯津斯基定理)：给定相对商品价格，生产要素 j 的禀赋的外生增加将导致相对集中使用较多要素的商品的产出增加。另一种商品的产出按绝对价值计算将下降。举例：难民来到 A 国，那么那些相对劳动密集型的商品产量就会增加。另一个例子：A 国数字化知识意外泄露，那么相对贫穷的 B 国的多家企业就可以大力提升自己的知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B 国的知识密集型商

品生产将增加，而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生产将绝对下降。

- 虽然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和其他两种方法都假设不存在国际要素流动，但有人可能会想到处理国际要素流动的麦克道格定理。随后，需考虑的国家配对可以是墨西哥和美国。在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里，两个国家的开放，包括资本自由流动，将产生以下后果：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两国都将受益。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国家（此处指墨西哥）将吸引资本流入，这将有助于实际工资率的上升（劳动力将受益，不仅因为这个原因，还因为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内部再分配效应）。资本丰富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海外投资来源国（美国），将为分别从世界实际利率和利润率的上升中受益的资本所有者创造一个更高的收入记录。

墨西哥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在哪里？近十年来，美国每年约有 80 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墨西哥，但墨西哥非技术工的工资却几乎没有增长。其主要原因是墨西哥的经济秩序很奇怪，且允许强大的工会以给定的工资标准向愿意在墨西哥设立新工厂的外国公司“出售工作场所”，工会代表从外国跨国公司那里得到一些贿赂款，以实现这一目标，从而避免了在一个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多且没有腐败的经济体中正常的实际工资增长（最近发表的 GANDOLFI/HALLIDAY/ROBERTSON(2017)关于美墨经济联系的研究，忽略了墨西哥工会的这一奇怪角色，还因此得出了奇怪结论）。十多年来，墨西哥强大的工会阻止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正常结果，即墨西哥工人工资的大范围上涨，因此墨西哥针对美国的移民压力一直异常大。美国跨国公司在墨西哥的投资大约有 900 亿美元，那里的工资应该大规模增长，且工资的高增长通常会减少向外移民的动机。然而问题很复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大影响之一是美国对墨西哥大幅增加的小麦和其他农产品出口，迫使墨西哥南部的农民流离失所，对墨西哥的工资状况产生下行压力。

国际视角下的全球化和贸易

因此，特朗普总统认为全球化分别对美国和美国社会关键阶层不利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理论相悖。正常情况下，贸易应该会带来出口行业实际工资的提高和许多行业相对进口价格的降低。然而，公众往往不这么认为。以往的研究表明，美国公众明显高估了全球化的强度（GHEMAWAT, 2017）。盖马沃特探究了 2012 年的调查结果，其中美国受访者高估了商品和服务出口占 GDP 比重超过 10%，高估了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重）的 4 倍（当实际数字低于 10% 时，他们的估计接近 40%），高估了移民占人口比重，其中估计接近 30% 的比重远远大于实际数字，而实际数字低于 5%（见 GHMEMAWAT, 2017, 第 5 页）。最近的研究也得出了有趣的发现。在贸易效应方面，美国、欧洲国家、日本、印度等国的调查对象的观点往往不尽相同（见后文方框）。

PEW(2018)的调查结果给出了一些重要启示。例如，调查结果显示 2018 年 74%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和商业联系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好事。根据 PEW 的数据，虽然这代表了十多年来这种观点的最高比例，但仍低于如 2002 年的相关数据（当时 78%的受访者做出了积极的回应）。2018 年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相关数据分别为 89%和 79%。在认为国际贸易和商业联系对各自祖国有积极意义的受访者比例上，美国也落后于其他国家（PEW，2018 年；第 6 页）。更值得注意的是，仅有 56%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是件好事。与此同时，虽然越来越多的美国公众也认同贸易创造了就业机会（2018 年为 36%，而 2014 年仅为 20%），这仍比其他发达经济体低 9 个百分点，比新兴经济体低 20 个百分点。在工资方面，31%的美国受访者赞成贸易会使工资增加（高于 2014 年的 17%）。美国人对国际贸易的看法也因教育水平不同而有显著差异——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比教育水平不高的人持有更多的赞成意见，以及党派政治倾向；当民主党候选人入驻白宫时，民主党人对贸易的支持率似乎会增加，而当共和党候选人担任总统时，共和党人对贸易的支持率则会增加。反过来，如果相反党派的候选人担任总统，这两个选民群体对贸易的支持率似乎会下降。

在欧洲（根据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波兰、西班牙和英国的反馈意见得出的中位数），85%的人认为国际贸易对欧洲有利（只有 10%的人声称国际贸易不好）。然而，与美国相反，2018 年欧洲受访者中认为国际贸易创造了就业机会的比例自 2014 年以来有所下降（分别为 40%和 44%），而认为国际贸易使工资增加的比例也有所下降（尽管只有 1%，从 28%（2014）下降到 27%（2018））。在美国，相对多数人认为国际贸易是导致价格下降的原因，而在欧洲，2018 年相对多数人认为国际贸易带来了价格上涨（40%，而认为贸易降低价格的人只有 27%）。

然而，仔细观察欧洲各国的反应，会发现一些明显的差异。在荷兰、西班牙和瑞典，90%以上的人认为国际贸易对他们的国家是一件好事。在意大利，相应的数字是 64%。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波兰和荷兰有超过 60%的人认为贸易创造了就业机会，在意大利，这个数字是 16%。同时，虽然超过 50%的波兰人认同贸易增加工资；但希腊、法国和意大利的相应比例分别只有 20%、13%和 12%。根据 PEW(2018)的数据，在一些欧洲国家，表示支持民粹主义、右翼政党的人，如法国的国家联盟，更有可能对国际贸易表达负面观点。

对于日本来说，对国际贸易的怀疑态度甚至高于美国。在日本，只有 72%的受访者认为与其他国家贸易是好的，而相对多数的受访者认为贸易破坏了就业，而非创造（32%对 21%），减少了工资，而非增加（分别为 35%和 15%），提高了物价，而非降低（分别为 39%和 21%）。因此，尽管日本的通货膨胀率多年来相对较低且稳定，但认为贸易导致价格上涨的日本受访者比例几乎是认为贸易导致价格下降的受访者比例的两倍。

对于印度来说，71%的受访者认为贸易对印度有利（9%的受访者认为不利），而 56%的受访者认为贸易创造了就业机会（而 15%的受访者认为贸易会导

致就业机会流失)。同样在印度, 57%的人认为贸易会使工资增长(持相反观点的占13%), 而52%的印度受访者认为贸易引起物价上升, 15%的人则不同意。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

在美国, 中期选举对上届总统选举进行"修正"的情况并不少见。1945年后的大多数情况下, 中期选举都会引起众议院的选票摇摆, 有利于上届总统选举失利的党派。这也是2018年中期选举的结果, 当时美国民主党可以赢得很多额外的席位, 也确实获得了多数席位。调查显示, 从选民的角度来看, 被特朗普总统推翻的奥巴马总统的医疗保险方案, 以及出入境管控是两个关键问题。根据KRISHNA(2018, 另见KRISHNA, 2010)的研究, 患重病而没有足够的保险是美国公民陷入贫困的最重要风险。美国的政治体系无法安排广泛的医疗保险, 即65岁以下, 政府给予全民医疗保险, 这是一项非凡举措。0-64岁年龄段的人平均健康风险比65岁以上年龄段的人低。随着16-64岁人群健康保险覆盖面的扩大, 美国的生产潜力会增加, 因为患病工人的比例会下降。拥有医疗保险的人可以得到充分治疗, 这意味着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此外, 患病但仍去工作的人的比例也会下降, 这类工人以后往往会患重病。美国的保险覆盖面更广, 有助于降低医疗支出与国民收入的比例, 从而降低医疗保险的平均缴费率。此外, 预期寿命也会增加。

在2018年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 特朗普总统在第一个任期的后半段将面临比前半段更多的议会控制权(然而, 共和党捍卫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不清楚特朗普总统会不会变得温和一些; 从政治上讲, 一个面临更多来自众议院压力的总统可能会表现得更激进。人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 即美国的贸易差额逆差在中期内越来越严重, 而这主要是由于特朗普在经济上升期采取了减税和政府支出增加的经济政策。这是一个罕见的顺周期政府政策的例子, 这意味着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忽视了经济教科书上的标准规则。至于特朗普税改、美国经常账户和美国贸易账户逆差, 我们应该考虑到美国税改相当于约为6%的隐性出口补贴。

夺回控制权。如意算盘与国际世界

在21世纪初, 民粹主义已经成为欧洲许多国家广泛存在的现象, 从土耳其、俄罗斯到匈牙利、波兰、意大利(自2018年起), 甚至瑞士右翼的瑞士人民党(SVP)在2014年成功推动了瑞士与欧盟之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公投。在瑞士, 许多新的政治和数字化策略相当容易识别, 因为在那里, 人们几乎每6-8周就会针对一些问题付诸公投。保守的民粹主义基督教民主人民党CVP也试图争取更多的国家政治自治, 并希望恢复"民族自决", 比如不依赖欧洲人权法院(ECtHR)。对寻求庇护者的案件(可能会被送回本国), 瑞士宪法法院在2012年宣布, 如果国家宪法和欧洲人权法院之间出现矛盾, 欧洲人权法院的国际裁决将具有决定性。CVP认为, 只有瑞士应该决定驱逐失败的寻求庇护者, 瑞士的国际条约所产生的任何限制条件都没有意义。然而, 对于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来说, 这种观点就是痴心妄想, CVP以及唐纳德·特朗普、匈牙利的欧尔

班·维克托、意大利的孔特政府，以及英国反欧盟的奈杰尔·法拉奇（以及专注于脱欧的梅政府），他们都想“夺回控制权”（BERNET, 2018）。然而，这一观点极其矛盾。

- 显然，同样的政治家们也希望他们各自国家的人民能够享受到高标准的生活水平；但这确实需要参与国际政治合作，放弃一些政治控制，以便享受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的经济利益，包括自由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不仅对国外的资本积累很重要(如绿地投资)，而且对国际并购也很重要，而国际并购往往伴随着国际技术转让(来自经合组织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给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带来了国际技术转让，分别提高了长远的产出增长和生产力)。

- 一旦所有国家都放弃通过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军事力量的作用就会变得更加重要，军费开支占 GDP 比重会激增，那么多国的人均消费按实值计算将会下降。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而且在拥有美国和中国这两个超级经济大国的情况下，“夺回控制权”的口号不仅是一厢情愿的，而是自相矛盾的。它表明，一旦国际组织的作用被削弱，未来会出现更多的国家权力。然而，如果所有国家都通过破坏国际组织来夺回控制权，世界经济将出现许多新的、代价高昂的冲突，因为权力是一个相对的范畴，人们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获得了权力，而几乎所有国家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都在增加。对多数或所有国家来说，都会有明显的负面福利效应。那些希望生活在可以让人联想到 19 世纪末环境中的人，可能确实会成功，但这样一个大国政权的前景是可怕的（19 世纪末欧洲主要大国的军费占 GDP 比重为 4%）。

民粹主义可以在激起广大民众恐惧和无视科学/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扩大，包括许多领域的研究领导者和许多国际公司的管理层。在世界历史上，无知、恐惧和咄咄逼人的国际政治的结合没有一次带来持久的繁荣与和平，例如，19 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代，20 世纪 20 年代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或者 30 年代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对比是非常鲜明的。这里所表达的观点并不是说在某些情况下，社会的领导集团，即“精英”，不应该因政策不力、危机管理不善或社会宣传缺乏受批评；但几乎所有建立在痴心妄想基础上的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西方经合组织国家的民粹主义“夺回控制权”运动对许多签署了众多国际条约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常见的挑战。只有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才有一定的机会推动建立一个基本反映美国政策偏好的国际制度，使国际上的一套规则与本国（美国）的规则之间不会发生大的矛盾。显然，移民问题和庇护问题对于民粹主义政党来说，具有很强的象征价值。对于一个开放型的小经济体来说，总是需要寻求国际合作，从而接受国际规则的影响。由于民粹主义运动的目标是恢复国家自主权，这就等于破坏了多边主义的国际体系。其后果可能是，会出现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个小国似乎在特殊领域（如移民领域）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但这个体系最终会整合和凝聚成一个新的大国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小国将不得不决定自己是想成为美国、俄罗斯还是中国的附庸。布雷克斯主义者的说法是，离开欧盟就意味着夺回控制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真的一厢情愿。单独站立的英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确实是弱者，这一点--同时面对越来越大的中国和印度经济--可能会促使脱欧后的英国实质上成为美国的附庸国。如果这种自主权随后很快就被美国夺走（英

国在美国国会中没有席位，所以未来美英政治关系可能会出现一种逆向殖民主义的特征)，那么英国放弃在欧洲议会中的席位，从布鲁塞尔那里拿回政策自主权，又能得到什么呢？

This is a partial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WELFENS, Paul, The Global Trump, London: Palgrave (copyright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is with the author).